

# 德國統一社會黨反華言論

---

(內部讀物)

世界知識出版社

# 德国統一社会党反华言論

(內部讀物)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5年·北京

• 內部讀物 •

**德國統一社會黨反華言論**

---

**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

(北京后圓恩寺 3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101 号

北京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定價(五) 1.20 元**

---

開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張 9 • 字數 200,000

1965 年 12 月第一版 1965 年 12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統一書號 3003·755

## 出版者說明

自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63年7月14日給各級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发表以后，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有一些国家共产党的领导屈从苏共领导的指挥棒，进行了猖狂的反华宣传运动。据不完全的统计，到1964年7月，已经有六十个党发表了各种各样的反华材料，其中包括这些党的中央的决议、声明和公报，主要领导人的报告、讲话和文章以及党报党刊的社论等等。这些言论，象苏共领导和苏联报刊的反华言论一样，信口开河，造谣诬蔑，内容荒谬绝伦，言词粗野恶毒，无所不用其极。

为了使我们的党员，我们的人民，了解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了解这些党的领导怎样恶毒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现在象出版《~~苏联报刊反华言论~~》一样，将这些党的主要反华言论辑为专集，陆续分册出版，以供读者阅读利用。

本书包括德国统一社会党自1963年7月15日至1964年10月的材料，共计四十三篇。书中的小标题和异体字等等，都是原文发表时就有的。

## 目 录

«新德意志报»社論： 关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	1
德国統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會議 (1963年7月29日至30日)公报(节譯).....	14
德国統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會議 (1963年7月29日至30日)決議(节譯).....	17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全国陣线全国委员会 主席团声明(节譯).....	18
格尼阿·諾貝尔： 和平共处是社会主义对外政策的总路线.....	20
格奥尔格·汉森： 在錯誤的道路上.....	36
——莫斯科协定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弗雷德·斯陶芬比尔： 論人的力量(节譯).....	44
——駁教条主义关于人与技术关系的論点	
«新德意志报»社論： 社会主义的和平政策反对冒险主义.....	49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的态度的声明.....	56
弗里茨·庫姆夫： 辯证法还是形而上学? .....	61

烏布利希1963年9月9日在來比錫選民代表 會議上的講話(節譯).....	70
赫爾穆特·內夫： 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爭取和平的鬥爭(節譯).....	73
格奧爾格·克勞茨： 在第三屆世界新聞工作者會見之前.....	78
——關於中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的分裂活動	
羅蘭·鮑爾： 和平共處是社會主義對外政策的總路線.....	81
君特·柯爾特： 社會主義和民族解放鬥爭(節譯).....	90
維爾納·霍恩：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向社會主義和平過渡(節譯).....	96
庫爾特·提德克： 階級和國家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發展(節譯).....	99
烏布利希1963年9月25日在波蘭領導人為德意志 民主共和國黨政代表團訪波舉行的招待會上 的講話(節譯).....	104
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哈格1963年10月 1日在柏林黨宣傳員訓練班開學典禮上的報 告： 我們如何衡量民主(節譯).....	105
布魯諾·洛依施納： 世界社會主義體系——人類社會發展的決定 性因素.....	107
《新德意志報》社論： 各國人民已作出決定(節譯).....	113

«統一»杂志社論： 永远友好（节譯）……………114 ——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六周年而作	
維尔弗里德·韦貝尔：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背离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因…………… 118	
庫尔特·提德克： 1917年10月——人类历史的轉折点（节譯）……………133	
保尔·馬尔科夫斯基： 資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意义（节譯）……………137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會議1963年11月14日向人民 議院提交的报告（节譯）……………145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會議1963年11月14日在人民 議院會議上所作的关于上一届任期的工作报告 （节譯）…………… 146	
霍尔斯特·辛德曼代表德国統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 向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會議（1964年2月3日 至7日）所作的报告（节譯）……………147	
德国統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 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 上的团结……………149	
«新德意志报»社論： 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155	
德国統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反对中国领导人的分裂 政策、主张加强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一致和团结的 声明……………163	
埃伯哈德·海因里希： 和平、社会主义和北京的錯誤学說（节譯）……………178	

赫爾曼·馬特恩在列寧誕辰九十四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 列寧的遺訓和德國統一社會黨的政策(節譯) .....	183
阿諾德·賴斯貝格： 中國對國際工人運動史的看法 .....	192
魯·赫羅爾德、吉·卡德沙夫卡、海·奧皮茨： 一種冒險主義政策的矛盾重重的哲學——論 在北京出版的《辯證唯物主義》教科書 .....	211
漢斯·卡爾繆勒： 我們怎樣對待中華人民共和國呢？(節譯) .....	237
烏布利希1964年6月12日在莫斯科蘇德友好大會上 的講話(節譯) .....	241
霍爾斯特·多路斯、魯多耳夫·韋滕格耳： 列寧的黨的生活準則——勝利建設社會主義的 保障(節譯) .....	244
《新德意志報》社論： 國際會議 .....	251
格奧爾格·貝克爾、格尼阿·諾貝爾： 反對大國沙文主義政策(節譯) .....	254
庫爾特·提德克、海因茨·普德爾： 見諸於行動的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節譯) .....	261
卡爾·繆勒： 徒勞的努力 .....	267
烏布利希1964年9月25日在紀念第一國際一百周年 國際科學討論會上的講話： 第一國際和現代共產主義運動(節譯) .....	271



# 关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的公开信

《新德意志报》社論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7月14日的公开信得到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全体劳动人民的完全赞同。他们欢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表态并表示他们同列宁的党的兄弟般的团结。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和散发共1963年6月14日的信而没有遵守停止公开论战的协议之后，有必要作出这种表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为两党的谈判创造有利的气氛和通过谈判争取彼此立场的更多的接近，反而认为在谈判开始之前对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公开进行严重的诽谤是适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在莫斯科的谈判开始之前和开始之后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非法散发了他们也在西德和其他国家里散发的材料。鉴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种态度，德国统一社会党——它自己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尽了一切力量，并且遵守了停止公开论战的协议——认为自己有义务表示态度。

我们作为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机关报感到自己所以特别有义务表示态度，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攻击也针对着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及其新纲领，是因为这涉及和平或是战争的问题。众所周知，西德军国主义者和复仇主义者正专心致力于利用中国共产党发表的材料来达到其削弱和平运动的目的。

我们明确地指出，已出现的意见分歧不仅仅涉及苏联共产

党和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同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严重意见分歧。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对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所签署的莫斯科会议文件——1957年的宣言和1960年的声明——以及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列宁主义政策的原则所作的攻击。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1957年和1960年的莫斯科会议上规定了自己的总路线。这一总路线的出发点是对新的世界形势和对我們时代的特点——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所作的估计。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7月14日的公开信完全正确地指出：“现时代世界革命过程的性质和内容，是由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民、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一般民主运动汇合成统一的反帝斗争洪流这点确定的；在反帝革命力量的联盟中，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主要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以示范的力量和自己的经济建设对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起着它的主要影响。”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签署莫斯科文件的时候，他们曾经同意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战略和策略。他们以自己的签名确认，各国共产党把争取和平、争取拯救人类免于了一场原子灾难的斗争看作是自己头等重要的任务。他们确认，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主张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和平共处和力求实现全面彻底裁军。他们确认，社会主义革命不需要通过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而是通过每一个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发展来实现。同时，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推翻资本的政权和实现这一种或那一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

中国共产党领导佯称保卫1957年和1960年的莫斯科声明。但是他们的实际态度又是如何呢？就在1960年的莫斯科会议上，

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就表示了同列宁主义学说不相容的观点。当这些观点受到各国兄弟党的駁斥和中国共产党的代表面临孤立的危險之后，他們才签署了莫斯科声明。現在事情清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虽然签署了莫斯科声明，但却暗自保留了自己的錯誤观点。他們今天公然企图把自己的錯誤路线强加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

**一致協議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在近几年的革命斗争实践中经受了突出的考验。**

在这几年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全世界为爭取进步和民主而斗争的力量，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設中，在爭取和平、民主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中获得了新的伟大的成就。

两次莫斯科声明高度评价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这一道路在第二十一和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得到了继续并且在苏联共产党的新纲领——二十世紀的共产党宣言——当中得到最鮮明的表达。在苏联共产党的这些代表大会上所制定的政策曾有助于各个兄弟党根据其本国的情况克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有害后果和摆脱教条主义的狹隘性。这一坚决而有原則性的斗争是进一步創造性地发展馬克思列宁主义、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以及和平、民主、民族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全世界展开巨大攻势的决定性前提。

以苏联为首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以坚定不移的和平政策，特别是以卓有成效的经济发展扩大了它在世界上的影响。力量对比进一步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在古巴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之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变得更大了。它現在包括十四个国家，它的力量正在美洲大陆上直接发生影响。挫敗

美国对革命的古巴的侵略，是可以依靠苏联和世界和平运动的直接援助的古巴人民的一个伟大胜利。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这一胜利再一次地证实了莫斯科声明中所包含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越来越成为当代决定性因素的論断。

世界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普遍高涨是有目共睹的。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力量之所以能取得有重大意义的成就，是因为共同制定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并且在生活中经受住了考验。凡是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忠于这一总路线并且善于根据自己的具体斗争条件运用这一总路线的地方，它們就能取得这些成就。

战争与和平问题是当代最迫切的问题。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在1960年莫斯科声明中，在对新的国际力量对比的估计的基础上，证实了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首次作出的結論，即今天就已经存在避免一场世界战争的现实可能性。它們宣布列宁的和平共处和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竞赛的原则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不可动摇的基础。1960年莫斯科声明的这些論点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們签字同意的。

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作了些什么呢？当美帝国主义者以侵略社会主义古巴而把世界带到一场热核战争的边缘的时候，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包括我們党在内，都尽一切力量来维护人类的和平、保卫古巴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在这一危险的形势下，当有必要团结一切力量来拯救和平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却对苏联发出了誹謗性的攻击。难道中国共产党领导沒有意识到，当时存在着一场世界热核灾难的危险嗎？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放过任何机会来说明，人們必須首先

进行反对主要敌人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为什么他们申述人所共知、无人反对的事情呢？而他们自己的行动又作何解释呢？在美帝国主义把世界推向原子战争边缘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引誘地加剧了由反动势力所导演的同印度的边境冲突。他们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就是这样的吗？他们不是根据万隆会议原则通过和平谈判像解决一切争端一样去解决边境问题，而是同一个摆脱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国家发生了一场军事冲突。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是推行明智的政策，争取人民中的大多数支持争取和平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而是违背莫斯科声明，硬说战争是“一种本质的现象，是我们时代的规律”，也就是说不可避免的。他们用下面这个公式来看待斗争的进程：“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的逻辑。”从这种原则性的表态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认为战争和内战是斗争的唯一的形式。

从今天世界力量对比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这些看法不正好表明过高地估计了帝国主义的力量吗？这些看法不是说明，不相信社会主义和全世界一切其他的爱好和平力量的威力和强大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把原子弹说成是“纸老虎”，他们相信这样的思想：在一场原子战争以后，可以在帝国主义的废墟上建立“高千倍的文明”和“真正美好的未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想到如果发生一场原子战争，原子武器的破坏力——按照他们自己的话说——能够毁灭人类的一半的时候，他们不感到良心的责备吗？

这也关系到德国人民的切身问题。美帝国主义者恣愿波恩军国主义者图谋取得使用原子武器的发言权和原子弹头支配权的活动。美国统治集团在这方面指望，如果西德军国主义者挑起战争，社会主义武装力量的毁灭性的反击仅限于对付西德。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們的党應該对群众說什么呢？难道它應該由于“害怕”被中国共产党领导指責为“核恐惧”而放弃自己的責任，不把原子战争的影响的真情实况告訴人民嗎？我們絕不会被迫采取这样的路线，而是尽一切努力来防止战争的爆发。德国統一社会党、民主德国全国陣线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所負有的民族責任要求这样做。我們知道，发生一次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險还未过去。但是，如果帝国主义者发动一次世界大战，那么这将会是他們的毀灭。人們对一次現代战争的危險和破坏性后果认识得愈清楚，他們为阻止战争和爭取保障和平的斗争就愈坚决。这所以尤为必要，是因为西德軍国主义者企图使人民相信，一場原子战争的危險并不直接存在，一場原子战争也根本不像共产党人所断言的那样坏。

我們不想在廢墟上和在千百万死者的墓地上建設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是維護和发展生命，而不是毀灭生命。为社会主义也在西德取得胜利，并不需要国家之間的战争。因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全体人民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思想概念。

我們的经验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在为維護和平、为实现和平共处而斗争的条件下成立和强大起来的。就是在向帝国主义陣营开放边界的情况下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設。为了給帝国主义实现其侵略政策設置不可逾越的障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同华沙条約其他国家一起采取了有效的措施。我們党为消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迹、締結对德和約、变西柏林为一个中立的自由城市和两个德国的裁軍而斗争。它通过两个德国建立邦联的方案，把列宁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間和平共处的学說創造性地运用到德国斗争的具体条件和特点中去。两个德国和平共处和为达到这个目的而采取的一切步驟，例如瓦尔特·烏布利希同志在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提出

的七点建議，遭到了我們最凶惡的階級敵人、帝國主義者和軍國主義者的激烈反抗。這些建議只能在束縛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的頑強鬥爭中才能實現，難道這還能有什麼懷疑嗎？

我們共和國的每個人根據經驗知道，通過對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的鬥爭是能夠實現和平共處的。只要提出在德國誰反對和平共處和裁軍的問題，人們就會知道只有在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才能爭取到和平共處和裁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相反地認為和平共處的政策妨礙階級鬥爭。所有的經驗教導人們，爭取和平的鬥爭是為了擠退帝國主義勢力的最迫切的任務。

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在1960年莫斯科聲明中稱世界社會主義體系是國際工人階級最重要的成就。進一步全面加強這個體系是我們共同的任務。這也是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在莫斯科會議上簽字同意的。

我們黨完全贊同莫斯科聲明，把它的主要努力集中在從經濟上加強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和發展同社會主義各國，特別是同蘇聯的經濟合作上面。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工人階級、合作社農民、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各階層人民為充分利用社會主義的經濟規律進行着巨大的努力。我們把一切力量集中於提高勞動生產率，集中於科學技術進步、發展和實現計劃和管理國民經濟的新經濟體制。這不僅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是重要的，而且同時也是對加強整個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的有效貢獻。講一些响亮的詞句，儘管這些詞句聽來是多麼革命的，社會主義事業也不會前進，世界社會主義體系不會進一步加強。

中國共產黨領導走了哪條路呢？在執行中國共產黨第八次黨代表大會決議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間的良好關係得到了發展。在“大躍進”開始以後，情況改變了。1961年初，中國共產黨的一位領導同志向我們黨的一個代表團

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今后几年内,只同那些支持中国的思想概念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关系。可惜,以后事态的发展证实了这种預告。中国政府废除了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簽訂的許多合同。我們的国民经济由于突然撤銷重要的进口貨和已达成協議的出口貨而受到損失。从1958年到196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把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貿易削減到如此地步,以致今天它同西德的貿易額比它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貿易額还高。这一切同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所承担的加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义务有什么关系呢?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會議上共同指出,存在着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普遍有效的規律。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签字同意的。我們清楚地知道,向社会主义过渡給每个国家都带来許多复杂的問題。每个党、每个国家由于它們进行斗争的具体条件不同,都有自己一定的经验。在这方面兄弟党之間就向社会主义过渡时解决各自的任务問題进行討論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我們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把中国特殊的经验冒充为普遍有效的,像他們也在1963年6月14日信里所表达的那样,并且企图把这些经验强加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那是錯誤的。

显然,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設的困难和出于小資产阶级的左傾激进的急躁情緒,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企图通过“不断大跃进”,在绕过必要的发展阶段的情况下直接进入共产主义。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清楚地說过,共产主义社会只有在物质和精神財富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中国领导人指責社会主义国家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人,說他們不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尽一切力量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岂不是荒謬嗎?难道进行社会主义建設和提高生活水平就不屬



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嗎？

馬克思列宁主义是告訴人們关于社会发展規律和工人階級的革命政党的領導作用及其思想政治工作的意义的学說。但是，如果試圖只通过培养人們覺悟的途径来解決問題，而不是正确地利用社会主义的经济法則，不利用经济杠杆，亦即物质利益，那就必定导致錯誤。

社会主义各国兄弟党在1960年莫斯科声明中給自己提出了这一任务：在自己的国家中，在工人階級的革命政党的领导下，进一步发揚社会主义民主，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保障人民群众参与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領導，并且逐渐地把国家的职能交給社会組織。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签字同意的了。

我們党在自己的社会主义的綱領中規定，工农国家，即无产阶级專政，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进一步发展成为体现着全体人民政治道义上全面团結的全民国家。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瓦尔特·烏布利希同志的綱領性声明中所闡述的广泛发揚社会主义民主、吸引各階級和各阶层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建立人与人之间新的社会主义关系的路线，在我們共和国已经結出丰硕的果实。我們党就是这样发揚着社会主义民主，用它同紧急状态立法的政策即有系統地消除在西德尚存的資產階級民主残余的政策相对抗。这也是我們反对用議會裝飾的西德垄断資本和軍国主义專政的具体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說明問題的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6月14日的通篇信中，关于无产阶级專政的特征——社会主义民主——連一个字也沒有說。也許这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抱有一种特殊的看法有关。例如我們記得，他們以“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口号进行过一个运动。我們党的領導当时就已指出，人們不应助长野草丛生。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一口号，也

只不过是為了迷惑其他國家的共產黨和工人黨。中國共產黨領導本身作了相反的事，他們對於在過渡時期理應爭取的那部分知識分子加以歧視和施以報復。

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在它們的 1960 年聲明中的出發點是，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現時代，兩個世界體系之間的鬥爭是主要矛盾，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卻否認這一點，並斷言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運動的鬥爭是主要戰線，是“世界革命風暴的中心”。他們的文件說明他們低估世界社會主義體系作為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基础和堡壘的作用。他們也低估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的鬥爭，歸根結蒂，把這一鬥爭從屬於民族解放運動。

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所遵循的是，民族解放運動是世界革命過程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可是它首先只能解決民族解放的一般民主任務。世界革命運動的主要力量只能是國際工人階級及其最重要的成果——世界社會主義體系。因此，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認為，盡一切努力鞏固世界社會主義體系是自己的義務。這首先意味着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發展它們之間的全面合作，鞏固它們在反對帝國主義、為和平和社會主義事業而進行的鬥爭中的團結。

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出發點是，對於為自己的民族獨立而鬥爭的人民來說，世界社會主義體系已成了它們的民族獨立發展的可靠保護和屏障。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簽字同意的。可是，中國共產黨領導誹謗蘇聯共產黨和其他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它斷言蘇聯共產黨和其他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不支持民族解放運動。然而事實表明，情況不是這樣。

蘇聯共產黨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兄弟黨，其中也有我們的黨，作了並且正在作一切努力，從道義上和物質上支持民族解放

运动。埃及人民1956年反对英法侵略的斗争就是这样。在阿尔及利亚人民进行争取独立斗争时就是这样，在支持印度尼西亚解放西伊里安时也表现出是这样。在埃及、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马里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其他国家，水坝、钢厂、其他的企业、学校和医院便证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些国家的无私援助。

然而我们认为，民族解放运动必须由各国人民自己进行。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图把教条主义的和千篇一律的斗争形式强加给为自己的民族解放而斗争的那些国家的人民，从而企图为民族解放运动定下规章，是错误的和有害的。这只能导致忽视各个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特点。这样只能给各个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带来损害。每一个国家的人民必须自己决定他们借以争取自己的政治、经济独立和民主制度的形式和方法。

民族解放运动和年轻的民族主义国家通过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进一步加强而获得最大的支持和促进。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反对企图用旧的和新的形式维持殖民主义的帝国主义斗争中的主要力量。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强奸事实并僵硬坚持毫无结果的教条主义，而忠于莫斯科声明的苏联共产党及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则执行一项坚持既有原则而又灵活的保障和平及取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进一步成就的政策。这项政策表现在苏联始终谋求通过谈判途径解决国际争端问题以及全面发展文化、科学和贸易关系上面。因此我们党认为，赫鲁晓夫前往美国、英国、印度和其他国家去宣传和平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是正确的。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脱离生活的教条主义，而是苏联这一符合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精神的政策，导致我们的事业获得巨大的成就。

我们欢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争取同中国共产党中央

委员会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达成諒解和克服現有的意見分歧而作出的努力。我們將同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一起，继续不惜努力，为克服这些意見分歧作出貢獻。然而我們认为，把我們党之間的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去是不能允許的。尽管存在着意見分歧，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間的国家关系——貿易、经济合作、文化联系，等等，必須按照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則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

我們懂得，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殊发展条件，中国共产党领导在某些問題上持有与我們党不同的意見。但是，如果中国共产党领导想通过派系活动和顛覆活动把他們的看法强加給其他的兄弟党，这是与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間的关系根本相违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应考虑一下，为什么西德間諜中心印制中国的材料并把它寄往社会主义国家，这样考虑一下是适宜的。对于西德政府官方机构认为散布这些材料並沒有危害国家这一点，他們应当检查一下。我們党在这个西德垄断資本的教权主义和軍国主义的国家中并不享有这样的特权。中国党的领导同志确实应当考虑一下，他們把他們的意見分歧和不像样的攻击公开了，这只能使帝国主义者高兴，使共产党和工人党遭受損失。这真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我們党始終高度评价中国人民的英勇革命斗争以及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意义。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所抱有的这种团结的感情，在我們这里有着悠久的传统。早在二十年代，德国共产党在恩斯特·台尔曼的领导，在“不准干涉中国”的口号下，进行过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干涉的斗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們党和我国人民通过提供成套設備和其他重要的工业装备，以及通过科学技术援助，对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另一方面，我們始終重視中华人

民共和国在我們的政治斗争中以及通过提供必要原料和商品所給予我們的支持。

我們认为，克服現有严重的意見分歧是不容易的，但是並沒有不可克服的障碍。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人民在客观上有着相同的根本利益，有着共同的目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着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

我們党同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坚持为生活所证实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的总路线，并将继续一贯地为馬克思列宁主义学說的純洁性而斗争。我們党将坚定不移地继续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和团结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是这只能是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基础上的一致。

我們毫不动摇地坚持认为，执行列宁主义方針的苏联共产党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锋队，坚持认为，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同列宁的党的团结必須是不可更改的法則。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不仅支持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第二十一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決議，而且得出了这一結論，即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也在反对修正主义現象的斗争中制定广泛的、有人民性的政策，并在世界范围内，在爭取持久和平的斗争的旗帜下获得新的成就，所有这些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我們相信，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成就，今后还将更加清楚地证实我們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正确性；国际斗争的经验和中国共产党自己的经验，将使中国领导同志相信遵守这条共同通过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总路线的必要性。

（譯自1963年7月20日民主德國《新德意志报》）

## 德国統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 第三次全体會議(1963年7月 29日至30日)公报(节譯)

庫尔特·哈格同志就中国共产党领导执行的反对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共同声明和反对苏联共产党政策原則的政策作了报告。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7月14日公开信得到德国統一社会党党员和预备党员的一致贊同。我們同苏共、苏共中央及其第一书记尼·謝·赫魯晓夫兄弟般地連結在一起，并且譴責中共领导对光荣的列宁的党及其领导同志的誹謗。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創造性地发展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阶段、克服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以及消除其有害的后果，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高涨的根本出发点。1957年和1960年的文件、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主义的綱領以及第六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德国統一社会党的綱領是这一阶段的继续。

共产党和工人党在1957年和1960年莫斯科會議上一致協議的——就是說也得到中共贊同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已经证明是完全正确和卓有成效的。以苏联为首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在世界上的影响已日益扩大，并且首先通过它始終一贯的和平政策和迅速的、势不可擋的经济发展，使世界的力量对比变得更加有利于社会主义和平。因此，我們譴責中共领导人謀求篡改这一总路线的行动。

以光荣的苏联共产党为首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把争取和平、拯救人类免遭原子灾难的斗争看作是自己的头等任务。它们努力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和平共处和全面彻底裁军。要实现社会主义就需要和平。

正如我们在我们的纲领中所指出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坚信，只要人民群众全力以赴，和平就能够维持住。德国统一社会党坚决反对中共领导人的论点，他们不承认在最终消除帝国主义以前就存在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低估原子战争的危险，对各国人民的命运采取轻视和不负责的态度。

我们党坚决地进行反对西德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斗争，并按照莫斯科宣言和声明，把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和平共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进一步巩固和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间经济竞赛的斗争，看作是以最小的牺牲、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实现社会进步的主要途径。接受中共领导人的宗派主义政策，就是给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增加困难。

世界革命运动的主要力量是国际工人阶级及其最重要的成果——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工人阶级及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积极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消除殖民制度和一切形式的新殖民主义以及巩固国家主权而斗争的民族解放运动。苏联反对殖民主义的积极斗争、它的经济和政治援助，无论过去和现在都对保障和平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彻底胜利具有极大的意义。

中共领导人的左倾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概念，他们的派别和分裂活动，他们对苏共和我们党进行诽谤的办法，他们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公开袒护以及把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的做法，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争取和平、民族解放及社会主义的斗争带来损害。

我們对中共領導采取这一立場感到遺憾。但是我們认为，应当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在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基础上克服現有的意見分歧，从而維護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我們有共同的目标——社会主义，有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

我們党同苏共、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兄弟般地联結在一起，坚持被生活证实了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共同的总路线，并将继续一貫地为实现这一总路线而斗争。

(譯自1963年7月31日民主德国《新德意志报》)



## 德国統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 第三次全体會議(1963年7月 29日至30日)決議(节譯)

會議通过庫尔特·哈格同志就中国共产党领导执行的反对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共同声明和反对苏联共产党政策原則的政策所作的报告。

德国統一社会党中央声明：它完全贊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7月14日的公开信，譴責中国领导人對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列宁主义领导的誹謗，表示它同苏联共产党、它的中央委员会及其第一書記尼·謝·赫魯晓夫同志兄弟般地連結在一起。我們党同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共产党工人党紧密地連結在一起，坚持被生活所证实了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总路线，并将創造性地执行这一总路线和继续坚决地为馬克思列宁主义学說的純洁性而斗争。我們党将坚定不移地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統一和团结继续进行始終如一的斗争。但是，这只能是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統一。

(譯自1963年7月31日民主德国《新德意志报》)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全国陣綫全国 委员会主席团声明(节譯)

我們有来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居民各阶层和来自西德的千万件证据,证明他們感謝、贊同莫斯科条約并願为共实现和通过談判达到新的成就而积极奋斗。我們欢迎西德許多負責的政治家发表的贊成各国平等地参加莫斯科条約的声明。

像西德軍国主义者和法国极端分子那样的任何諒解和緩和的不共戴天的敌人,立即向这个条約开火,并不使我們感到惊奇。但是,使我們深感驚訝和气愤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63年7月31日的声明中也拒絕了已取得成績的莫斯科条約。

我們不能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怎能把这个条約称之为“大騙局”。这个声明违反各国人民的意志,捏造和歪曲在莫斯科达成的协定的真实內容。

难道永无止境地继续进行对无数人的健康具有-一切后果的大气层原子爆炸,是符合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們的願望嗎? 难道最終制止原子軍备竞赛和为全面彻底裁軍采取重大的步驟,倒不是一切爱好和平的人們的热烈願望嗎? 在莫斯科达成的協議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重要的一步。正因为这样,全世界才以寬慰的心情把协定当作良好的开端来欢迎。

当然,我們极其坚决地继续主张彻底銷毀核武器,取消在外国領土上的軍事基地和建立无原子武器区。众所周知,苏联政府和我国政府为此提出了許多建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从它的声明来判断,表示贊成同样的目标。这就更加令人不能理

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如果按照“要么全部, 要么全不”的口号把已取得的部分成就称之为“騙局”, 破坏条約的实现, 并阻挠确保持久和平的每一个实际步骤, 那么它要怎样来达到人类热烈渴望的这个目标呢。

(譯自1963年8月3日民主德國《新德意志报》)

# 和平共处是社会主义 对外政策的总路线

格尼阿·諾貝尔

1957年，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把“根据当前条件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決議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的关于两种制度和平共处的列宁主义原则，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不可动摇的基础”<sup>①</sup>这一点当作它们的政策的最重要原则之一确定下来。在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中就是这样写的，早在这个宣言发表以前的若干年以及在宣言发表以来的几年中，事实一再表明，苏联特别是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的认识的基础上所奉行的一贯的、积极的和平共处政策，全面地支持着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的斗争，而且在许多情况下，首先创造了斗争的必要条件。世界和不得以维护的这一事实，对各国人民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尼·謝·赫魯晓夫同志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正是把这一点正确地称作是过去这个时期党及共中央委员会的活动的成果，各国兄弟党和爱好和平的力量的活动的成果。

在和平共处政策的基础上，帝国主义的一系列的直接侵略企图<sup>②</sup>首先遭到了挫败。这些国家的人民在帝国主义优势力量的进攻面前受到了保护，同时事实表明，尽管帝国主义者不愿意，世界和平仍然是可以维护住的。全世界群众都被动员起来

① 1957年第12期民主德国《统一》杂志第1476—1477页。

② 比如，1956年在埃及，1957年在叙利亚，1958年在黎巴嫩，1960年在老挝，等等。

进行争取和平的有组织的、卓有成效的斗争，他们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政策上认识到，哪儿是人类的朋友，哪儿是人类的敌人；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懂得了，共产主义与和平密切相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威力和明智的政策维护了和平，使这些国家得以致力于自己的建设事业，并利用这些年月从而在同资本主义的经济竞赛中取得重大成就。

这样，苏联就能为执行共产主义建设的伟大计划创造最后的前提，并开始执行这个计划。社会主义得到了巩固，而且不仅是在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中。古巴人民解放了自己，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英勇的古巴依靠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大家庭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力量，尤其是依靠苏联的明智的共处政策，能够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的大门口继续存在并坚持向社会主义发展——这是拉丁美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征兆。我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能够给西德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依靠华沙条约缔约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力量，帝国主义曾不断地用来夺取我国建设的生命力的开放的边界被封闭了。同时，我国政府是根据一贯的、以和平共处为目标的政策实行这项措施的，以致西德极端分子的任何挑衅都不能得逞，并使他们不能借此来发动一场战争。

在资本主义世界，反对帝国主义与人类为敌的政策革命斗争在这几年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里的罢工次数增加了。<sup>①</sup> 这些罢工的战斗力及其政治水平提高了，例如在比利时、法国、西德就是这样。意大利共产党巩固了自己的阵地，领导劳动群众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被压迫人民争取自身解放的斗

---

<sup>①</sup> 从1958年到1962年，在将近四十个资本主义国家里，发生了约八十次具有全国规模的罢工。关于这一点，可参阅《1959年至1961年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柏林狄茨出版社1963年版。

爭有了巨大的進展。1953年以來，有五十二個國家被聯合國接納為新會員國，其中大多數國家在這個時期內取得了政治上的獨立。它們中有許多國家依靠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的力量，特別是依靠同蘇聯的經濟合作，現在已經轉而為自己的經濟獨立而鬥爭。

這就是說，在革命的社會主義鬥爭和反帝鬥爭的最重要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在全世界向社會主義的發展方面，又樹立了新的里程碑。始終不渝的和平共處政策為這些成就創造了必要的前提。偉大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這個運動所建立的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的存在（強大的蘇聯是它的主要力量），以及共產黨人認為自己的歷史使命——已如1960年11月莫斯科聲明強調指出的那樣——也在于“就在現時代使人類擺脫新的世界戰爭的慘禍。各國共產黨將為實現這一偉大歷史使命貢獻出自己所有的力量和精力”<sup>①</sup>，以上這些是人类的幸運，也是我們的幸運。

所有這一切都屬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總路線，它也為我黨以外的廣大勞動人民所理解和承認。雖然如此，現在已經有必要再次清楚地談談這些基本問題，這也是符合我們讀者的建議和詢問的。現在所以有這種必要，是因為中共領導雖然自己簽署了這兩個莫斯科聲明，但幾年來却日益公開地和系統地攻擊在這些聲明中所包含的總路線，並且要求修改這條總路線。現在中國領導同志把他們最近的一封信稱為《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似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迄今還沒有過總路線，似乎不存在正是概括了這個總路線的、並經中共領導簽字同意的兩個莫斯科聲明一樣。這是一種奇怪的态度；同樣，在提出要修改關於戰爭、和平與和平共處問題上共同商定的總

---

① 1960年第12期民主德國《統一》雜誌第1811頁。

路线的建議中所采取的立場也是一样奇怪的，而且这种立場的后果是駭人听闻的。

中共的信引用了莫斯科声明对这个問題的論点：“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将最終消除产生任何战争的社会原因和民族原因”<sup>①</sup>，并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把讀者引向这一結論，即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一个沒有战争的世界便是不可能的。可是在莫斯科声明中却有这样的决定性的論断（社会主义各国的整个和平政策正是以这个論断为基础的），即“今天能夠制止帝国主义侵略者发动世界战争的企图。世界社会主义陣营、国际工人阶级、民族解放运动、所有反对战争的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联合努力能夠防止世界战争。”<sup>②</sup>声明指出，今天人們也可以有效地反对帝国主义者发动的局部战争并摧毁它的温床。

所以只提問題的一个方面并从中得出結論是不行的。必須把一個問題的关键方面联系起来看，必須具体和全面地分析情况<sup>③</sup>，以便取得革命斗争的正确战略和策略基础。战争是帝国主义的規律，因而只有随着帝国主义本身的最終消失，战争根源才会消失，这一点固然是对的，但同样正确的是，我們时代的帝国主义已不再能够决定历史的进程了。令人完全不能理解的是，正是那些把帝国主义称作紙老虎的人同时又硬說这个“紙老虎”有力量把它的战争規律强加于全世界！而且是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日益成为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現时代！但是，社会主义的規律是和平。为了實現和平，社会主义今天能够而且必須进

---

① 1960年第12期民主德国《統一》杂志第1809頁。

② 同上杂志第1807頁。

③ 例如在爭取締結布列斯特和約的斗争中，列宁一再指出正确分析局势的根本意义，也一再指出“左派”不能理解和分析新的局势，也不能考虑自己必須作出决断时的条件。

行有效的斗争。帝国主义不是纸老虎，它还有危险的核牙齿。可是这只过去独霸全世界的帝国主义猛兽，已经被社会主义力量挤到世界的一部分地区去了，它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控制权被夺去了。社会主义与和平的力量将尽一切努力，防止这只猛兽重新冲出来并把世界拉入原子战争的地狱。今天有可能、也有义务防止这种情况——这正是莫斯科声明所着重指出的。莫斯科声明还说：“全世界共产党人一致地始终不渝地坚持和平共处，为防止战争而坚决斗争。共产党人应当在群众中进行不倦的工作，以免于低估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低估和平共处的可能性。”<sup>①</sup>

声明同时强调不可低估战争的危險。我們在德国很了解战争的危險是多么巨大，在欧洲战争危险特别是来自西德軍国主义。西德垄断資本所以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积极和迫不及待，是因为西德尽管在经济上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整个体系的不稳定性和矛盾性仍在急剧增长，因为西德的阶级对立日益加剧，它与欧洲和北大西洋伙伴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锐，此外还因为它被限制在德国的一部分土地上。西德軍国主义的一个臭名昭彰的代表人，从前的納粹將軍和战犯，現任联邦国防軍总监弗奇將軍曾表示过西德帝国主义从这种发展中得出了哪些結論。他曾对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新聞官員說，世界均势正处于不正常的状态，它在欧洲——尤其是在德国——特别受到威胁，今后必須恢复世界均势。<sup>②</sup>这是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侵略計劃的修飾，当然，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面前，这个侵略計劃也拿不出依照帝国主义的意图在德国恢复均势的有效手段。現时代的发展規

① 1960年第12期民主德国《統一》杂志第1809頁。

② 參見1961年9月28日第179期西德《联邦政府新聞情報局公报》第1701—1703頁。



律是朝向社会主义的，只有帝国主义极端分子还可能抱有利用原子武力阻擋历史进程的妄想。因为，正如列宁在全俄苏維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早就指出，已经往死路上走的人，就容易失去正确估計历史发展的能力。<sup>①</sup> 然而，如果一个伟大的正处于上升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力量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这些决定性問題上容許錯誤的估計，这的确是令人不解的。

社会主义与历史发展的关系和帝国主义与历史发展的关系完全不同，帝国主义者总想“推回”历史的发展，而社会主义却无需这样做。我們的事业是推进世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进程。目前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已在实现这一过程。它表现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設和共产主义建設以及它們同最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竞赛。它表现在有愈来愈多的国家的革命发展在成熟，表现在工人阶级爭取权利和要求的阶级斗争中，表现在全世界正在进行的反对民族压迫、爭取中立、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联盟、爭取民主权利、爭取实现妇女和青年的要求的斗争中，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也表现在爭取和平的斗争中。这一过程是由多种多样的运动組成的，在这一过程中，那些依靠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体系自觉地为反对与人类为敌的帝国主义制度而进行斗争的各种运动和組織同那些虽然只反对帝国主义制度的某一方面，但在客观上也属于我們这个过渡时期的伟大的革命潮流的力量联合起来。为了推动这一破坏和粉碎帝国主义基础的世界范围内的斗争，人們不需要战争，也不需要紧张和“局部性”冲突政策以及“战争边缘政策”。相反地，战争、国与国之間的军事冲突和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将会严重地妨碍社会主义国家开展建設，妨碍上述各种斗争运动，甚至会

---

<sup>①</sup> 參見《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7頁。

使一部分活动不能进行。然而，和平共处政策却为阶级斗争和世界朝着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中共领导人认为，如果帝国主义“好汉们”决心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唯一的結果将是加速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彻底灭亡。<sup>①</sup> 如果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与人类为敌的资本主义制度将被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力量鏖除，这是正确的。然而不正确的是：这并不是战争的唯一——也不是唯一主要的——結果。美国科学家、反对原子战争的积极战士莱纳斯·保林估计，世界上迄今已积存的核武器储备相当于二千五百亿吨黄色炸药。这将是地球上每一个活着的人分摊八十吨炸药！赫鲁晓夫同志在我们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指出，根据科学家的计算，在一场原子战争中仅仅第一个回合就会有七亿至八亿人被消灭，其中大多数并不是帝国主义者，而是工人、农民、科学家。这个数目接近于人类的四分之一！另外四分之三人类的处境如何呢？他们的肉体存在和健康，他们后代的健康会怎样呢？根据日本的经验，在那两个受到今天“仅”被称为“战术”原子弹轰炸的城市里，今天还有人因原子弹的后果而患着不治之症，畸形的婴儿不断出生。这四分之三的人还能有什么样的生計可能，什么样的生产力和什么样的文化成果呢？难道一个共产党大党的负责领导有权把原子战争的这种后果（它将使人类倒退到很早以前的文明阶段）置之度外吗？

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布尔什维克是如此珍视流了这么久的俄国工农的血，所以，即使媾和条件对他们极不合算，他们还是准备媾和<sup>②</sup>。今天如果发生一场原子战争，工农所流的血将以不可估量的程度超过那时的惨重牺牲。而

① 参見1963年7月20日中国《人民日报》。

② 参見《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3頁。

今天所爭取的和平，和平共處政策所要保障的和平，是這樣的一種和平，它保護很大一部分人類免遭一場無謂的毀滅，同時為世界走向社會主義的發展開拓道路。為這樣的和平，為避免原子戰爭及其後果而鬥爭，是符合世界工人和農民、一切勞動者和一切人們利益的決定性的要求！今天，爭取和平的鬥爭已成為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的最重要條件。因為社會主義不能建立在受原子污染的荒野和億萬人的屍體之上。不，社會主義是建立在我們健康而富饒的、得天獨厚的行星上，是人類迄今在物質領域和精神領域中所作出的壯舉和創造性事業的頂峰，而不是這一切的毀滅。

\* \* \*

我們黨關於在德國並存着兩個不同社會制度的德國這一政策，符合兩個莫斯科聲明所規定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總路線。我們的全部政策的目的是為和平的勝利和德國歷史進步的勝利而積極地鬥爭。在我們黨的綱領中說：“德國統一社會黨把維護民族免遭戰爭和毀滅以及建立持久和平看作是現時代的主要問題。它要把戰爭永遠從德國人民的生活中排除出去……反對軍國主義和統治階級的戰爭政策的鬥爭從來就是革命的德國工人運動的優秀的方面。”<sup>①</sup>正是由於德國帝國主義特別具有侵略性，所以德國左派以及後來共產黨人的鬥爭就特別針對軍國主義。可是軍國主義的本質在於，它把戰爭和赤裸裸的暴力看作是政策的主要手段，力圖發動戰爭，使國家活動、對外政策和國內政策以及整個社會生活服從於準備和進行戰爭。因此軍國主義成為集中地、系統地、全面地、經常地威脅勞動人民的切身利益的基礎，成為爭取人類社會的進步發展的鬥爭中的最大障礙

---

① 1963年第1期民主德國《統一》雜誌第25頁。

之一。德国工人阶级政党在这个反对准备和实现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政策的斗争中成熟起来，在光荣的苏军粉碎了法西斯战争政权以后，德国的力量对比也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并为德国工人阶级、一切爱好和平和爱国的力量给德国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以决定性的打击创造了条件。

我们很好地利用了这些可能性。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发展表明，正因为我们强制实行两个德国和平并存，我们保障了社会主义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顺利发展的可能性。我们在我们这一部分德国领土上根除了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我们可靠地阻止了西德帝国主义的东进野心。尽管它抱有侵略企图和进行种种挑衅，无论是1953年还是1956年，我们都没有允许它破坏德国和欧洲的和平。我们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设了一个主张和平共处政策、维护和发扬德国文化的人道主义遗产的合法的德意志国家。1961年8月13日，我们稳固地保障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边界。在这样一种发展面前，人们怎么能说和平共处政策意味着向帝国主义投降呢？

就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巩固了自己的存在以后，弗·伊·列宁立即就指出，这个国家今后将通过经济政策对世界革命施加它的主要影响。<sup>①</sup>清楚地认识这一点，对确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部战略和策略，过去和现在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生产力同样是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决定性基础，也是整个社会进步以及这些国家有比帝国主义国家增长得更迅速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决定性基础，也是这些国家在世界各国人民心目中作为社会主义前途的榜样而发生吸引力和影响的决定性基础。因此列宁那样着重地强调，现

---

<sup>①</sup> 参见《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27页。

在世界范围的斗争已转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域：“在这条战线上，我们应当慢慢地、逐步地——图快是不行的——而又坚持不懈地提高和前进，以取得胜利。”<sup>①</sup> 最终决定历史发展的，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而不像中共领导人所想像的那样，是万能的革命战争。这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回避的一个基本规律，从苏联到古巴，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都表明了这一点。<sup>②</sup> 我们党一开始就认识了这一规律，并把它作为我们巩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及在德国和平共处的条件下解决民族问题的政策基础。因为和平共处政策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我们的纲领中说：“这个斗争将作为两种对立的制度之间的经济、政治和精神文化的竞赛而进行着，在德国也是如此。”<sup>③</sup>

列宁认为，在经济建设中，需要做真正基本的工作，虽然同以前人们强加于苏联的武装斗争形式相比，经济建设是比较困难的、缓慢的、渐进的。<sup>④</sup> 贯彻列宁的这种认识对于苏联的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是这样的基础之一，苏共从这些基础出发，一再击退了托洛茨基分子的反抗，执行了在一个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的具有历史性决定意义的路线，并通过它在经济建设中的英雄行为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同时为粉碎罪恶的法西斯主义的危险政权创造了前提，并且毫无例外地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创造了条件，使它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能够容易得多，迅速得多。因此，使我们建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成为可能的，也是苏联的力量和它始终不渝的和平政策。<sup>⑤</sup> 同苏联的紧密合作是我国迅速而卓有成效地进行建设的

① 《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28页。

② 在纪念7月26日起义十周年的盛大群众大会上，菲德尔·卡斯特罗强调指出：今天我们不是号召拿起武器，而是号召参加劳动。

③ 1963年第1期民主德国《统一》杂志第25页。

④ 参见《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页。

决定性条件。瓦尔特·烏布利希同志在中央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上說：“今天我們已经可以預見，不多几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就可以达到从前德国的生产水平(采矿冶金业除外)。只是由于苏联的兄弟般援助，由于我們两国之間的科学技术合作的发展，供应宝贵的原料和貿易的迅速发展，我們过去和現在才能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就。”<sup>⑤</sup>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的方向性的认识也为这些成就开辟了道路，正如它們为近几年的整个发展开辟了道路一样。正如我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所写的提纲中所說，“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适用的原則，为各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斗争，作出了原則性結論。这个大会的決議为各国人民在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爭取新的成就展示了令人鼓舞的远景。这些決議給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自己的国家中創造性地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以重大启示。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国际革命运动的发展中，开创了一个新阶段。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決議对德国統一社会党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爭取进一步巩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人民民主秩序和解决民族問題的斗争是一个巨大的援助。”<sup>⑦</sup>

但是，假如我們不在同苏联的紧密合作中，不在爭取实现和平共处的坚持不懈的斗争中进行经济建设，而是让帝国主义、让某些急躁的当代人的願望把我們自己驅使到暴力冲突的領域中去，假如我們只按照“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則对每一次挑衅都报以挑衅，对每一个由西柏林偷运进来的炸弹都回敬一个炸

---

⑤ 參見《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任务》，柏林狄茨出版社1961年版第52頁。

⑥ 1962年10月14日民主德国《新德意志报》。

⑦ 1959年第9期民主德国《統一》杂志第1253頁。

弹到那里去爆炸，那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将会成什么样呢？德国将会成什么样呢？那样我們就会把行动的主动权让給西德軍国主义。那样帝国主义者就会有可能发动战争挑衅了。过去，帝国主义者能够在他們认为必要的时刻和必要的领域中把斗争强加給工人阶级，强加給社会主义国家。今天，社会主义的力量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不仅决定着历史过程的結局，而且决定着历史过程的发展。人們固然应该敲掉帝国主义的牙齿，束縛住它的手脚。但是这场斗争应当如何进行，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进行，在什么领域内进行——在現时代，社会主义与和平的力量能够日益有效地决定这一点。

向帝国主义投降的不是为和平共处而斗争的人，而是那些在革命空話的基础上被誘入帝国主义挑衅政策陷阱的人。1918年，列宁在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激烈斗争时曾經指出，“鼓吹革命战争的革命空談会断送我們的革命。”<sup>①</sup>他說得多么正确。接着列宁在分析这种革命空談的本质和来源时說：“革命政党在它直接或間接实行无产阶级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联系、联合和結合的情况下，在革命事变进程发生巨大的、急剧的轉折的情况下，最容易害革命空談病。革命空談就是不顧当前事变轉折和当前形势下的客观情况，一味重复革命口号。口号很漂亮，很誘人，很醉人，但是毫无根据，——这就是革命空談的本质。”<sup>②</sup>我們今天的时代无疑是这样一個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革命事变进程发生巨大的、急剧的轉折”。但是，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党根据对当前形势的精确分析，而不是根据一般口号制定正确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当1960年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莫斯科共同作了这种分析，并得出共同的結論的时

① 《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頁。

② 同上。

候，就更是这样了！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国际工人运动及其最重要的历史成果——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一致，对取得革命斗争的成就以及各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工作成绩具有特别巨大的意义。

列宁在《論“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这一著作中已经指出，那些喜欢响亮的革命空谈的人大多没有能力从事那种经过了深思熟虑、反复权衡并估计到最困难过渡情形的有节制的革命工作。<sup>①</sup>但是，有些同志不仅如此，而且还阻碍兄弟党作这一工作，用思想意识的和组织的手段破坏诸如世界和平运动、世界妇女大会<sup>②</sup>之类的国际斗争联合的工作，并给争取和平的斗争增加困难，对于这样的同志，列宁会说什么呢？列宁正确地强调说，“左”倾空谈家——无论他们愿意不愿意——总是帮助帝国主义者。

这样一种“革命的”政策给建立争取和平和民主的斗争的广泛团结增加困难，破坏着国际工人运动的统一，波恩政府已经正确地认识到这样一种“革命的”政策有利于它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就无怪乎波恩政府用它的宣传工具来散发中国人的材料，同时开动自己的全部警察机器反对散发苏共纲领，反对说出有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真情实况的每一句话了！这难道还不引起中国同志们深思吗？他们是不是明白，他们对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总路线的攻击正在大大地帮助西德军国主义者及其“非和平共处”路线？要知道，西德军国主义者恰恰在企图对群众说，战争像自然灾害一样不可避免，并且断言原子弹同其他武器也没有本质的区别，企图以此为西德和法国对原子武器的要

---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20页。

② 参见安妮塔·格朗德克：《争取和平和裁军斗争中的妇女》，载1963年第8期民主德国《统一》杂志第150—155页。



求辯解！那些在两德——在那里进行统治的就是曾经筹划过对苏联进行罪恶的突然袭击的集团，在那里，联邦国防軍今天仍然是由納粹將軍和战犯领导——对誹謗苏联、誹謗光荣的列宁的党及其领导作出贡献的人，是站在誰的一边呢？在共产党不得不在非法条件下进行斗争的国家，如果出于在那里散发的材料而使国际工人运动的团结和苏联的威信受到破坏，这难道还不大大有碍这个党的工作嗎？苏联的历史功績和爱好和平的政策在人們面前是一个光輝范例，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設纲领动员劳动人民为争取光明前途进行斗争。事实一再表明，今天也同苏联存在以来的情况一样，对国际工人阶级先鋒队的这个国家的态度是一个党对具体革命斗争的态度是否真诚的試金石，是这个党的活动給这个斗争带来利益或損害的試金石！难道那些背离了在莫斯科一致協議的国际工人运动总路线，破坏苏联国际威信，攻击許多共产党并給它們的工作增加困难，从而在客觀上帮助帝国主义者的人，还不要負严重的責任嗎？

甚至波恩帝国主义者都努力地把中国的材料寄送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来！他們徒然地期望，这会影响我們党的政策。因为我們的党在几十年前已经克服了“左”傾幼稚病，因此，学习《德国工人运动史纲要》今天在这方面也是特別有益的。我們的党既不因帝国主义的挑衅，也不因革命的空談而离开它经过反复权衡的政治路线，离开同光荣的苏共的战斗联盟，脱离争取两个德国和平共处的一貫斗争。我們党的所有文件、我們根据现实条件一再提出的許多建議、我們政策的全部实践都证明了这一点；正是这个政策不仅受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而且受到全体德国人民中的大多数的支持。

正是在今天，苏联通过关于部分停止核試驗的莫斯科协定（这是它始終不渝的和平共处政策的成果）給帝国主义极端分子

所进行的战争准备的基础打开了一个重要缺口。德国乃至全世界的怀着善良愿望的人们都欢迎这个协定，把它看作是逐步减少和最后消除世界原子战争危险的第一步。我们特别为此而高兴，因为尤其对我们国家来说，实现和平共处非常具体地意味着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我们高兴地想到，赫鲁晓夫同志在维尔纳—泽伦宾德体育馆，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首都的居民阐述了他的倡议的基本思想，该倡议是这个条约的基础。我们认识到，瓦尔特·乌布利希同志在同一天，在同一个地方提出的建议，对这一始终不渝的、卓有成效的和平政策作出了我们的建设性贡献。

我们欢迎在莫斯科缔结的协定，是出于同这个协定的路线完全一致的我们全部政策的根本态度。瓦尔特·乌布利希同志曾一再说过，我们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需要用原子武器来保卫我们的安全，我们同其他许多政府所宣布的一样将参加这个协定，这是合乎逻辑的，也是合乎情理的。然而在波恩情况就不同了。这个协定同波恩军国主义者攫取原子武器而不断作出的顽固努力是完全相违背的。但是，在国际舆论和本国大多数居民的态度压力下，波恩战争贩子不敢正式拒绝协定。不过，正如伦敦《泰晤士报》所写的那样，这个条约的后果使波恩胆战心惊。在国内政策和对阿尔及利亚人民进行血腥的殖民战争方面都同样是采用最残暴的帝国主义方法的代表戴高乐，公然反对莫斯科条约，宣布拒绝参加条约，波恩军国主义者对此感到高兴是不足为奇的。但是，中国（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怎么能拒绝这个有助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条约，从而站在戴高乐一边，并把莫斯科协定称作是一个“大骗局”呢？

社会主义国家和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斗争经验一再表明，

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这一积极的政策是正确的；它符合全世界的工人、劳动者和各国人民的利益，符合全世界朝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的要求。我們有共同的、客观的基本利益，尽管有严重的意見分歧，这些基本利益还是把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各个国家联系在一起。我們毕竟有着一个共同的敌人和共同的目标——建設人类幸福的、社会主义的未来。因此我們也相信，意見分歧最終将被克服——尽管也許是不容易和緩慢的——，根据客观条件决定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总路线，也将在它暫時被拒絕的地方取得胜利。現在我們的任务是竭尽一切努力維護国际工人运动的統一和它的总路线，同时沿着在瓦尔特·烏布利希同志的声明<sup>①</sup>中所指出的道路，为继续在德国貫徹和平共处而斗争，并促进两个德国的公民按照自己的历史責任，共同致力于寻求确保和平和今后处理德国問題的建設性解决办法。

（譯自1963年8月6日第8期民主德國《統一》杂志）

---

<sup>①</sup> 參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1963年7月31日在人民議院发表的声明，載1963年8月1日民主德國《新德意志报》。

# 在錯誤的道路上

——莫斯科協定和中國共產黨的政策

格奧爾格·漢森

全世界億萬人們近來為一個共同的思想所激動，即莫斯科停止核試驗（不包括地下核試驗）協定的誕生也歸功於他們的努力。是他們在前些年參加了有助於為目前的協定開辟道路的行動——征集簽名、向國會遞交請願書、上街示威遊行、復活節示威和罷工。

全世界的人們，優秀的、最正直的、最聰慧的人，現在都對舉世可見的成就懷着正當的歡天喜地的感情。正確的是他們，而不是人們的敵人，也不是懷疑主義者。

雖然莫斯科協定限于停止核試驗，而且它還不是全面徹底裁軍的協議，但是它已開了個頭，提出了證明，證明在通往這個目標的道路上是可以取得成就的。

莫斯科協定是蘇聯堅持不懈的和平政策和和平共處原則的勝利。這一政策得到全世界人民群眾的支持。

他們的言行有助於使世界政治活動起來。這種感覺使人們感到有信心，並給予人們力量去為和平事業作新的努力。

這裡所說的因素，雖然不是可以精確測量和衡量的，但是卻對事態的進程發生着巨大的影響。現在西方的政治家也在談論緩和道路上的第二步和第三步，這並不是偶然的。他們這樣做就是聽從理智的命令，但首先是聽從他們本國人民的命令。

## 不一致的种子

苏联政府宣布了它对下一个步骤的设想。这些设想在西方报刊上得到详尽的讨论。现在世界各地的人民群众、他们的组织、他们的代言人，发言越是有力、越加着重、越为广泛，言论就会更迅速地变成行动。目前可能性是空前地好。

为此，为和平而斗争的力量必须一致和团结。把徬徨不安和混乱带到世界和平运动中去，甚而分裂世界和平运动的行列，必定会给运动带来损害，只能有利于帝国主义的最反动的力量。

目前必须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提出这种指责，中共领导事实上否认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的政策，企图以此使各国人民不相信持久和平是可能的，同时在一切为和平而斗争的组织中播下不一致和分裂的种子。

中共领导人的错误的、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相容的政策，在他们对莫斯科停止核试验协定的态度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并具有挑战性。北京政府正式宣布它将不参加莫斯科协定。

他们的出版机构把协定称作是一个“骗局”，在涉及各国人民的最高财富——世界和平——的事情上使用一种完全不适当的语言。

中共领导对莫斯科协定提出的异议客观上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莫斯科协定没有规定实际的裁军（人所共知，谁也没有下这种断言），二是协定旨在确保三个签字国对核武器的垄断。这些论据的自相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核武器方面的裁军和同时扩大有核武器装备的国家的范围，是两件截然相反的事情。

1946年，苏联还没有掌握核武器的时候，它曾经要求禁止和销毁核武器。要是按照中共领导今天所主张的政策，苏联当时

就得說：等到我們手中握有自己的核武器的时候，我們才能对防止核战争作出贡献。

### 裁軍遙遙无期嗎？

追究这种观点的邏輯的終点，人們就只好把核武器方面裁軍的思想推向遙遙无期了。

那末，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国家、乃至最疯狂的法西斯独裁者还没有核武器装备之前，人們仅仅就禁止和銷毀核武器进行会談也是不行的。

如果今天指責三个国家力求垄断核武器，明天就可能对五个国家、后天就可能对七个国家提出这种非議，这样下去，就会一直到最后所有国家都掌握原子武器，使爆发一場核战争的危險大到惊人的程度。

提出异議，說事关用核武器装备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里也是无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不是认为，那些今天还没有掌握核武器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段时期仍会无所作为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核武器装备必然是通过苏联和牺牲它的现存核武器和能力而实现的。所以，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主义陣营的防禦能力根本不会加强。

各种考虑的结果表明，把核武器扩散到越来越多的国家这件事本身，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危险的源泉。誰直接或間接地为此說話，就給和平帮了极大的倒忙。

相反，限制有核武器装备的国家的数字，是一項符合各国人民利益的安全措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这里可以举出它自己的例子，即它提出的两个德国放弃占有核武器的建議。

中共领导何时曾对这一建議提出异議，这一点不詳。但是，

中共領導對莫斯科協定的態度必然也給波恩軍國主義者提供了論據。

後者多年來要求掌握美國核武器，並同戴高樂將軍一起正在製造自己的核武器。

歐洲各大小國家的人民，有理由把西德的原子武裝看作是對和平的危險的威脅。中共領導人是不是明白，僅僅是這個原因，他們自己對莫斯科協定的態度就不會得到任何一個歐洲國家的贊同？

### 駭人聽聞

中共領導的這個論據的另一方面是人們完全不能理解的，簡直是駭人聽聞的。中共領導給蘇聯和美國的核武器裝上同一個“核壟斷”的招牌，從而在政治上把它們一視同仁。這樣，中共領導就誣說在美國帝國主義政策和蘇聯社會主義的和平政策之間存在着所謂原則上的共同性。

姑且不談蘇聯的武裝完全是為社會主義陣營的防禦服務這一事實，以下這點已是有口皆碑的真理，即，如果蘇聯早在多年前就已提出的建議被接受了的話，一切核武器早已就被銷毀干淨，沉在海底了。

中共領導對莫斯科條約提出的、說條約沒有規定實際的裁軍這一異議，是既錯誤又是有害的。

誰縮小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政策和世界和平運動的實際成就（莫斯科協定無疑地是這樣一個成就），甚至干脆把它稱之為騙局，誰就是在散布徬徨不安和促進懷疑和悲觀主義。此外，中共的領導在批評莫斯科協定時，一句也沒有談到應當怎樣以及用什麼手段立即達成一項進一步的協議。

“立即締結全面徹底裁軍條約，是理想的解決辦法，我們過

去和現在一直坚持这样做。也許中国领导人知道如何才能一下子解决整个問題的秘訣？至于我們，那么我們认为，当这种部分措施的協議符合和平的利益和社会主义的利益时，做一部分工作，总比什么事情也不做要好。既然在目前条件下还不可能一下子全部解决問題，那么唯一明智的山路是一步一步地解决它。只有完全丧失现实感，才会在涉及和平命运和千千万万人的生命的命运的問題上提出这样一种抉擇：‘要么全部，要么全不’。”

月初发表的苏联政府声明中的这些話，說明了事情的实质。不言而喻，中共领导人并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才能使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立即締結一項更广泛的協議的秘訣。

根本沒有神秘之处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是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然而，中共领导人对这种积极性置之不理。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他們的政策就定会是以加强和促进国际和平运动为目的，而不是使它混乱和瓦解了。

## 反动派的交易

鼓励帝国主义的最反动的势力，是中共领导的这一政策必然产生的一个問題。在美国，参議員戈德华特等人反对批准莫斯科协定，这方面他們也援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謂核武器計劃。

而这些美国极端分子又是直接关心核武器生产的大垄断資本的传声筒。他們把自己和美国黑人居民的最残暴的压迫者和把亚非人民看成是人类劣等部分的种族理論的維護者等同起来。波恩掌权者同他們手挽手地向莫斯科协定冲击。

在裁軍的道路上，每一个在和平力量的斗争中实现措施，都削弱美国和其他地方的这些最頑固的反动派的陣地。



从这里可以直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意或无意在这里是无所谓的——目前正为这些反动派的交易操心。这当然是推进世界革命的一种奇怪的方式。

中共领导对莫斯科协定的否定，可归因于对和平共处政策的拒绝。他们只是在口头上肯定和平共处。

中共领导否定两个社会制度之间经济竞赛的决定性意义，否定社会主义阵营势不可挡的经济上升对资本主义旧世界发生的革命化作用。

这种对当前最重要的因素的否定，必然导致低估和平和维持和平的力量，导致轻视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持有的战争在目前的条件下已不再是人类不可避免的命运这一观点。

中共领导显然低估核战争的破坏性后果。这一判断为它在去年秋天加勒比海地区危机期间的态度所证实。中共领导人一再提出归根结蒂是低估一场核战争的“论据”。

这种观点同国际工人运动的思想财富和理想是不相容的。不能把工人阶级的斗争分成一方面是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另一方面是争取和平的斗争。在阶级斗争的所有阶段上这二者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国际工人运动自其产生以来的历史，充满着反对统治者发动的战争和民族屠杀的激昂斗争的例子。当工人们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任务时，他们就会作为社会最革命的阶级而凌驾于各民族统治者的争论之上，在国际上和连接各国人民的行动中，为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开辟道路。

## 对和平的责任

但是，在工人阶级已在一国或一些国家掌握政权的历史性

时刻，工人阶级对保卫和确保各国人民和平的责任也随着加重。由此必然产生为列宁所倡导的苏联的和平政策。

鉴于核战争会造成亿万人的毁灭，甚至整个整个民族的灭亡，和平政策的必要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大。但是，由于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这一政策目前首先具有成功和胜利的特征。

只有学究或精神错乱的人才持有这种论点，即工人阶级只有在世界各国都执政的那一天才能对世界和平负责。这将是沒有希望的前景，是絕望的前景。难道中共领导人真正认为各国人民会热心于这样的前景嗎？

相反，正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給予各国人民的对有保障的和平的希望，成了当代激动人心的因素。这一希望不断給国际工人运动增添新的力量，就連許多资产阶级分子，也为一个从事于和平劳动的世界的前景而感到振奋。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民族的屠杀将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和平力量的共同努力而永远被排除。

## 孤 立

如果中共领导人閉目不看这里指出的为列宁所倡导的和平共处政策的說服力，那么和平共处政策也将沒有他們的支持而取得胜利。地球上沒有一种力量，无论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动力量也好，还是已经放弃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則、現在正走着一条最終必将导致自己孤立的錯誤道路的人也好，能够阻擋存在于各国人民心中的对有保障的和平的要求。各国人民正在为实现这一要求而进行着斗争。

与中共领导要制造混乱的企图相对的，是已写在莫斯科协定中的世界和平力量的成就这一远为巨大的、积极的因素。恰

恰由于这个成就，各民族的和平战士现在将更加紧密地团结自己的队伍，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有信心地昂首阔步前进，因为他们确信这个星球的命运取决于他们的行动，确信他们的肩上担负着整个人类的前途。

这特别适合于两个德国的妇女和男人，因为他们已经饱尝并厌倦两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今天他们正在积极地为防止一场可怕得无可比拟的核战争战火而斗争。

### 教条主义的错误

恰恰在这些天，边界两侧的德国人在肯定莫斯科协议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只有在波恩执政的、不负责任的集团才企图用一切手段来破坏莫斯科协定。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口中听到可能是出自波恩的论据，这是多么令人惊异的表演。

在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阵营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劳动人民和一切用理智思考的西德公民站在苏联一边，为争取在莫斯科已大有希望地开始了的缓和道路上的进一步措施而斗争。他们意识到自己对于消除欧洲的危险策源地所负的责任，为实现瓦尔特·乌布利希提出的七点建议而努力。通过这七点建议，和平将得以加强，战争将被排除。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将永不会有离开这一始终一贯的、符合列宁所规定的和平共处原则的和平政策的行为。永不会有。相反，永远生气勃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定将克服和战胜一切教条主义错误。

(译自1963年8月11日民主德国《新德意志报》)

# 論人的力量(节譯)

——駁教条主义关于人与技术关系的論点

弗雷德·斯陶芬比尔博士

## 以铁为敌?

由于人是同其他人一起在一个共同体中思想和劳动，发展生产力，掌握科学技术以及使他們的劳动服务于人类，因此人是最高級的生物。假如把“人”同他当时的生活和劳动条件脫离开来看待，并使之与技术相对立，那么，我們就不能了解人的本质。

例如，资产阶級晚期的文化人类学观点就是这样的，它认为技术愈来愈独立，愈来愈广泛地决定着人类生存的基本領域，威胁着人并正在摆脱人的控制。

然而，若干时候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某些理論家也在宣传类似的、公式化的概念。他們也把人和由他創造的技术看作是两个相互对立的現象。他們不是把人作为技术的創造者和主宰者，而是宣传这一具有詩意的口号：“人胜过铁。”

他們簡單地把资产阶級的“技术胜过人”的口号倒轉过来。对资产阶級的一个謬論作这样的非辯证的否定，当然并不会导致真理，而是导致关于人的本性的非馬克思主义的观念。

## 无稽的对比

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經典作家始終是按人处的历史环境并紧

密結合当时的生产力来看人的。例如列宁的这一口号：“共产主义就是苏維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就应当这样去理解。按照中国某些理論家的說法，列宁也許就該这样表述：“苏維埃政权胜过电气化。”或者不說苏联宇宙飛行員駕馭最現代的宇宙飞船环绕地球飞行这一正确的判断，而应当发出这样荒謬的口号：“苏联宇宙飛行員胜过他的宇宙飞船。”

仿佛創造宇宙飞船恰恰不是为了把宇宙飛行員的力量帶到宇宙的范围中去。那些在我們这个时代力图把現代技术同人脫离开来并輕視技术的人，將來可以試試不用钢铁而飞入宇宙。

显然，人是作为一定的、历史的和具体的階級之成員，以及作为社会能力、科学及其工艺运用、劳动生产率、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某一种历史的、具体的发展程度的体现者而起作用的，而教条主义对人的作用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考虑这些的。

## 道义需要力量

中国教条主义者在他們的論点中，提出了一个与現代战争有关的人的形象，这个形象使一切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感到驚訝。他們援引毛澤东的話說：“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紙老虎。它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規模杀伤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这同样是一种非辯证的观察方式。难道人們真的相信，能够单靠道义、勇敢、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对大規模杀伤的热核武器的力量进行斗争并战胜它嗎？——一个現代的自动生产装置不只是把劳动生产率提高百分之几，就是同机械化了的生产相比也能提高百分之几百。但是，与此相反，現代的軍事技术却能

造成比过去更无比惊人的破坏。

没有一个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核武器能单独决定人类的命运。但是人們怎么能采取这样一个相反的立場，认为“决定战争胜败的不是核武器，而是人民”。在这里，过去的常规武器的战斗和战争的经验被公式化地搬到现代战争的战术上来了，并为一种牺牲亿万人的冒险主义政策辯解。

## 人民群众和导弹

在现时代，正是世界上人民群众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同苏联的军事实力及其掌握最现代的军事技术的能力汇合成一股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斗争的洪流。这样，社会主义就比帝国主义更强大，也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才能迫使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和经济竞赛。只有这样，人民群众今天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并且在这种意义下也决定“战争的胜败”。

中国的领导人以其論点而陷入阿登納(他声称，原子武器无非是大炮的进一步发展)的不光彩的一伙。除此以外，他們还把人同现代技术分割并对立起来，設想出不符合世界历史现时代实际情况的一个原始人的形象。迫于生产力不发达才制造了这样一种說教。最終这一定要导致轻视现代科学技术以及轻视现时代人的真正力量。

## 对人的轻视

教条式地把“人”从技术、即从他物化于物质和精神文化中的活动力中抽取出来，就导致把他的創造力神秘化，并且决不会导致重视、而是导致轻视真正的人，恰好导致轻视人民群众。

中国教条主义者不仅机械地把人同技术对立起来，而且也把个别人同集体对立起来。他们把个人的全面发展看作是同集体精神的对抗，这就导致一种原始的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个性的一律化。因此他们也反对诸如在《雁南飞》、《一个人的遭遇》、《士兵之歌》、《共产党员》等影片中所表现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人的艺术塑造。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把劳动者看作是历史的创造者，而中国教条主义者给现时代的劳动者安排了世界历史的献祭羊的角色。例如，一些负责的中国领导人谈到有可能在一场战争中牺牲亿万人，“胜利的人民”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大踏步地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并保证光辉的未来。”

这里已十分清楚，中国教条主义者的论点归根结蒂是轻视人，尤其是轻视全世界千百万劳动人民群众。在这里设想出来的是一种违反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人的形象。在这里，人不是骄傲的历史的主宰，而是一个实现教条主义的目标的手段。但是马克思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并不是‘历史’把人们作为手段来完成自己的——仿佛历史是一个特殊个人似的——目的，历史无外乎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sup>①</sup>

## 精神错乱

因此，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看法，今天重要的是通过和平共处的道路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引向胜利，而不是由于“历史”而使世界布满废墟。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德文版第98页。

中共领导人从哪里得来决定亿万劳动者生命的权利呢？——既然没有人给他们这个权利，那他们显然是从非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形象中演绎出来的。这一形象，在口头上把人提高到超过铁，实际上是为了把他们贬低成一种令人遗憾的冒险主义政策的对象。我们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权利并有义务十分坚决有力地驳斥这样的精神错乱和由此而产生的政治口号。

（译自1963年8月17日民主德国《新德意志报》副刊）



# 社会主义的和平政策反对冒险主义

《新德意志报》社论

迄今已有七十六个国家在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的莫斯科条约上签了字，另一些政府已宣布准备签字。

如此强有力的表决是前所未有的，令人感动的是，各国人民——其中也有两个德国的人民群众——不是消极地观看着签字行动，而是热情地予以关怀，这是因为他们把这看作是自己多年来顽强地争取确保和平的斗争的一个重大成就。

关于这一点——在这里仅举一些例子——甚至连美国的参议员们也在述说，因为他们在办公室收到了成袋成袋的普通美国人表示赞同的信件；关于这一点，美国各界著名人士的公开言论，特别是美国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所采取的、获得了世界所有科学家热烈支持的行动，也作了证明。从其他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可以听到诸如此类的消息。

\* \* \*

谁也不能否认条约给人类带来的确实的好处，更不能否认由于条约而出现的新的可能性。

随着条约的履行，大气层的污染将要结束。因放射性而引起不治之症、痛苦的死去乃至新生婴儿中毒的危险将被排除。

严格地遵守条约将意味着对核武器的进一步扩散设置一道障碍，因为签字国明确地承担了义务，不仅不在三个领域中进行自己的试验，而且不以任何方式支持、促进或鼓励其他国家进行

試驗。

除这里說明的直接好处外，还获得了在緩和的道路上进一步前进的希望。尼·謝·赫魯晓夫不久前提出的建議——締結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国家和华沙条約国家之間的互不侵犯 协定，凍結和限制軍备預算，减少駐在西德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外国軍隊，对德媾和和解决西柏林問題——在世界公众中得到了贊同和支持。

世界輿論迫切要求在十八国裁軍委員會中以及借 9 月中开始的联合国大会的机会，本着建設性的精神继续进行有关进一步緩和步驟的会談。莫斯科条約中已明确地定了目标，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和平运动所要求的全面彻底裁軍。

这个目标不是通过玩弄魔术，而是要通过各国人民頑强的斗争才能达到的。战争和軍备的热中者的堡垒不是一下子就能攻克的，而是在社会主义陣营所领导的一切世界和平力量逐个地夺取人类敌人的陣地的不断进军中才能攻克的。和平必胜这一前景今天空前地美好，因为連资本主义陣营理智的政治家也承认核战争对于人类是不堪設想的灾难，是无论如何必須防止的。

\* \*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忠于自己一貫的和平政策，它是最初簽署莫斯科条約的政府之一。它以此作出了符合全德国人民利益的行动，并且又一次证明它站在各国人民爭取和平斗争的最前列。它同欧洲和平最危险的敌人波恩复仇政客直接对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莫斯科条約的基础上直接参与了巩固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

应当感謝苏联政府，由于它的努力，莫斯科条約具备了一种世界性的、排除帝国主义歧視政策的性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因此而成了条約的不等的成員。

在西德出陣反对条約的是施特劳斯、勃伦塔諾和其他极端主义者那样的彻头彻尾的复仇主义者和战争販子。在美国企图阻止批准条約的是臭名远揚的种族煽动者和工会敌人参議員戈德华特之流的“狂人”和其他軍火工业利益的代表們，而在法国則是戴高乐將軍的个人政权断然拒絕参加条約。

因此，中共領導在有关莫斯科条約的問題上，采用反动派的这个非神圣同盟的許多論据，甚至用自己的捏造往帝国主义者的磨盘中注水，并企图在和平的拥护者当中制造混乱，这必然令人极为惊讶。

\* \* \*

北京政府发言人 8 月 15 日发表的声明重新拒絕了莫斯科条約，与此相联，还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政策和团结，特别是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政策作了新的、聞所未聞的攻击。这些新的攻击只应得到最严厉的拒絕。

《新德意志报》在 8 月 11 日的一篇文章中已经反駁了中国領導为反对莫斯科条約而提出的虛伪論据。然而北京 8 月 15 日声明中新鮮的东西是这样一个惊人的断語，即苏联为着莫斯科条約而“牺牲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际地位”。

中国領導人下这一断語是多么妄自尊大！他們有意识地把事情顛倒过来，但是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看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际地位由于在莫斯科条約中处于平等的成員身分而得到了加强。

我国政府的签字得到了各国人民和許多政治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家的贊同。許多国家国会中的多次辯論和公众討論，都证明我們的国际威信提高了。

正是在莫斯科条約签字的时候，各国人民特別清楚地看到

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和平的德国，而波恩国家则由于它对莫斯科条约进行捣乱破坏而声誉扫地。

中国领导人自以为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党、政府和人民更能判断，什么东西符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利益，什么东西对德国人民有益。他们极其傲慢地以为能够蒙骗我们的劳动者，使他们相信世界上继续试验核武器比停止核武器试验要好些。

中共领导人企图引用波恩极端分子发出的有关西德政府的一种独占要求——所谓的哈尔斯坦主义——的叫嚷来“证明”自己的厚颜无耻的谎言。

中国领导人是不是现在才注意到在波恩是复仇主义政客在掌权呢？他们是不是现在才对于这些人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态度有点了解呢？这恐怕是很难设想的。

更接近真实的设想大概是，中国领导人在自己目前昏头昏脑的状态中上了波恩政策的伎俩的当。这可能也是他们所宣传说教的“战略上藐视”敌人这一方法的一个结果。

显而易见，苏联政府断然拒绝波恩“代表全德国发言”的要求这一事实，也是不合中国领导人的反苏方案的。

\* \* \*

波恩当权者每当他们的复仇政策陷入困境时，就更加大声地叫嚷波恩国家所谓有权代表德国的两个部分，这本来就是波恩当权者的一个策略。这样做是要向西德公众和国际公众隐瞒波恩政策的失败。

波恩政府绝望地拚命抗拒签署莫斯科条约有三星期之久。鉴于各国人民施加的压力，鉴于受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坚决果断态度影响的西德居民的日益增长的愤慨，它后来毕竟签了字。波恩被迫降低要求，这是尽人皆知的。只有在北京才有

人不願意承認這一點。

人們在波恩比在北京更明白，受莫斯科條約威脅的是波恩的原子武裝計劃，而絕不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國際地位”。

西德通過兩條不同的途徑——在西德—法國條約規定的軍事合作的範圍內以及借助於美國擬訂的所謂多邊原子武裝的計劃——謀求自己對原子武器的控制權。

前一件勾當的伙伴之一戴高樂將軍，由於拒絕莫斯科條約而引起世界輿論和許多國家政府的公憤，而波恩—巴黎軸心的破壞活動則遭到了可恥的失敗。莫斯科條約簽訂以後，法國軍國主義者的原子武裝比以前更多地遭到各國人民的反對，這對於波恩的計劃是不無影響的。

華盛頓和倫敦政府在簽署莫斯科條約而承擔了義務以後，它們就更加必須考慮各國人民的意志。

只有少數美國人和英國人才漠不關心地對待像希特勒將領那樣臭名遠揚的和平敵人可能取得對現代大規模毀滅手段的控制權這一前景。但是現在締結了莫斯科條約以後，與此特別有關的美國人民、英國人民，將更加反對並且更加堅決地反對波恩極端分子及其美國同謀者的危害公眾的原子武裝計劃。

波恩的政客們近幾星期來不得不承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對莫斯科條約採取的態度與千百萬西德公民的意見是一致的。這樣，莫斯科條約對於今後反對西德復仇政策和原子戰爭的鬥爭就有巨大的積極的意義。

\* \* \*

這些事實證明，中國領導人對莫斯科條約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國際地位”所提出的悲觀主義的預測，是根本錯誤的。而莫斯科條約迄今的影響則表明，在國際緩和道路上每前進一步，第一個和平的德意志國家的國際地位就必然會得到加強。

中共領導也在1960年11月《共產黨和工人黨聲明》上簽了字。聲明中說，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在反對西德軍國主義的侵略野心的鬥爭中起着特別巨大的作用，它在這個鬥爭中應當得到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和一切愛好和平的人民的 support。

中共領導人正在破壞他們所承擔的這一義務。中共領導人目前的誹謗運動相反地意味着直接慫恿波恩掌權者。大家知道，波恩掌權者直到現在還在妄想離間蘇聯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從而孤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

如果中國領導人真正關心“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國際地位”，那他們就應當遵循和平共處的原則，奉行促進國際緩和的政策。他們所做的卻恰恰相反。

根據這一切，人們有理由問，中國領導人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採取這種態度的動機是什麼？他們究竟想做什么？顯而易見，他們想要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放棄由德國統一社會黨第六次代表大會所制訂的和平、理智和善意的建設性政策，而去執行中國領導人自己奉行的那種加劇緊張局勢的冒險主義政策。

這當然只會正中帝國主義者的下懷。然而，這樣一條危險的路線卻完全違反和平、社會主義和德意志民族的利益。應當告訴中國領導人，他們進行這樣的投機是走錯路了。

\* \* \*

由於以上所舉的所有這些原因，人們有足夠理由懷疑，北京絕不是關心“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國際地位”，而更多的是企圖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特別是在蘇聯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之間播下不信任和不和的種子。但是這個意圖是如此卑鄙和可笑，人們對此不需要再多費口舌了。

德國統一社會黨堅決捍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純潔性，捍衛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統一，捍衛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和德蘇友

誼。

德國統一社會黨全力爭取實現德國統一社會黨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決議。第六次黨代表大會最突出的標志之一是大會表明了我們兩黨——蘇共和德國統一社會黨——思想和行動的完全一致。尼·謝·赫魯曉夫同志說過，蘇共和德國統一社會黨在一切問題上是完全、根本上一致的，我們的黨員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公民感到這是崇高的贊賞和榮譽。

第六次黨代表大會提出的任務是，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和不懈地進行爭取和平共處、反對波恩復仇主義者的危險政策而鬥爭。在實現這個任務的時候，我們得到蘇聯兄弟般的支持。蘇聯盡最大的力量堅決主張消除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殘迹，主張對德媾和和解決西柏林問題。

正是蘇聯一再在全世界堅持，消除歐洲戰爭緊張的策源地必須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積極參加。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在莫斯科條約中的成員身分，是符合這些政治要求的。

在這個條約產生的時候，社會主義國家的合作經受住了考驗。列寧的和平共處政策正在勝利地前進。事實該會促使中國領導人重新審查自己的政策，尤其是他們對莫斯科條約的態度。

（譯自1963年8月25日民主德國《新德意志報》）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态度的声明

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的缔结，已得到各国人民最广泛的赞同。八十多个国家已经签署了这个条约，另一些国家已宣布准备签字。各国人民把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的莫斯科条约看作为他们争取缓和局势、裁军和持久和平的努力的第一个成就。

莫斯科条约是在通向有保障的和平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为了最终地和永远地消除原子战争的危险，还需要一切和平力量作出艰巨的努力。但是，凡是关心和平和裁军的人，都不会忽视这个条约的意义。条约的履行将本着人们的生命和健康的利益，防止大气层和水继续受放射性的污染。严格遵守这个条约，将使原子军备竞赛受到某些限制。最后，不可否认的是，莫斯科条约的缔结为进一步采取缓和步骤开辟了可能性。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最初签署莫斯科条约的国家之一，这再次证明了它是站在全国人民争取和平斗争的最前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在莫斯科条约上签字，得到了我国人民的一致赞同和全世界的反响，并且大大加强了它作为和平的德国的国际地位。

鉴于这种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63年8月15日的声明中用诽谤的方式反对莫斯科条约和苏联的和平政策，并且高傲地自认为能判断莫斯科条约的缔结是否符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利益，这就尤其令人不可理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企图以其声明再次贬低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为缓和国际局势、巩固和平、禁止生产和使用核武器以及全面彻底裁军而进行的坚持不懈的、有系统的努力。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坚决拒绝中国政府声明中所包含的中伤和诋毁。因此，这个声明已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退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也断然拒绝中国领导人以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其中也包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名义说话并干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政策傲慢态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破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联之间的兄弟关系的企图，是向西德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的磨盘中注水，播种不信任和破坏社会主义国家间兄弟关系这种毫无希望的企图，只对帝国主义战争贩子有利。

颇能说明问题的是，中国政府和中国报刊的诽谤性声明被波恩政府(它对有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每一句真话都进行压制和诋毁)愉快地接受和散播了，并用来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进行煽动。这表明中国政府的声明怎样在冷战中从思想上为最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者帮忙。

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兄弟关系是建立在巩固的政治、经济和道义的基础上的。这种关系在多年的符合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合作和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共同斗争中经受住了考验。

苏联主张和平解决德国问题，赞成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建议，主张从经济上和政治上加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是举世皆知的。因此，中国政府所谓损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际地位的说法是完全荒谬和站不住脚的。

自从由于帝国主义的分裂政策而在德国土地上形成了两个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以来，苏联就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权的坚决捍卫者。对于苏联来说，尊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主权是解决德国问题的任何一个办法的基本条件。出于这个原因，苏联也主张接纳两个德国进入联合国。苏联站在华沙条约国家的最前列，以自己的全部威望和必要手段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61年8月13日措施，从而有助于巩固和平并确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独立不受西德帝国主义者的阴谋打击。

另一方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不得不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近几年来对于确保欧洲和平的斗争问题的注意愈来愈少，并且低估了西德帝国主义及其复仇主义政策的独立作用和危险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显然是现在才发现西德军国主义所造成的危险，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积极支持下，则是一向在对重新复活了的西德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和它的核武装进行坚决的斗争。

与此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反对就防止原子军备竞赛的部分措施达成协议，并急切地要求拥有自己的核武器，因而事实上支持了复仇心切的西德军国主义对原子武器的要求。对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试验核武器的莫斯科条约的猖狂攻击，正在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带到与波恩—巴黎轴心相同的一条路线上去。

中国领导人最近断言，西德军国主义者欢迎莫斯科条约并对苏联政府大加赞赏这个条约，这显然违反事实。全世界都知道，中国领导人也知道，这个条约遭到西德最富有侵略性集团的多么猖獗的反对。只是在各国人民和大部分西德公众的压力下，特别是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平政策的压力下，波恩政府在耍了一些伎俩后，才不得不在莫斯科条约上签了字。

西德复仇主义集团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进攻，证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奉行正确的政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莫斯科条约的赞成态度，更进一步提高了它的国际威信，更加加强了它在争取欧洲中心和平的斗争中的地位。

假如中国不是接受并散播来自波恩的复仇主义的煽动性声明，而是支持并宣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就两个德国限制军备和放弃武力以及就它们之间关系的正常化而提出的建议，那对于我们的共同事业会更加有益。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通过签署莫斯科条约，使两个德国签订一项理智和善意协定的建议获得了新的分量。这个步骤有助于加强西德的和平力量，有助于揭露反对条约的军国主义势力是和平和谅解的敌人。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整个政策始终是从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致和团结出发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依靠着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的兄弟般合作，这种合作对于卓有成效地进行反对西德军国主义的斗争，对于对德媾和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根本条件。

但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不得不遗憾地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因作为社会主义大家庭在欧洲的西部前哨这一复杂的处境而产生的要求，没有作必要的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仅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政治斗争支持不够，而且强力扼杀我们两国的经济合作。

在1958—1962年期间，中国政府愈来愈多地缩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间的贸易。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批供应的停止以及许多工业订货的撤销，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带来了可观的损失，其后果至今还没有完全克服。

无疑，中华人民共和国近几年有很大的经济困难。但是德意

志民主共和国人民不能理解的是，中国政府扩大同资本主义国家(其中包括对帝国主义的西德)的经济关系，而同时却把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合作压低到我們两国間前所未有的低水平。

积极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爭取和平解决德国民族的切身問題的斗争，积极支持它在经济上的加强，会是中国政府为束縛西德帝国主义和軍国主义的最好的貢獻。爭取欧洲中心和平的斗争是爭取世界和平的斗争的一个重要組成部分。这个斗争的最后胜利不仅符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利益，而且符合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这些国家的人民的利益，因而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令人遺憾的是，中国政府看来忘記了这个事实，并且企图把各国人民爭取和平的斗争引入歧途。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表示希望中国政府回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道路上来。到那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間的关系也将在爭取維護世界和平、建設社会主义和反对西德軍国主义的斗争中发展和加强。

(譯自1963年8月29日民主德国《新德意志报》)

## 辯証法还是形而上学？

弗里茨·庫姆夫

在已经变得必要的、同中共领导人的教条主义立场所进行的爭論中——关于这些問題《統一》杂志已发表了一些文章——也可以看出这种立場的哲学基础是站不住脚的。編輯部收到的下面这篇文章談到了問題的这方面。但文章只局限于中共领导人在最近公开提出的一些問題。

《統一》杂志編輯部

仔細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教条主义的极端左傾的观点，就可以看出：当前同他們的爭論也具有專門的哲学和一般方法論的一面，因为錯誤的政策很难和正确的哲学联系起来。当然，对这一問題需要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分析，在这里不准备这样作。但是只要把中共领导人最近公开提出的某些問題置于辯证唯物主义的光芒之下，我认为就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最近中国领导人把他們的攻击特別指向关于停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間和 underwater 进行核試驗的莫斯科条約。可以特別清楚地看出，这些攻击是对馬克思主义辯证法原則的背离。列宁曾把“观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論，而是自在之物本身）”<sup>①</sup>，称为辯证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在讀今年8月15日中国政府发言人的声明时，人們从表面上也得到这样的印象，似乎

<sup>①</sup> 列宁：《哲学筆記》，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09頁。

它也是这样进行分析的。但它实际上是以詭辯哲学代替了辯证法。

这首先表現在：中国领导人避而不談这个条約的实际任务和意义，而只是抓住这个条約所沒有解决的，也是它所不能解决的問題。虽然这个条約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創造了比較有利的条件，但是它並沒有消除帝国主义侵略的危險。这一点，苏联政府已一再強調过。但是中国领导人迴避对事物本质进行精确的分析，而断然拒絕这项条約，其理由是这个条約沒有一下子从世界上把帝国主义侵略的危險消除掉。

这个条約在客观上所应完成的主要任务之一就在于：即使不能阻止原子武器的进一步扩散，也要使它难以扩散。由于原子武器的进一步扩散无疑将增加战争危險，因此，这个条約有助于减少战争危險。中国领导人不考虑其他方面的具体情况，仅抓住了这一点，即只要原子弹还没有完全被禁止，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掌握了原子弹就有利于防止原子战争，他們并以此来論证。他們完全忽視，苏联已掌握了足够强大的原子武装力量，可以保卫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爱好和平的国家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原子武器的进一步扩散就会使原子武器也完全落入像西德复仇主义者們的手中，从而也导致战争危險的根本加剧。

我认为，中国领导人对莫斯科禁試条約的立場特別清楚地表明，以一种从主观願望和目的出发的任意把現象的某些方面同整个現象分割开来和顛倒黑白的做法代替了如列宁所要求的“观察的客观性”。由此而产生的观察的片面性就导致对个别因素的偶像化，这种偶像化就是形而上学思想方法<sup>①</sup>的特征。

显然，中共领导在莫斯科条約的事件中所显示出来的态度，

---

<sup>①</sup> “形而上学”这个詞在这里应按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使用的那个意思去理解，即反辯证法的意思。

不是个别情况。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与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相矛盾的特殊路线所涉及到的結論，都不是从辯证唯物主义的分析中得出的。中国领导人对当代矛盾问题的分析也特别显示了这一点。“就本来的意义讲，辯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sup>①</sup>大家知道，我們能在列宁的《哲学笔记》中找到这个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基本論点。同样，我們也能在毛澤东的著作《矛盾論》中作为引证而讀到这个論点。但是，今天中国领导人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释和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矛盾的学說的呢！

在他們1963年6月14日致苏共中央的信中提出了一系列并列着的矛盾，而他們否认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間的矛盾是我們时代的主要矛盾。然而，这个結論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代表們在1960年莫斯科声明中得出的。

唯物辯证法要求，在一系列具体的矛盾中找出根本性的矛盾，并且精确地研究它与其他一些矛盾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有正确的实际行动，因为只有正确地分析矛盾才能够认识决定社会发展方向的主要力量。众所周知，1960年莫斯科声明得出了一条与此相关的結論：“我們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在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sup>②</sup>

中共领导人所做的是另一回事。一方面，他們以折衷主义的方式把我們时代的矛盾并列地摆出来，而不去具体地分析它們相互的依賴及联系。另一方面，他們试图将其中的一个矛盾称为具有决定性的矛盾，因而陷入了一个原則性的理論錯誤：他們把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看作是主要矛盾。据此，他們在致苏共中央的信中強調，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

①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56頁。

② 1960年第12期民主德国《統一》杂志第1796頁。

是“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最終胜利取决于这些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

无庸置疑，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我们时代最有意义的革命事件之一。没有人比弗·伊·列宁更尖锐、更早地看到这一点，没有任何国家比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个斗争作了更有效的帮助。但是这种情况不容許任何一个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我们时代的主要矛盾問題上采取一种政治上錯誤的和哲学上折衷主义的立場。像苏共二十二大文件中所作的那种客观分析清楚地表明，目前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日益成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大家知道，首先是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随后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为世界广大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創造了决定性的前提条件。在过去几世紀受压迫的許多国家中，各国人民反对殖民压迫者的具有英勇牺牲精神的斗争过去从沒有能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完全改变了这种情况。这些都是历史的事实，这些事实证明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的正确性，任何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背离，都不能使它失去光輝。

我认为，中国领导的这些錯誤的世界观——方法論的根源在于：用主观主义的折衷来代替唯物辩证法。因为他們的观点是把实际上有机地連成一体各种因素任意地拼凑在一起，他們不是以对事物的客观分析，而显然是按照主观目的来突出某些因素及矛盾的。

中共领导人的主观主义和折衷主义是与其对阶级力量的錯誤估計联系在一起的。突出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的观点本身——不管是明显說出来，还是沒有說出来——就包含着这个結論：世界革命的主要力量不再是国际工人阶级，而更



可能是小資產階級了，因为这个階級在经济不发达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常常是站在前面的。这样，中国领导人明显地在关键问题上在实际上和理論上都离开了馬克思列宁主义。錯誤理論的立場会导致他們在实践中很少注意经济发达国家中无产階級的階級斗争。这种情况也出于上面已提到过的論点，根据这个論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是“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同时，甚至对经济发达国家的工人階級的先鋒队进行恶毒的攻击，例如攻击意大利、法国和美国的共产党。由于低估经济高度发达国家的无产階級的階級斗争，中国领导人在向修正主义的、帝国主义的思想家靠攏，这些思想家硬說，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階級革命和階級斗争特別在这些国家中失去了它們的意义。

与此有关的是另一个哲学上十分重要的問題。馬克思主义的辯证法是唯物辯证法。但是在一些情况下，中国领导人的观点明显地背离唯物主义的立場。例如，这表现在对经济竞赛的估計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范围内提出具体任务以便在经济领域內赶上和超过帝国主义国家的时候已明显地过去了。今天在中国的文件中已不再提到这个任务了。甚至像6月14日的信那样，对它采取了否定的态度。

但是，这种观点意味着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論点。众所周知，历史唯物主义談到生产和物质生活再生产的优势。但是物质生活的再生产是在創造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特别是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而发展起来的。弗·伊·列宁关于劳动生产率是新的社会制度最終取胜的决定性之点的深刻的唯物主义认识早已属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财富。使人更难以理解的是，这些思想在中共领导人关于当前基本問題的論点中一点也沒有起作用。这种对唯物主义的背离在实践中会导向何处去呢，卡尔·馬克思早在1845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十分鮮明地說過：“……另一方面，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絕對必需的實際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有**貧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貧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爭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說，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sup>①</sup>中国領導人也完全忽視了弗·伊·列宁的如下指示：“現在，我們是用自己的经济政策对国际革命給以主要的影響。”<sup>②</sup>这种思想是出于历史唯物主义，并且沉浸着政治和经济的辯证統一。但是中国領導人似乎恰恰忘記了这种辯证的統一。他們形而上学地把政治同经济割裂开来，并且把它們相互对立起来。弗·伊·列宁认为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表現。政治同经济是不可分割的，同时经济也正是在必須符合政治利益情况下发展起来，这是很清楚的。

如上所述，这不仅是在理論上背离唯物主义的立場問題。同这个錯誤的理論相适应的是一种主观主义的、忽視社会发展客观規律的行动。几年来，中国領導人已经在实际上停止了通过紧密的经济合作来促进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经济發展。他們在会明显地造成不利后果的情况下，窒息了同包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内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貿易。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的另一面或許应当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中去找。众所周知，伴随上述錯誤理論而来的是实际試驗，这种試驗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特殊作用的观点的，是不顧生产力的水平而去“发展”生产关系。这难道不是在实践中以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观点为指导嗎！

另一个重要問題是对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間和平共处政策的性质以及和平共处与世界革命运动相互关系的估价問

① 《馬克恩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9頁。

② 《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27頁。

題。中国领导人反对把和平共处看作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不仅如此，他们还誹謗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奉行的、以贯彻和平共处为目标的对外政策。

中共领导人实际上把和平共处政策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作为互相排斥的因素而对立起来。实际上这两者是完全不可分离的。建筑在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和平力量而改变了的力量对比基础之上的和平共处本身，就是劳动人民和各国被压迫人民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斗争的一个因素。和平共处为这个斗争创造着有利条件。此外，和平共处还保证各社会主义国家飞速地进行经济建设。因此，社会主义对全世界劳动者的影响又一次得到加强了，同时这种影响使群众在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发挥更大的积极性。与此相反，中国政府发言人直言不讳地说：“苏联领导人还企图用三国条约的签订，来证明他们从苏共二十大以来所执行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是正确的。拿耻辱来夸耀，这只能叫人笑掉了牙齿。”<sup>①</sup>这不仅显示了中国领导人在他们反苏攻击中是走得如此之远，而且——如果从哲学上来看这个行动的话——，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同样以形而上学代替了辩证法。

由于中国领导人在错误地分析时代的特点的基础上低估了当前世界斗争中的主要力量——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所以他们也必然走向错误地回答关于战争与和平以及关于争取和平同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关系的问题。中国领导人显然不善于在社会关系和相互联系的具体事物中找出我们时代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相互联系的有机体中找出决定性的因素，就能正确地认识所有的其他方面和因素，从而从总体的角度上正确地确定

---

<sup>①</sup> 1963年8月21日苏联《真理报》。

这些关系。相反，如果缺乏这种认识，或者用错误的论点来代替这种认识便不可能正确地了解个体和总体。目前情况也是如此。中国领导人由于对我们的时代，特别是对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缺乏正确的估计，所以不能正确地判断国际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他们首先没有看到，由于最近十五年来重要的变化而使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越来越成为世界决定性的因素（这种情况已导致了国际力量的重新组合）。当然，中国领导人并不是简单地忽视世界的变化。他们的错误首先在于他们否认这种发展引起的质的变化。这在实际上意味着，中国领导人没有看到能够阻止战争势力的力量。对这种变化的客观分析增强了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这种认识：阻止热核战争的斗争是世界革命运动的一项中心任务。

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我们时代提出了许多复杂的问题和任务，如果没有完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和完成这些任务的。用抽象的定义，用折衷主义和诡辩手法是永远也不能完成这些任务的。中国领导人最喜爱用“武装斗争推翻帝国主义”的框框来解决所有问题，而不去逐个地分析，用什么样方法进行斗争和在什么样条件下以什么样方式展开革命运动才是正确的。形而上学的、抽象的思想方法同宗派主义的行动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如果我们在中国的刊物中经常找到如“东风压倒西风”这种摒弃精确分析和具体地规定任务的完全抽象的和十分神秘的公式，那也是不足奇怪的。在“东风压倒西风”这样一种定义中，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最后踪迹也消失了。这样也就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用另外一些思想代替了阶级原则，在这方面我认为是有民族主义的以及甚至有时是种族主义的因素。例如，这一点表现在中国政府领导人向日本反动分子松村所作的如下

表示：东方终究是东方，亚洲人应该改变世界历史。

\* \* \*

我认为，上面所述的表明中国领导人在政治和思想意识问题上的特殊路线是同严重的哲学上的错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哲学上的错误首先在于以形而上学代替唯物主义辩证法。从这一切自然就会得出这样的印象：随同中国领导人在一系列根本政治问题上的错误观点而来的是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正是表现出十分陈旧的、显然目前还未克服的中国教条主义哲学流派的倾向。这些流派直至不久前还对中国社会的精神生活有巨大的影响。孔夫子主义是大家知道的，这个孔夫子主义在统治阶级手中僵化成了背诵死板的公式，并把它教条主义地用于生活，但是直至1912年前它还是旧中国统治阶级的国教。卡尔·马克思有一次说过，其大意是如此：我们目前生活着的人肩负着许多世纪来传统的重荷。我们知道，这些重负是不能一下子全部消除掉的。但是，几世纪来这些重负的残余是否在中共领导的世界观——方法论的问题中还经常在起重要作用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很强烈，所以这种情况就更显严重。

为了克服政治上的缺点，应当相应地检查一下哲学领域内的问题。这样做无论如何是十分正确的。弗·伊·列宁当时也曾一再指出，在工人运动中的各种问题上出现的极左观点其根源就在于背离了革命的辩证法，用折衷主义、诡辩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来代替革命的辩证法。

（译自1963年9月7日第9期民主德国《统一》杂志）

# 烏布利希1963年9月9日在来比錫 选民代表會議上的講話(节譯)

## 和平共处

中国领导人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应当评价为背离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的极端左傾。而且这种态度是违背共产党和工人党共同作出的決議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們也完全支持苏共和苏联的态度，并且只能表示希望人民中国的领导有一天会回到共产党和工人党共同确定的道路上来。

## 中共錯誤的根源

中国领导人反对停止核試驗的莫斯科条約的态度，引起了各国人民的反对和憤慨。这种态度也是违背1957年和1960年共产党和工人党共同作出的決議的。

由中国领导人引起的公开的分歧，只会导致他們在世界上的孤立，并且正在損害国际和平运动。

曾經有人問我，什么是产生这种背离馬克思列宁主义学說原則的极端左傾的原因。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声明和德国統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声明中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直到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和1957年共产党和工人党會議时，在基本問題上都曾經存在着广泛的一致。当然，鉴于各个国家不

同的发展条件,在某些問題上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然而,这里所說的是关于战略和策略的意見分歧。我回想起,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曾經不得不对极端左傾进行激烈的斗争。我想起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傾”幼稚病》这一著作和列宁在战争与和平問題上同托洛茨基存在的分歧。

显然,中国领导人被他們在1959年以前所取得的经济上的进展冲昏了头脑,因而认为他們可以不遵循社会主义的经济規律,通过走向共产主义的“大跃进”而大大縮短过渡时期,并且可以为整个世界指出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新道路。以只川意识形态手段就足以把人們帶到共产主义作为出发点的这种唯心主义观点,导致了超越发展阶段的試驗。結果是严重的挫折。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是十分现实地思考的,他們了解社会主义的意义就在于巩固工农政权和逐步改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把巨大的经济力量用于中国的原子武装,对于中国人民和社会主义建設是沒有好处的,而用于获得经济高涨,用于发展工农业和为人民創造更多的衣食,倒是有益的。

这种政策的根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强烈影响,这种影响在这个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起着巨大的作用。

不能用口号和行政措施来代替经济規律的认识和作用。这种极端左傾的看法在对外政策上表现为提出边界問題(这是同万隆協議相违背的),而現在表现在反对和平共处政策的态度上。我們德国統一社会党的党员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公民十分了解,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多么艰巨复杂。但是我們既沒有过高也沒有过低估計帝国主义。显然,中国领导人觉得反对帝国主义的国际斗争进行得太慢了,他們相信有可能通过“大跃进”,即通过軍事冲突的途径来加速这一发展。中国领导人不把

力量用于这一主要任务，即通过良好的合作来加强本国和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以此协助创造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上的经济优势，并更多地帮助其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帝国主义的民族国家，反而认为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决定性的。他们低估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同年轻的民族国家合作并给它们以支持的意义。

我们确信，生活的现实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健康发展也将使中国领导人放弃他们的主观主义和促使他们采取现实的政策。

（译自1963年9月10日民主德国《新德意志报》）



# 馬克思列宁主义和爭取和平的 斗争(节譯)

赫尔穆特·內夫博士

## 防止一次新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

工人阶级和其他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斗争不是徒劳的。他们的英雄气概是无比的，付出的牺牲是巨大的。可是工人阶级改变了世界，创造了崭新的国际力量对比。今天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决定着历史的进程，从而决定着战争与和平的关系。1945年以后的事实证明：世界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直接影响下，首先是在苏联的实力的支持下，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结束了，1953年6月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战争挑衅和1956年秋对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战争挑衅被粉碎了，帝国主义对埃及和黎巴嫩的侵略在萌芽中就被扼死了；1962年10月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入侵也被打退了。苏联领导下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力量在1945年以后一再阻止了国际反动派所策划和准备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所有这些事实同中国领导人的意见都是直接对立的，他们——不承认新的世界力量对比——把战争提高为“我们时代的规律”。他们正在发展一整套关于“革命战争”、“战争是斗争的最高形式”、“战争是新社会的助产士”和“战争是通往新时代的桥梁”等理论。这种看法是根本错误的，是有害的，因为它会滋

长人民群众对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的不信任，因为它給爭取和平的斗争，因而也給反帝斗争增加困难。

## 不仅是为了一小撮人

在国际力量对比、作战和军事技术都已发生了根本质变的现代时代，中国领导人关于世界战争万能和世界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正在成为一种极为危险的意识形态。中国领导人贬低原子战争的严重性，把这样一种战争所造成的损失仅仅称作是“次要的事情”，并断言战争结束后“决不是人类的毁灭”，而是会创造出“高千百倍的文明”。为了人类的利益，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拒絕这种野蛮的所谓的“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一小撮人还是絕大多数人能在社会主义中生活，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于这个问题决不是漠不关心的。因此他們拒絕中国领导人的反馬克思主义、反人道主义的論点，中国领导人宣传这样一种看法：即使人类在一次爭取社会主义的战争中死去一半，剩下的一半人“仍然”会在热核战争的废墟上“比过去更好地”建設社会主义。从这种观点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一些中国领导人沒有理解工人阶级使人类永远摆脱战争恶魔这一世界历史性的人道主义使命的实质，不能正确估計国际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

## 我国人民记忆犹新

德国人民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巨大牺牲还保持着辛酸的回憶。如果发生一場原子战争，德国人民将同世界各国人民一样蒙受无比可怕的损失。西德将在这样一場战争的最初时刻像一支蜡烛似的燃尽。但是，我們希望魯尔和来因河畔的工人、汉堡

的碼頭工人、薩尔州的矿工、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巴伐利亚的农民，全体德国人民都能到达社会主义，建設和平、幸福和富裕的生活。因此我們不能同恐怖开玩笑，不能贊成中国领导人宣布的“原子弹是一只紙老虎”的口号。

恰恰是日本人民组织了反对原子武装日本军队和反对变日本为美国的一个核武器儲存处的最强大的群众行动，这并不是偶然的，日本人民在广島會上上了一堂关于原子武器破坏力的可怕的实观課。日本人民过去和現在都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死亡条約的历史性斗争，因为广島的恐怖永远記憶在他們的心上，而且是一种鞭策的力量。但是，倘如我們向任何一个普通的日本人提出中国人的論点——“原子弹是一只紙老虎”，他岂不感到我們是在嘲弄他嗎？

在北京《人民日报》今年年初发表的社論《論陶里亚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中，作者写道：“陶里亚蒂和某些人热中于宣传核恐怖。”

現在，共产党人的方向究竟应指向何处？是向群众說明核武器的破坏力并动員他們为爭取和平而斗争呢，还是把重点放在反对所謂的核恐怖上，从而抹煞核武器的破坏力呢？“核恐怖”的概念在这里是完全用錯了地方。共产党人有責任向群众說明关于热核战争的巨大危险的真实情况。中国领导人在同陶里亚蒂同志的論战中写道：“不論它（指帝国主义。——赫·内）有大炮牙齿，有坦克牙齿，有火箭牙齿，有核牙齿，它們都不能改变帝国主义的腐朽、沒落、紙老虎的本性。”

然而，这是对各国人民的狡猾的欺騙。它最終发展成这样一种卑鄙的論点：“既然亿万人必然死亡，那就不必采取什么行动了！放心吧，帝国主义有一种腐朽、沒落、紙老虎的本性！”难道人們能用这种“哲学”建立起一个为限制和禁止核武器、制服

和击退侵略者的和平拥护者的最广泛的战线嗎？

## 行动的指南

中国同志在上述文章中一再引证核战争的结果被毁灭的是帝国主义而不是人类的论点。这个论点是对的。它是世界热核战争合乎规律的结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预见。但它并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与和平拥护者的行动方向。行动的指南是1960年11月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中的原则：

“现在，对于所有民主和爱好和平的力量来说，再没有比使人类免遭世界热核灾难更迫切的任务了。现代军事技术的空前破坏性，迫切地要求把所有反对战争、爱好和平的力量行动集中于防止战争。不能把反对战争的斗争拖延到战争爆发的时候，因为那时对于世界许多地区和那里的居民来说，进行斗争将会是太迟了！”

如果爆发一场热核战争，对于世界许多地区和那里的居民来说已经太迟了，正是这个论点，清楚地说明，由于中国同志不断进行反对所谓核恐怖的斗争，并且只抽象地强调帝国主义将在一场世界热核战争中灭亡，从而他们就背离了1960年莫斯科声明，避而不向各国人民谈出全部真情，实际上是在引诱各国人民走入歧途。此外，这样一种口号是向波恩军国主义者的宣传磨盘里注水，这些军国主义者颂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把核武器放在西德以及他们自己实行原子武装是十分“正常的事”。

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感到自豪和幸运的是，由于苏联的威力，美国帝国主义者未敢继广岛和长崎之后第二次对人们使用原子弹。中国人民以及朝鲜、越南、埃及、古巴等国人民也都受到战无不胜的社会主义，受到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全面的力量的保

护而免于被置入原子战争的地狱。

## 人类要和平

与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不相信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革命化作用相一致，中国教条主义者断言，战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的、最终唯一有效的形式；只有“战争”才能“反对战争”。他们竭力为自己的错误见解辩护，却不愿看一看，争取和平的斗争今天已成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最有效的、最广泛的运动了。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工人阶级和居民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立后十四年中用自己的始终一贯的、顽强的和平斗争已证明了这一点。他们依靠华沙条约缔约国的力量，用和平的手段制止并击退了战争力量——西德帝国主义及共同谋者。各国人民的绝大多数随着争取和平的斗争而日益加入反对帝国主义的战线，这是现代每天都在重复的重要教训和经验。中国领导人在世界和平运动和国际民主群众组织中要求每一个和平拥护者立即发表反帝宣言，以此作为共同前进的先决条件，这是中国领导人对和平斗争采取宗派主义的、说空话的态度的表现。与此相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从这一被历史证明了的事实出发的，即：充满了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的和改良主义的看法的人，在和平斗争的过程中会相信帝国主义的野蛮性质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

（译自1963年9月11日民主德国《新德意志报》）

## 在第三屆世界新聞工作者會見之前

——关于中国新聞工作者協會的分裂活动

格奥尔格·克劳茨

中国新聞工作者協會决定示威性地不参加即将召开的第三届新聞工作者會見，以继续它的分裂活动。这种活动早在去年夏天国际新聞工作者協會布达佩斯會議期間就已经开始了。中国新聞工作者背着會議的領導机构，利用这次大会——如同其后所表明的——，用蠱惑人心的空話和語言离間来自非洲和亚洲国家的国际新聞工作者協會的代表，并拉他們参加一个特別會議。

这种分裂活动在今年4月继续进行着：为了給一个亚非的組織命名，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召开了亚非新聞工作者會議。每一个进步的新聞工作者本来是会极其热烈欢迎建立亚非同事的这一組織的，假如在建立这个組織时分裂行动不是进行得过于明显的話。

苏联新聞工作者協會未被允許参加會議和新建的組織，为之提出的民族主义的理由是，苏联“不是一个亚洲国家”。国际新聞工作者協會也未被允許派代表出席會議，虽然这个世界性組織在亚洲和非洲的年轻的民族国家中有許多成員協會、个人會員、朋友和拥护者。在中国人的鼓动之下，甚至沒有注意同国际新聞工作者協會的合作。

意图是明显的：中国同行們奉命分裂进步的新聞工作者的

世界組織——国际新聞工作者协会，以“地理的”，甚至以“种族的”口号——这儿是有色人，这是白种人——，培植一个必須听命于中国的特殊組織。

我們从前已经经历过国际新聞工作者协会的一次分裂：冷战开始时，以前一直是統一的新聞工作者世界組織，被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代表分裂了，成立了設在布魯塞尔的作为冷战組織的新聞工作者“联合会”。但是，国际新聞工作者协会仍然是具有善良願望的新聞工作者的、广泛的、活动在所有大陆上的、不断巩固和发展的世界性組織，它树起了爭取和平和民主、反对战争和种族煽动、爭取民族独立、反对殖民压迫和維護新聞工作者道德风尚的斗争的旗帜。国际新聞工作者协会及其成員組織本着这种精神，主张新聞工作者要有高尚的道德。

如今中国新聞工作者正企图进行第二次分裂！中国新聞工作者协会以它拒絕参加即将召开的第三届世界新聞工作者会見的“理由”，表明了它所采用的企图勾引无经验的新聞工作者并濫用他們进行其分裂活动的这一蠱惑人心的、不誠实的方法的特点。中国的声明中說，这次会見将会“故意避免对美国帝国主义采取反对的态度”，因而“不符合不同国家的民主新聞工作者的要求”。

中国人在这里如同在其他情况下一样，竟擅自用“其他国家”的名义說話，除此以外，这种說法也是一种誹謗，不幸，我們自若干月来已常常听到这种类似的說法。

世界会見的召集者是国际新聞工作者合作委员会。国际新聞工作者协会及其成員协会組成并促进了这次世界会見，这就保证了这次会見能加强各大洲具有善良願望的新聞工作者在爭取和平、进步和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煽动的斗争中的广泛的統一陣线。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国

家的新聞工作者最了解，他們应当如何感謝國際新聞工作者協會及其成員協會方面的以及國際合作委員會方面的鼓勵和援助，應當如何感謝前兩次世界會見。

（譯自1963年9月12日民主德國《新德意志報》）



# 和平共处是社会主义对外政策的总路綫

罗兰·鮑尔博士

我們的世界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面临着人类在过去几千年历史中从未遇到的抉择和問題。由人操纵的宇宙飞船遨游太空。技术革命改变着生产过程，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和民族革命改变着人們生活。帝国主义虽然存在，但是帝国主义任意統治和拥有无限权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社会主义日益决定着历史的进程和人类的命运。

人类社会的生存形式的根本革新和由于能摧毁一切的热核武器的产生使得战争已不再是解决国际爭端問題的手段。这一事实，使我們的时代成为一个世界历史的轉折时代，由延续了数千年的战争紀元轉变为各国人民的和平紀元。

## 人道主义的願望

但是問題还没有解决。美国狂人和波恩极端分子每天都在证明：帝国主义的反动代表們正在推行侵略政策，并且以原子軍备竞赛惹起从肉体上消灭許多国家的人民的危险。在历史上，对战争与和平的选择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地关系着全人类，因此每个人的責任，一切政党、各国人民和各个国家的責任也从没有像在我們时代这样重大。

苏联共产党、我們党和所有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都像

弗·伊·列宁早在1915年就說过的那样，“一向斥責各国人民之間的战争，认为这是一种野蛮的和残酷的行为”。因此，本着这种人道主义的根本态度和依据我們时代的发展趋势，社会主义国家和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动员一切力量来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

为此，規定了适应新的斗争条件的新的政治准则，这些准则进一步发展着共产党在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战略和策略。这一条在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声明中所闡明的和平共处总路线，已在多方面为生活所肯定。它赢得了人类大多数的同情，并且获得了明显的政治和实际成果。

中国领导人不仅背离了共同商定的总路线，而且还大肆誹謗和攻击所有捍卫这条正确总路线的人。因此，他們目前的态度和政策更加引起人們的惊异和严重的忧虑。

## 两面的态度

今天由于新的世界力量对比而有现实的可能防止世界战争的这一认识是构成1957年和1960年通过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基本組成部分。这条争取和平斗争的总路线是以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为基础的。

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却頑固地坚持战争不可避免的論点，并在和平共处政策方面采取一种极其两面的态度。

众所周知，1960年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决定——中国的同志們也在声明上签了字——，把列宁所奠定的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間和平共处和经济竞赛的原则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不可动摇的基础。

中国同志們采取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而且推行另一种政

策。他們对这种政策的解释以及他們的所作所为都表明，他們否定或者不願意有社会主义国家和資本主义国家之間的和平共处。他們使印度卷入軍事冲突，而在几年前，他們曾与印度政府在万隆共同宣布过和平共处原则。他們差不多像波恩极端分子一样疯狂地反对部分停止核武器試驗的莫斯科条約。

他們一方面在莫斯科声明上签字，另一方面却明目张胆地否定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总路线的和平共处。他們一会儿說和平共处政策是列宁奠定的，一会儿又說和平共处是放弃馬克思列宁主义，等等。如果想从他們在这个問題上的許多矛盾和混乱中找到一条路线的話，那末最多也只能认为，他們把資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和平共处看作是他們可以按照主观想像任意改变和解释的一种“策略”。然而，这是极其反列宁主义的，而且是对莫斯科声明的篡改。

### 荒謬的論点

为了給他們的錯誤看法和行动辯解，他們断言，誰过分重視和平共处政策，誰就低估了帝国主义，就是相信帝国主义的本质已经改变，或者說是违背列宁对帝国主义的估計的。不客气地說，这簡直是胡說八道。从来沒有任何一个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說过帝国主义的本质已经改变。帝国主义既沒有失去它的反动本性，也沒有改变它的侵略政策。但是，什么东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呢——这些当然是中国同志們理解不了的——，起了根本变化的是帝国主义所在的世界，起了根本变化的是帝国主义的地位、实力和勢力范围，还有它的賴以生存的条件。

当列宁提出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論的时候，資本主义正統治着世界。那时还没有社会主义国家，更不用說世界社会主义体

系了。那时沒有和平地区,沒有强大的、革命的、共产主义的工人运动,也沒有包括人类最广泛阶层的有組織的世界和平运动。那时世界上十七亿人口不是直接生活在帝国主义国家內,就是生活在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附属国内。当时,帝国主义本身的規律和矛盾决定了世界事态的发展,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战争。

### 在社会主义誕生之初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根本改变了这种状况。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和平法令,这正好是社会主义的象征。这个文件表明了社会主义在其誕生之时起就同和平有有机的联系,并且这个文件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宣布了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的新原則。

列宁闡明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思想。甚至在遭受干涉的年代里,他仍坚信和平共处能够实现,并把它看作是在世界范围内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都有效的客观規律。

比如,在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以后,列宁說,我們現在的情况是:我們“給自己取得了能够同那些現在不得不同我們建立貿易关系的资本主义列强并存的条件……我們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們不仅有了喘息时机,而且得到了某种更重要的东西……一个新的阶段,我們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密网中已经爭取到基本上能够在国际上存在了”。<sup>①</sup>

因为国际資本和战争的力量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比社会主义的力量还强大,并且苏联单独地面对着一个敌人的世界,所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73頁。

以社会主义和和平共处的新规律在这些年代里还没有成为世界政治中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帝国主义还能够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 世界强国苏联

今天世界完全改变了。苏联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实力雄厚的工业国，现在它的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部门已居世界首位。同苏联一起，今天存在着十四个社会主义国家，因而今天居住在我們地球上的二十七亿的人口已有35%生活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国家中了。在世界的这个部分，人民当家作主，战争的社会根源已经最终被消除了，那里没有由于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对侵略或战争发生兴趣的阶级和阶层了。

另外有十二亿四千万人——占世界人口的56%——已经摆脱了殖民奴役，从而脱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范围。此外，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列宁在世时不足2%，而到1955年就占28%，1962年已占37%。最后，今日的苏联掌握着最新式的军事手段，这有助于世界力量对比发生巨大变化。

## 完全新的条件

根据这些事实，今天和1914年或1939年相比，条件完全不同了。由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日益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以及所有国家的和平运动的力量不断增长，所以在我们的时代存在着防止世界战争的现实可能性。因此，今天与列宁在世时相比，和平共处政策已经在质上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如果說苏联和其他資本主义国家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和平共处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間的和平时期，那么今天就能够而且必須在新的世界力量对比的基础上，在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时期，爭取获得和貫徹和平共处。从前只有苏联遵循列宁的和平共处，而今天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許多和平国家和一些中立的資本主义国家也都遵循这项政策了。

### 历史的必然性

甚至在帝国主义的代表中，贊成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的政治家也愈来愈多了，因为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战争就意味着帝国主义注定灭亡。例如前美国联邦銀行董事长M·S·埃克尔斯早在1957年12月就說过：

“至于国际关系，人造卫星出乎意外的出現一事教訓了我們；事态并不像人們向我們保证的那样。……我們必須十分清楚，我們的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的和平共处是必不可免的。”

最后，和平共处原則也被納入了一系列重要的国际法的文件，如联合国宪章，万隆會議、开罗會議和貝尔格莱德會議的各项決議中。

因此，和平共处政策既不是虔誠的願望，也不是权宜之計。它是我們时代的历史必然性，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两种按其社会結構來說相对立的制度，它在国际上以及在德国就是維護和平和防止一場普遍毁灭战争的唯一途径。所以1960年莫斯科声明說：“是不同制度国家間的和平共处，还是破坏性的战争——現在問題就是这样摆着的。”

因此，我們党几年以前就提出两个德国建立邦联与和平解

决德国民族问题的政策，同阿登纳的“非和平共处”论点相对抗。这种政策不是别的，而是根据存在着两个社会制度不同的德国这一条件，创造性地运用列宁的和平共处原则。

和平共处政策不是策略上的一着棋，也不只是对特定局势所采取的政策。恰恰相反，正如乌布利希同志在来比锡强调的那样，和平共处政策是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胜利以前的整个历史时期中的战略和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因此，它是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总路线。

### 富有成效的斗争

中国领导人不愿意理解，实现和平共处政策就是阶级斗争这样一件简单的事实。他们用经院哲学来思考，所以不能了解和平共处政策与反帝斗争之间的联系，而他们在反帝斗争中则是空话多于现实的行动。

可是，只要对目前世界上进行的政治斗争的意义和进程稍有所了解的人，他就会看到，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和平共处政策就是最好的、最有效的反帝斗争。另一方面，和平共处为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的革命运动的发展所创造的条件，比大吹大擂的革命空话或热战、冷战的气氛所创造的条件要好得多。

### 竞赛起决定性作用

正如帝国主义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社会主义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德国十分清楚地所表明的那样，帝国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体系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原则性的对立和意见分歧。

当然，和平共处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否定这些对立，也不意味着由这些对立所产生的阶级斗争的消失。重要的问题只是，应该用什么手段和什么方法进行和解决这场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

我们，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原则上认为，今天这场斗争没有必要采取武装行动和军事冲突的形式。我们不希望在德国以及在世界政治中发生热战或冷战，而希望和平共存与和平共处。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不可避免的斗争可以用经济、文化和思想领域中的和平竞赛的形式加以解决。

正如我党对和平解决两个德国之间的关系的各种建议所反复说明的那样，和平共处意味着两种制度之间存在着正常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的关系，通过竞赛决定两种制度哪一种较好。

## 示范的力量

中国领导人站在同第一国际时代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或企图用武力人为地把革命搬到西方的托洛茨基相类似的冒险主义立场上。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曾揭露过这些空话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谴责它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并把它的拥护者称作是“很不成熟的无经验的中学生”，例如恩格斯就是这样对待巴枯宁分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就站在这种立场上，即革命是各国人民自己最切身的事情，既不能人为地制造，也不能由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国家输出。

如果说1917年以前，马克思列宁主义用它的学说的逻辑性



和正义性以及它的伦理—道德价值使劳动人民信服，那么十月革命以后，社会主义实践的示范力量就成为使群众相信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优越性的主要手段了。

因此我们党同莫斯科声明相一致，把为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斗争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经济竞赛，看作是以最小的代价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全世界实现社会进步的主要途径。

最近十年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和平与和平共处的条件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工人阶级通过和平途径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政权和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革命在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中已经取得和正在取得胜利，社会主义在古巴站稳了脚跟，五十多个国家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统治，赢得了民族的独立。

此外，我们争取和平解决民族问题的斗争也表明，和平共处政策就是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坚决进行的阶级斗争。由于和平共处政策粉碎了西德帝国主义者的扩张计划和复仇计划，因而他们害怕和反对和平共处政策。难道这一事实不能使中国领导人深思吗？

帝国主义拿不出能同我们伟大的人道主义的和平理想和人类理想相抗衡的东西来。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将赢得胜利，它体现和平，给各国人民带来最大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并赋予他们最好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将在德国和全世界实现。

(译自1963年9月13日民主德国《新德意志报》)

## 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斗争（节译）

君特·柯尔特

### 有害的帮助

今天帝国主义者同过去一样竭尽全力来削弱（而且有可能就破坏）这个联盟。可是他们既没有能够阻止英国工人阶级声援印度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也没有能够阻止法国劳动人民为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自由所采取的行动，也没有能够阻止国际工人运动同为自身解放而斗争的各国人民的兄弟团结的其他行动。

同样，帝国主义者也无法在各国人民心目中诽谤苏联的决定的历史贡献和包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内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民族解放运动和年轻的民族国家的发展的援助。虽然如此，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仍然继续这种徒劳的努力，这是完全不足为怪的。可是，有一些自称共产党人、口口声声讲革命和国际主义这些名词的人，却在这方面支持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这就令人十分惊奇了。

中国领导人所发动的运动，归根结蒂是为帝国主义者帮忙。为了做得彻底，中国领导人不仅诽谤法共、意共那样经过战斗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而且他们把主要火力对准苏联、苏共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他们违反全部史实，贬低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苏联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巨大援助，诽谤它们是想“压制”

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优等民族”，对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采取“消极、鄙视”的态度。这是卑鄙的诽谤。中国领导人以此破坏国际工人阶级同民族解放运动的联盟，首先给民族解放运动本身造成巨大损失。

## 狭隘的民族主义

中国领导人在革命发展的基本问题上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并企图离间国际工人运动、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在国际群众组织中，他们已经走上公开分裂的道路，他们用民族主义、用对民主革命运动作地理的或种族的限制来代替阶级立场和国际团结。

早在六十年前，弗·伊·列宁就提醒人们注意这种有害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他说：“‘谁说了一，谁就得说二。’谁拥护民族主义观点，谁自然会希望在自己民族的周围，在本民族工人运动的周围筑起万里长城，……明知他的分崩离析的策略会把接近和团结一切民族、一切种族、操各种语言的无产者的伟大遗训化为乌有，也并不感到不安。”<sup>①</sup>

我们党同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一样，坚持得到斗争检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声援为摆脱压迫和剥削而斗争的各国人民的精神教育党员。因此我党纲领中的一条社会主义道德和伦理的原则是：“应该声援为民族解放而斗争和保卫自身民族独立的各国人民。”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73页。

## 毫无根据的理論

中国领导人甚至为自己的民族主义的分裂的路线想出了自己的“理論”，他們想把这个理論当作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高創造而强加給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每一个有点馬克思列宁主义起碼知识的人都十分清楚，爭取社会主义斗争的主要革命力量是国际工人阶级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

中国领导同志把这样的基本真理顛倒过来，篡改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继续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說（这些学說是有他們自己签名的1960年莫斯科声明所确定的），他們断言，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民族解放运动，并且大笔一揮，立即宣布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三大洲是“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中国领导人不考虑各个国家的阶级力量的发展、具体的斗争条件和任务，断言处处都存在革命形势，并把武装斗争看作是解放运动的主要形式。

在这里，假科学的、民族主义的态度和革命的空話代替了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具体任务。而那些从殖民主义枷鎖下解放出来的人民和国家在现阶段斗争中所面临的任务是：爭取经济独立，保障已经取得的政治独立，摆脱殖民主义剝削的一切残余和新的形式。

## 来自錯誤的极端

不妨提个問題：比如說，年轻的非洲民族国家应当用枪炮去同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及其新殖民主义的野心进行斗争，并向它們宣战嗎？这些国家应当手持武器向西欧或美国輸出社会

主义革命嗎？尽管这些問題听起来非常荒謬，但它們却是中国領導人的思想中所必然产生的，在他們看来，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承担者显然已不再是工人階級，而是小資產階級或民族資產階級了。或者說，难道在那些只有很弱小的工人階級、甚至沒有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国家，应当立即通过武装斗争建立无产阶级專政嗎？

中国領導同志实际上是在鼓吹馬上到处建立人民民主，大家知道，人民民主是无产阶级專政的一种形式。中国的教条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代表們无法回答我們所提出的問題。革命的空話并不能解决今天摆在民族解放运动和年轻的民族国家面前的任务。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1960年會議上从对国际局势和改变了的力量对比的科学分析中得出結論：贏得了民族独立的人民，通过发展民族民主的独立国家，有“沿着社会进步的道路迅速前进”的实际可能性，这就是說，走非資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他們在这条道路上得到了国际工人階級、首先是遵照列宁指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致支持。列宁說：“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能够也应该帮助落后国家的劳动群众，只要苏維埃共和国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向这些群众伸出手来，支持他們，落后国家的发展就能够突破目前的阶段。”<sup>①</sup>

工人階級和广大的农民群众在完成年轻的、剛独立的国家的根本社会任务的时候，有責任起决定性作用。非資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完全有可能由于民族解放运动的民主的领导人轉到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上而得到加速。思想的和物质的基础首先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它体现着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的領

---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13頁。

导权。

对民族解放运动具有真正革命意义的，除了社会主义在政治上和物质上的直接支持外，还有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和示范的革命化作用，这种示范作用鼓舞着资本主义世界和从殖民主义枷锁下解放出来的国家的人民群众争取社会进步的斗争。中国领导人显然不相信社会主义的力量和优势，而寻求“推进”革命的冒险主义道路。

比如他们不是按照和平共处的原则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而显然是认为加剧中印边境的武装冲突要更加正确些。印度的广大群众被引往错误的方向，内部的社会矛盾被民族主义的浪潮所掩盖，反动集团得以使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广大人民群众眼里看来是头号敌人，难道这一切是符合社会主义的利益吗？

这确实是为社会主义争取人民群众的一种奇怪的斗争！这确实是反对当时正用侵略威胁革命的古巴的美帝国主义的一种特别的斗争！大家都知道，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是被北京的极端革命的口号打退的，而主要是被苏联的力量与和平政策以及古巴人民的坚定性打退的。正当全体进步人类应当团结起来，消除对古巴的和平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危险的时候，中国领导人不是把他们的批评的火力首先针对着美帝国主义，而是针对着在其全部历史中为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事业作出了最大牺牲的苏联。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转到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立场的人，竟到了这样一种地步。

## 我们的国际义务

德国统一社会党和苏共以及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一起毫不动摇地坚持共同商定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兄弟

般地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其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我们的国际义务。

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斗争的进一步胜利进军，要求首先不断加强现时代的主要力量——国际工人阶级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因为正如1960年11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声明中所说，它们是“争取和平、民主、民族解放、社会主义和人类进步的斗争取得胜利的保证”。

(译自1963年9月15日民主德国《新德意志报》)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节译)

维尔纳·霍恩博士

莫斯科声明和苏共纲领也采纳了概括在我党纲领中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民主革命的经验教训。从希特勒政权下获得解放以后的几年中,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土上,通过和平途径以民主手段完成了反法西斯的民主改造,建立了工农政权,建设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这是我们党、民主德国的工人阶级和民族阵线的一切力量的最伟大的历史功绩之一。由于二十世纪德国的历史发展,由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作用和地理位置,不仅这个革命变革的结果,而且它的具体过程也具有伟大的民族意义和国际意义。

中共中央1963年6月14日信中断言迄今“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过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先例”,只能引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公民的惊讶。难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劳动者还要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工人阶级政权吗?——或者说,我们还没有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吗?

## 生活表明了真理

中国领导人顽固地拒绝承认与他们的教条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相抵触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共产党的经验。他们是不是害怕用实践检验自己的观点呢?这种态度是违



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之一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中国，工人階級的政权是经过数十年武装斗争和內战而建立起来的，中国领导人把中国革命的这一特点绝对化了。他們任意地把这个特点夸大为普遍适用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規律，并断然拒絕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1960年莫斯科會議指出的从資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要是人們附和中國領導人的奇特的論點，即還沒有過從資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先例，那么这就意味着，德国东部的社会主义革命早在1945年5月胜利的苏軍在柏林国会大厦上竖起紅旗的时候就开始了。

实际上，苏軍战胜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是在軍事上击败德国帝国主义。苏軍行使了占領政权的职能；在德国三分之一地区，有几年国家最高权力是在苏軍手中。这意味着，德帝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了。这同时也有利于工人階級和德国人民中的一切进步力量进行解决德意志民族切身問題的斗争。

苏軍成員向德国反法西斯主义者介紹了苏共的丰富经验，并給他們以建議和实际帮助。苏軍的駐扎，使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不受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我国人民对此一直深为感激。

## 避 免 了 內 战

我們的经验駁斥了中国领导人主观主义的論断，同时也駁斥了帝国主义資產階級及其思想家的煽动。他們說，馬克思列宁主义按其本性是暴虐的，因此社会主义的建立不可避免地引起战争和巨大的流血牺牲。这种誹謗是要阻擋群众参加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我們已在实践中证明，德国的基本矛盾并不像反

共宣传企图使人相信的那样，是在共产党人和其他社会力量之間。

## 德国的基本矛盾

相反，这个基本矛盾是在垄断资本同受它剥削的劳动者之間，是在要想复仇和发动原子战争的帝国主义者同絕大多数爱好和平的居民之間；而共产党人和德意志和平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最坚决地代表后者的利益。这个证明对于西德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广大人民群众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现在，在世界上和在德国形成了一种具有新质的局面。社会主义与和平的力量取得了帝国主义的优势。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日益有力地决定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因此，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坚信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不断增长的可能性。它們断然拒絕中国领导人的通过原子战争消除帝国主义，以便在它的废墟上建立“更高的文明”的冒险主义立場。

(譯自1963年9月19日民主德國《新德意志報》)

# 階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 社会中的发展(节譯)

庫尔特·提德克

## 代理人的恐惧

每一个有階級觉悟的工人和每一个进步人士都清楚地知道,不能期待剝削階級的代表讲真話,更不能期待他們在关于国家、民主和自由的問題上讲真話。

相反,應該期待共产党和工人党永远依据事实,也就是站在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的立場上对这些基本問題給予明确的答复,并且不允許似是而非,模稜两可。各国人民也这样来要求中国领导人。但是,他們在1963年6月14日的信中,对于必須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民主不仅只字不提,而且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問題采取了极其教条主义的态度。

## 关于全民国家

应当认为,每一个把人类社会的进步看得比自己狭隘的、自私的要求更高的人,都会为苏联人民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苏联人民在其列宁的党的领导下建立了各国人民历史上第一个不再是剝削階級的統治工具的全民国家。通过建立政权,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而到达沒有階級、沒有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这

正是各国工人阶级科学地奠定的目标。在苏联建立全民国家，正是向这个方向迈开的特别巨大的一步。这是合乎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律的。

列宁不仅经常指出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可能性，而且也指出它的必要性，“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以后，必须实行充分的民主。”<sup>①</sup>

苏联的实践令人信服地证明，为了解决这一任务，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必须逐渐转变为全民的国家。可是，因为这一宏伟的事实与某些中国同志的要充当领导的要求相违背，所以他们就想直接否认苏联人民的这个成就。

他们蛊惑人心地问：“可以用‘什么全民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吗？”可是，中国领导人知道得很清楚，事实上这里并不是“什么全民国家”，而是一个在解决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基本任务之后，在无产阶级及其盟友的共同斗争中所形成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本身就包含着这一转变过程。

### 对问题置之不理

中国领导人在口头上承认社会主义国家的辩证的发展过程，实际上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静止的，不能再进一步发展了。他们歪曲事实，硬说，“只要还有国家存在，就不可能是全民的”。

为了“加以证明”，他们指出了在社会主义各国还存在阶级的事实。没有人否认这一点。可是，这些阶级在社会主义的发

---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37页。

展过程中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苏联和其他許多社会主义国家中,各个阶级和各个阶层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对抗性的了。因此,它們之間的阶级斗争早在沒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成之前就停止了。这样,使工人阶级的統治成为必要的主要条件也随之消失了。

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进一步发展呢?中国领导人对这个問題作不出回答。他們以非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生活提出的問題不聞不問,而是想用援引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詞句来“論证”他們的教条主义概念。可是,他們又閉口不談例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曾預見到今天在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中正在进行的国家的发展,“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職員和工人。”<sup>①</sup>

人們看到,弗·伊·列宁不仅持有这样的观点,即越来越多的公民参与管理社会主义的国家,而且他自己使用了包括全体人民的国家的概念。

馬克思列宁主义学說始終是从工人阶级专政也具有历史暂时性这一点出发的。自然,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还不能具体回答社会主义胜利后国家的轉变将如何实现的問題。这必須要有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经验,并且必須从理論上把这些经验加以概括。

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有这种经验可以作为依据,因而也以这个新的认识,即工人阶级专政在国家本身完全消亡以前就已经沒有历史必要性,丰富了馬克思主义科学。

---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60頁。

## 站不住腳的理論

中國領導人企圖用幼稚可笑的論據來反駁這個有科學根據的論點。他們說，“既然那里還有寄生蟲、投機倒把分子、懶漢、流氓……，那怎麼能說，沒有階級和階級鬥爭呢？”

人們大概總可以期望那些着手用一條“新的總路線”來“教導”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人，至少應當知道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定義吧，“所謂階級”，列寧在《偉大的創舉》一文中寫道，“就是這樣一些集團，這些集團在歷史上一定社會生產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對生產資料的關係（這種關係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了的）不同……”<sup>①</sup>

中國領導人顯然離開了列寧的這個階級定義。他們不是把勝利的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生產關係，而是把某些人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余，作為他們的“階級定義”的出發點。中國領導人帶着這種關於階級本質的概念，危險地靠近資產階級的唯心主義理論。他們的主觀主義的階級定義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毫不相容的。

但是，人們要問，中國領導人對社會主義國家向全民國家的客觀發展所採取的否定態度是從哪里來的呢？他們認為這樣一種國家會放縱那些“由資本主義遺留給社會主義的傳染病、瘟疫和潰瘍”，這種觀點是任何相信本國人民的力量和智慧的人都不能信服的。

---

<sup>①</sup> 《列寧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82頁。

## 維護老錯誤

斯大林持有這一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隨着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前進，階級鬥爭必然會加劇”。中國領導人並不是不知道斯大林這一錯誤觀點的實際後果。可是他們現在顯然在維護這些錯誤。

然而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捍衛着蘇聯共產黨在克服了蘇維埃國家發展和馬克思列寧主義國家學說發展方面的個人迷信後果之後，所取得的偉大的理論和實踐成就。捍衛這一有科學根據的結論，是所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任務。

但是中國領導人的觀點卻使人產生這樣的印象，似乎他們想把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拖回到一個已經越過了階段。

在社會主義綱領的武裝下，在蘇聯建設共產主義的榜樣鼓舞之下，我們黨將沿着馬克思列寧主義勝利的道路繼續前進。

（譯自1963年9月23日民主德國《新德意志報》）

# 烏布利希1963年9月25日 在波兰領導人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 黨政代表團訪波舉行的招待會 上的講話(節譯)

社会主义各国大家庭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統一是我們爭取社会主义胜利和保障和平的斗争的重要源泉。在爭取和維護这种統一的斗争中，我們一致地站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方面。我們坚决譴責中国共产党領導人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各国的利益，反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以及反对所有爱好和平人們的利益的分裂企图。我們滿意地指出，我們两国政府和两党在这个問題上也是一致的。历史进程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证实了1960年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的这样一个論断的正确性，即苏联是爭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先鋒队和領導力量，它的威力和强大保障着和平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

(譯自1963年9月26日民主德國《新德意志報》)



## 我們如何衡量民主(节譯)

——德国統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員哈格  
1963年10月1日在柏林党宣傳員訓練  
班开学典礼上的報告

### 中国需要什么？

对于中国人民來說，假如他們的领导人不是追求核武器，而是把一切力量都放在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上面，那只会是有益的。这些经济任务要求作出巨大的努力，因为近几年由于所謂的“大跃进”和建立人民公社的錯誤经济政策——不仅仅是由于天灾——中国工农业生产沒有取得什么可以值得一提的进展，这些经济困难是中共领导人当前錯誤政策的原因之一。

当然，人們不应放弃这样的希望，即中共领导人会认识到他們的錯誤并回到共产党和工人党在1957年和1960年两个莫斯科声明中規定的政策上来。

### 馬克思主义不可分割

鉴于中国领导人的态度，有人在討論中提出了現在是不是有着各种不同的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哪一种是正确的問題。馬克思列宁主义当然只有一种。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我們时代的迫切問題在1957年和1960年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声明中，在苏共綱領和我們的党綱中已经作出回答。

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学說是行动的指南，它同教条主

义，即同脱离实际是不相容的。不得不遗憾地指出，中共领导人自若干时候以来，在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的所有基本问题上，都采取教条主义、左倾宗派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立场，对苏共和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公开采取敌视的态度。他们早已离开原则性争论的立场，转而采取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反苏诽谤和分裂活动的方法。大多数共产党和工人党已表示坚决反对中共领导人的政策。

### 爭論使党加强

我们党的党员和我们共和国的许多公民，对中共领导人的这条道路将通往何处表示出焦急的忧虑，这是很自然的。西德帝国主义的宣传利用北京的各种宣传品，来反对我们的党，并在劳动人民中挑起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怀疑和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尽管中国领导人的政策给和平和社会主义的事业带来多么巨大的损失，但我们仍然坚信，同他们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同他们的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观点进行原则争论，最终将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在思想上得到巩固，在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得到加强。德国工人运动的历史教导我们，党在经过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无论斗争一时多么困难——之后，总是得到了加强。

(译自1963年10月3日民主德国《新德意志报》)

#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布魯諾·洛依施納

共产党人过去和現在都向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学习，学习不脫离革命斗爭的实践，深入研宄生活、新过程和新現象，細致分析世界局势、力量对比，并在此基础上制定革命的战略和策略。

我們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日益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恰恰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决定着现阶段人类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主要方向和主要特点。

正是在这个最重要的問題上，中国领导人采取了根本錯誤的立場。他們企图貶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意义和它对历史发展过程的影响。他們蠱惑性地把民族解放运动称之为当代的主要力量，对其百般献媚并企图强使民族解放运动接受自己的领导。

当然，誰也不想否认民族解放运动的巨大作用。民族解放运动动摇着帝国主义的基础，加速人类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但是，这一运动的成就、它的命运和它的未来，都决定于国际工人阶级——世界革命运动的真正领导者斗爭的規模。中国领导人却企图修正1960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會議所通过的下述論断：站在現时代的中心的是国际工人阶级和它的主要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

無論是普遍和平的命运、無論是民族解放运动的成就、無論

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结局，都首先取决于世界社会主义的成就及其威力的增长，取决于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在世界舞台上的总的力量对比。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作为社会发展最重要因素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在研究战争与和平问题时，看得特别清楚。社会主义阵营的威力象可靠的盾牌一样，已不止一次地保护了爱好和平的人民使他们免受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年代中没有爆发新战争，那末，人类首先应当感激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人民把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看作是和平和自身安全的最可靠的保卫者。在我们星球的绝大多数人的思想意识中，社会主义与和平已成为不可分割的概念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的伟大的和平使命，认为自己的神圣责任是尽一切努力来保卫和巩固和平。争取和平的斗争，这是我们时代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最重要条件。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苏联政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才力求以全力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实现全面彻底裁军和消除战争威胁。

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冒险主义者不同，不把人当作棋子，为了走一步成功的棋，就可以牺牲棋子。人类的全部历史令人信服地证明，共产党人是争取和平、进步、各国人民幸福的最热情、最奋不顾身的战士。在全世界反对反动派、争取美好生活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始终坚定地走在最前列。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有什么权利断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放弃了解放人们使之摆脱剥削的斗争并毫无保留地追随帝国主义呢？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苏联人民多次击退了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当然，帝国主义现在仍然力图扼杀社

会主义,阻挠它的发展,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改变。谁都不否认这一点。但是,大家知道,世界发展的进程并不是由主观愿望,而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

无论是苏联还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对帝国主义的本性抱有幻想。美国、法国或西德的政治家们声称,他们渴望和平。这些声明当然不是和平的保证。但是为什么中国领导人老是重复这些真理呢?如果他们清楚了解下述显而易见的真理,即战争能否防止取决于世界舞台上客观的力量对比,取决于社会主义力量对帝国主义势力的优势,岂不是更好一些吗?如果现在帝国主义的可能性受了限制,那末,这仅仅是因为存在着拥有牢固的军事、经济和道义基础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

中国共产党领导还以有关两个德国问题的绝对正确的解释者自居。他们声称,他们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利益的保卫者”。我们可以让中国同志确信,根据我们的历史经验,我们自己能够更好地判断西德帝国主义有着多么大危险。在签订禁止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后,西德帝国主义者并未变成和平的圣徒,这一点我们不需要任何人来解释。他们现在仍然力图获得原子武器。但如果断言,条约的签订反使西德帝国主义者更易于掌握大规模杀人武器,这完全是故意歪曲事实。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现阶段,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世界体系在人类活动的决定性领域——物质生产领域中的斗争,具有特殊意义。在这里,像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一样,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实例显示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根本的优越性。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深信,在同资本主义经济竞赛中,胜利将属于自己,属于社会主义经济。中国领导人在这一点上也抱有

自己的、同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观点。从各方面看来，他們不相信社会主义会在经济上战胜资本主义。

中国领导人无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利益，提出了“自力更生”和所謂“社会主义国家孤立发展”的理論。这种腐朽的理論是要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合作。

当然，联合在经济互助委员会中的各国，正在最大限度地利用各个国家的内部可能性。它們认为发展本国的民族经济具有首要的意义。各个国家所依靠的首先是充分动员自己的所有内部资源和力量。但是，只有当每个社会主义国家利用由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存在而产生的优越性时，各个国家的可能性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合理的利用。

经济互助委员会参加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领导人和政府首脑充分意识到，现代经济是不能在各个国家中孤立发展的，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合作。经济互助委员会参加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和政府首脑，1963年7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议上一致声明，他們今后仍将沿着这条道路前进。

经互会参加国的经济关系是建筑在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合作的原则要求把各別国家的利益同整个社会主义体系发展的共同利益正确地结合起来。民族利益和各別国家对执行共同经济任务的责任，在这个基础上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主义义务协调地结合起来了。这种义务就是努力支持每个国家发展民族经济。

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合作的这一基本特点，在经济互助委员会的活动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体现出同帝国主义国家经济联合的原则差别。在经济互助委员会中，参加国是在完全平等和尊重各国主权的基础上进行合作的。它排除了某一个国家或

某一个国家集团对其他国家保持优势地位的可能性。

我們根据我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亲身经验可以断言，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設和巩固民族主权方面給了我国和参加经互会的其他国家多么大的帮助和支持。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这种支持給予极高的評价。我們是在德国被分割的条件下建設社会主义的。因此，下述事实对我們具有特殊的意义；我們是社会主义陣营的一个組成部分，我們同苏联有着牢固的、兄弟般的联系。

我們党、我国的工人階級、农民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全体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設以及在一切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已证明，我們正确运用了苏联的经验，我們根据我国的民族条件运用并发展了这些经验。

中国共产党领导竭力把由資本主义遺留下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存在的差别这一事实，說成是经济发达国家工人階級的利益同经济不发达国家劳动人民的利益之間的矛盾。使所有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趋于平衡，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的最重要任务。在解决这一任务时，出現了許多重要而复杂的問題，因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是在許多世紀中形成的。经济发展水平朝什么方向来平衡呢？当然，工业发达的国家将不停止自己的发展，因为这会削弱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平衡是通过动員本国民族資源（劳动力、原料、生产能力）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范围内的全面援助和支持来达到的。

经互会参加国始終如一地执行这种政策。由于经互会参加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以及高瞻远瞩的政策，工业不发达国家在最近几年內能够在发展本国经济和发展生产力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就。这是迅速平衡经济发展水平的最重要前提。

中国领导人应该想想，为什么经互会参加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如此一致地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立场划清界线。经互会参加国决心今后仍将扩大自己的经济关系，用联合自己力量的办法来加速经济进步，从而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

我们应当永远牢记弗·伊·列宁的金玉良言：社会主义国家以示范力量、以本国的经济建设，给予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以主要影响。为了在同资本主义的经济竞赛中取得胜利，社会主义国家应当不断地加强和发展自己在经济方面的合作，永远具有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应当记住，正是现在，我们这些国家正在奠定统一的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牢固基础。促进所有这些任务的解决，是每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主义义务。

中国领导人现在企图使社会主义国家远离这条社会主义各国的共同的康庄大道。中共领导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立场，给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和团结带来了严重的损害。但愿生活本身和社会主义国家及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成就，将清醒中国领导人的头脑，促使他们改变自己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政策的基本问题上的立场。

（译自1963年10月3日苏联《真理报》）



## 各国人民已作出决定(节译)

《新德意志报》社论

不幸出现了这个可悲的局面：不仅是最反动的帝国主义势力疯狂地反对莫斯科条约，在拒绝禁止试验核武器协定的大国中，也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领导人不仅表示反对这个条约，而且也企图诋毁条约签字者的声誉，展开一个反禁试运动。这种态度完全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违背1957年和1960年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两个声明，以及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

在莫斯科条约上的一百零六个签字，是对中国领导人错误的、冒险主义的立场的明确谴责。国际上的日益孤立，促使中国领导人突然要求立即销毁一切核武器——这是苏联政府早在它的全面彻底裁军的伟大纲领中就已提出过的要求。这个步骤也表明中国领导人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立场的特点：他们的“要么全部，要么全不”的政策，推动他们企图在走第一步——禁止试验核武器——之前，就走最后一步，并严厉拒绝禁试，为通向全面裁军的道路添设障碍。

我们希望，各国人民对莫斯科条约的举世赞同，最后还有其本国人民的利益，将推动中国领导人进行检查和签字。

(译自1963年10月10日民主德国《新德意志报》)

## 永远友好（节譯）

——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六周年而作

《統一》杂志社論

列宁把拉巴洛条約看作是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范例——不是看作策略問題，而是看作社会主义国家整个过渡时期（“只要还存在……两种所有制”）的根本政策問題——，凡是像中共领导人那样的人都应当深入学习列宁的这一評語，他們在今天攻击和誹謗以赫魯晓夫同志为首的苏共，因为苏共领导一貫地遵循列宁的指示，“按照这个精神执行政策”，因为它坚定不移地遵循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总路线的列宁的和平共处路线。

我国的誕生和发展的历史事实不可磨灭地包括：尽管德国帝国主义发动了可怕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仍然給予援助，保卫我們的革命免遭帝国主义的干涉，支持建立主权国家。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出色行动，是重視和支持我們民族利益、我們的自决和主权的出色的行动。因此，对于中国领导人辱罵苏联有“大国沙文主义”，或者辱罵苏联同志是“飽食終日、达官貴人式的慈善家”，說什么他們揮舞“指揮棒”，而其他人跟着轉，我們感到特別气憤。这些断語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煽动有什么区别呢？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为了对付本国共产党人，为了把国际工人阶级同第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分离而孤立起来，因而数十年来都在說什么“莫斯科之手”、“赤色帝国主义”或“苏維埃帝国主义”。以往，帝国主义者力图分裂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的活动得到了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工人运动的其他叛徒的援助。现在，他们显然得到那些自称共产党人并占据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地位的人们的支援。不然该怎样解释，比如说在疯狂迫害共产党人的波恩国家，对散发中共领导人的材料不仅加以容许，而且还通过以猖狂反共而闻名的盖伦和其他机构直接予以促进呢？

在迄今的历史上，苏联为革命事业，为反对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进军做出了最大的牺牲。因此，世界各国共产党人都坚决反对中国领导人提出的诬蔑性指责。生活本身以及我们自己的经验日益表明这些指责是荒谬的。这是一种多么奇特的“大国沙文主义”，例如到1961年为止，社会主义各国在苏联的援助下，已经建立了和正在建设着一千一百个工厂和其它生产设备，其中单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有三百多个项目；再如苏联在科学技术合作中，在短短几年内无偿地向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约二万五千套不同的技术文献，其中有工业企业和其它重要国民经济部门的基本建设设计二千五百七十项，机器和设备的图纸八千套以及关于工业品生产工艺过程的说明三千份。

今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联的经济关系已日益具有直接的生产合作的性质。经济互助委员会各成员国的合作也正在向这个方向发展。卡尔·马克思早已指出，劳动的简单联合就已显著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假如具有同样的社会结构和共同的政治利益和目标的社会主义国家把他们的努力联合起来，那么，劳动生产率将大大提高。各个国家，不论其大小，通过社会主义国际分工并结合自己的努力都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大生产。社会主义大生产将使本国以及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大集体的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迅速增长，并更快地在经济竞赛中取得对资

本主义的全面胜利。被中国领导人当作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宣揚的“自力更生”的口号，意味着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孤立和放弃一切力量的联合，并損害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它是一种民族主义的思想，是对共产党人国际团结和合作的否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将毫不犹豫地走一切力量在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基础上实行兄弟合作的道路。

中国领导同志今天这样来描述事态，似乎有这样 一个选择：要么是原子战争、“仅仅”毁灭人类的一半和在原子废墟上建立起一个幸存者的“美丽的”社会主义未来，或者是和平和放弃世界向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然而，把这种可能性提升为政策中心首先就是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战斗目标的公然违背。其次，这种选择是根本不存在的，而是既要维护世界和平，同时又要为世界各国人民赢得社会主义。这也就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1960年莫斯科声明中所規定的，并有中国同志签字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战略目标。这个目标对今天的力量对比来说完全是现实的。自那时以来的几年，已完全证实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这一論断：“和平是社会主义的忠实同盟者，因为时间对社会主义有利，对资本主义不利。”

根据伟大的列宁的党的历史作用和斗争经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1960年11月的会议上一致声明，“苏联共产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有经验和久经考验的队伍，过去是、今后仍然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公认的先锋队。苏联共产党在争取工人阶级胜利的斗争中，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实现全面共产主义建设中所积累的经验，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原则性的意义。”同样，正在建设共产主义的苏联今天是、今后仍将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这一客观事实绝不会由于教条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

的反对而改变。因为，苏联——它在建設新社会制度方面走得最远——集中了社会主义的最强大的经济、政治、軍事和思想力量。这意味着列宁的国家不仅能够从物质上成为人类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开路先鋒，而且在它英明的党的领导下具有堅定的基础去实行可靠的、明智的、深思熟虑的以及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級国际主义的政策。这一政策符合一切革命力量和世界各國人民的利益并会促进他們的发展。德国工人阶級和它建立的工农国家在历史上以及在今天同苏联的友誼正是这方面的光輝榜样。

(譯自1963年10月10日第10期民主德國《統一》杂志)

#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背离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因

维尔弗里德·韦贝尔

中国领导人教条主义的、左倾宗派主义的观点及其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的政策在许多同志<sup>①</sup>中间引起了这样的问题：伟大的中国兄弟党的领导人过去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的英勇斗争中曾胜利地领导过中国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曾卓有成效地领导过新社会的初步建设工作，而今天却执行着对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带来重大损害的越来越背离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策，怎么会有可能产生这种情况呢？产生这些观点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些观点是现在才发展起来的吗？这一切将怎样继续发展下去呢？

如果人们要确切地找到中共领导人背离馬克思列宁主义政策的原因的话，人们会碰到许多因素，这些因素的总和导致了当前极端左倾的发展。各种不同的客观情况和困难促进了这种发展，但是，若是党有坚定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便不可能产生目前的反馬克思主义的政策。约在1957年以前，中共和所有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尽管在个别问题上存有不同的观点，但在政策的根本问题是极其一致的，事实确是如此。直至那时为止，中共执行着适应当时要求的基本上正确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策，因此能够在武装的反帝解放斗争中，在反对由美国

<sup>①</sup> 比如，参见埃立卡·欣克尔：“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怎么会采取这种立场？”，载1963年第9期民主德国《统一》杂志第115—116页。

支持的蒋介石匪帮的国内战争中和在完成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初期任务中取得巨大的成就。但是当党面临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复杂的任务以及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所有其他的党一起不得不回答那些由生活提出的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由于国际局势改变和世界阶级力量重新组合的结果而产生的，同时这也要求创造性地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上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时候，这种情况改变了。现在表明，中共领导人没有领会这些新的历史性的任务。他们部分地在长时期来处于萌芽状态的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此之前没有能够破坏政策的基本路线，但开始在决定性的问题上起作用了。

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无疑地是中国领导人目前实行的政策的一个决定性原因。这种意识形态是同低估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说，这表现在对现时代的本质的看法，这是他们的政策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弗·伊·列宁指出，对于正确理解时代的特征以及这个时代同那个时代的不同来说，“那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sup>①</sup>，这一点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但是中国对我们时代特征的估计恰好在这个决定性的一点上大大地违背了1960年莫斯科声明所作的分析。中共领导人没有把工人阶级看作是站在时代中心和决定着时代发展的阶级。这样，他们也低估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它是国际工人阶级最重要的历史成就，它日益成为时代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意义。他们低估工人阶级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作用；低估它在争取和平和民主的斗争中伟大的反垄断资本运动的领导者的作用。他们

---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3页。

的觀點和態度違反工人階級國際團結的最重要的要求，違反他們自己在莫斯科聲明中承擔的義務：“共產主義運動的利益，要求每個共產黨本着團結的精神，遵守各兄弟黨在會議上共同確定的有關反對帝國主義、爭取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鬥爭的共同任務的估計和結論。”<sup>①</sup>然而，無論是中共領導人提出與國際工人運動共同的總路線相對抗的特殊“總路線”，還是他們在許多兄弟黨中組織的派系活動的企圖，與這些義務都是不相容的。

低估工人階級的作用也會導致在世界革命和反帝鬥爭的戰略及策略上作出錯誤的估計。中國領導人聲稱，決定着我們時代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不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矛盾，而是帝國主義和民族解放運動之間的矛盾。為爭取民族獨立而鬥爭的這些國家是風暴中心，決定着世界的發展。當然，民族解放運動是真正巨大的歷史性運動，在過去的十年里，它在英勇的鬥爭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摧毀了帝國主義的重要基礎之一——罪惡的殖民主義。但不能因此就像中國領導人所做的那樣，把民族解放力量同世界社會主義力量對立起來；因為這兩者之間具有緊密的交替關係，兩者是不可分地相互聯繫在一起的。這兩種力量都是歷史進步的決定性因素，它們表現了最終將導致社會主義勝利的世界革命的統一的性質。但是民族解放運動具有這樣的性質，它是各種不同階級的成員在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鬥爭中聯合起來的一種運動，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勢力常常站在運動之首，同時這一運動僅僅是在為爭取年輕國家向社會主義發展創造條件。只有在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產生和國際力量對比起了根本性的變化之後，民族解放運動才能取得巨大的成就。只是由於世界社會主義體系和在很大程度上正

---

<sup>①</sup> 1960年第12期民主德國《統一》雜誌第1823頁。



是由于苏联向它們提供了支持，已经取得政治上独立的年轻的民族国家才能有效地维护独立，在帝国主义的进一步的阴谋面前保护自己并进行争取经济独立的斗争。但是中国领导人试图用各种方法使亚洲和非洲的各国人民同苏联、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和革命的国际工人运动隔离起来。他們以其在当代主要矛盾問題上的錯誤的战略观点使国际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本身遭受重大損失。

对現时代进步的主要力量——工人階級的低估，也反映在中国的对内政策上。中共领导人片面地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在农村，把农业看作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个方針在思想上是以那些从游击战争接受下来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口号为基础的。由于中国絕大多数人口是由农民构成的，这样的理論便有一定的土壤。这一点过去和現在都对党的构成发生影响。在1956年，中共党员的69.1%是来自农民，14%来自工人階級，16.9%来自知识分子和其他的社会阶层。<sup>①</sup>

可見，在中国曾經而且現在还存在着一系列有利于小资产階級分子加强其影响的前提。可是，正是这一点本应当促使中共领导特別重視工人階級及其思想的领导作用。然而事实并不如此。这一点起了更坏的作用，因为中国工人階級本身也有可觀的一部分是由从前的农民組成的，部分地也是由手工业者組成的，他們是在人民革命以后，在经济建設的过程中才成为工人的，因而較易于受小资产階級的影响。但是，除一些运动以外，并没有进行有系統的斗争来克服小资产階級的影响；恰恰相反，这种影响由于一系列的措施甚至还加强了。至今也沒有迹象表明中国党的领导要提高来自工人階級的党员的比重，虽然在1951

<sup>①</sup> 参見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载《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1956年德文版第189頁。

年曾經作過這樣的規定。但是，就是在一九五一年，中共政治局委員彭真寫道：“雖然大批黨員是農民出身的，但是他們早就擺脫了小生產帶來的限制性和狹隘性。”這些黨組織的覺悟以及黨員的紀律性和政治覺悟，“與產業工人不相上下”。<sup>①</sup>這一點，彭真是在農民的個體經濟還占統治地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還沒有着手進行時寫的。與這種觀點相適應，在幹部的教育方面，今天也是，比如說把農村——而不是工業企業——看作是他們聯繫生產的基地，看作是學會理論聯繫革命實踐的學校。

那末，在一個有廣大農民、小資產階級人口的国家，有無可能確保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呢？蘇聯的例子表明，這一點是可能的，甚至還獲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在舊俄國大約也有80%的人口從事農業。但是列寧從建黨之時起就認真地展開反對小資產階級影響的鬥爭。同1905年革命聯繫在一起的是，列寧在俄國“小資產階級海洋”的包圍中，在《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一書中發展了關於工人階級作為唯一堅決革命的階級在民主革命中也同樣具有領導作用的理論。蘇共在其實際政策中始終維護了工人階級及其思想的領導作用。這種領導作用是取得歷史性成就的重要前提，它在今天的蘇聯社會中也仍保持着，直至建立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

在低估工人階級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基礎上，在小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土壤上，也發展起了使中國領導人離開馬克思主義政策的又一個根本的因素：民族主義。在這裡應當考慮到，在對外國壓迫進行了百年鬥爭的人民當中，發展起一種強烈的、真正的民族感，同時在某些集團和階層當中，也產生民族主義的潮流。而民族主義的潮流——莫斯科聲明特別強調說——“不

---

<sup>①</sup> 1951年6月27日中國《英文每日電訊》。

会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就自动消失。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兄弟关系和友谊，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必须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的政策，以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精神教育全体劳动者，为克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残余进行坚决的斗争。”<sup>①</sup>

然而，中共领导人没有进行这场斗争。相反，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头几年的巨大成就，导致他们过高估计自己，导致否定其他国家和其他党的成绩，甚至像近来清楚表现出来的那样，导致了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概念。在一些国际会议上，中国代表们走得如此之远，譬如以种族主义的理由拒绝苏联代表参加会议。他们在反苏煽动中使用了最恶劣的民族主义论点，这些论点实际上与帝国主义运用的口号，如“莫斯科之手”和苏联“压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等等是相同的，他们试图以民族主义的方式使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对立起来。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片面宣传“自力更生”地进行经济建设，并且拒绝社会主义国家在经互会中的合作，认为这种合作危害它们的主权和独立。今天如同五十年前列宁所指出的那样，“‘谁说了---，谁就得说二。’谁拥护民族主义观点，谁自然会希望在自己民族的周围，在本民族工人运动的周围筑起万里长城……明知他的分崩离析的策略会把接近和团结一切民族、一切种族、操各种语言的无产者的伟大遗训化为乌有，也并不感到不安。”<sup>②</sup> 在刘少奇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sup>③</sup> 新版的第六段中，与1939年出的第一版不同，没有指出民族利益从属于国际利益，这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在这方面还有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是过去，还是特别是在今

① 1960年第12期民主德国《统一》杂志第1804页。

②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73页。

③ 1962年8月1日中国《人民日报》。

天，在中共党内存在着脱离国际工人运动方向发展的力量。例如也可用这一事实来说明，在繆楚黄著的《中国共产党简要历史》中仅仅用几句话提到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时候及其建立初期的作用，而在叙述1926年后的中共历史时，竟完全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割裂开来了。在上海和北京的博物馆中，当讲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斗争时，也不讲国际工人运动的影响。刘少奇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第二版中，与第一版相对照，删掉了承认苏联共产党的经验和领导作用的问题，这一点也可以从中共的民族主义的立场中得到解释。

与此相关，中共的民族经验及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贡献也被过高地估计了，并且同国际经验对立起来。在武装斗争方面尤其是这样。中国人民经过数十年武装斗争而把革命引导向胜利，他们所面对的敌人，在装备与军事技术方面要比英勇的、但是几乎没有现代武器装备的人民解放军高得无可比拟。这是个历史事实。这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伟大的历史成就。但是，这个事实并没有给中国领导人权利，把它提高成为一个适用于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的普遍规律，没有给他们权利谈论革命战争的万能，并从他们的经验中得出结论，说人民群众能够在“群众的海洋中淹没”任何敌人；说任何武器，也包括原子武器，是“纸老虎”，能够“像折断一根火柴棒一样”折断它。在这方面，恩格斯曾经教导过共产党人，永远不容许否定军事技术对人民斗争的意义。中国领导人虽然向群众宣传这些口号，而他们自己是十分明白原子“纸老虎”在某些方面的作用的，这表现在他们对莫斯科条约的态度上，也表现在他们顽固地和不择手段地想获取原子武器！中共领导人想把已经被他们自己的政策揭露为骗局的原则作为斗争战略的基础强加在其他各国人民头上！

1963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一次关于历史学家的任务的讲话中说：“毛泽东的理论是今天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先进的发展阶段。”在陆定一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的文章中說：“帝国主义国家里的革命，其典型就是十月革命。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的革命，其典型就是中国革命。”<sup>①</sup>这里姑且不去谈论认为革命的发展必须束缚在僵硬形式的框框中的这样一些明显不正确的论断。在今天的条件下，比如說，在帝国主义国家，革命斗争今天已经是在与苏联不同的条件和不同的形式下进行的，而在进行民族解放运动的国家，已打开了以民族民主的方式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多种多样的道路。但是，对于提出这样一种主张的人，其他国家人民革命发展的利益显然不是那么要紧的。要知道，他们准备用他们所谓原子战争有利于革命发展这一看法来完全忽视他们的生命。中国领导人认为，在他们自己国家内大约剩下三亿人去继续过有“美好前途”(1)的生活，但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为捷克斯洛伐克或古巴或阿尔巴尼亚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前景呢？

在这里，通过战争输出革命这一反马克思主义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概念，与民族主义的、无视他国人民利益的态度显然地联系在一起了。而所有这些都根本不是指抽象的考虑：例如，这个概念在加勒比海地区危机时期曾经决定中国领导人的敌视缓和的政策；如果不是苏联执行主动负责的、符合各国人民利益的政策竭力阻止这个危机，那么这个危机就会导致古巴的毁灭，把人类推入原子战争。如果中国领导人在上述这些危害各国人民的观点的基础上来争取获得自己的原子武器的話——虽然社会主义阵营的全部力量保障着中国的安全——，那他们显然是想用这

<sup>①</sup> 1951年5月26日中国《英文每日电讯》。

些武器为自己的得不到社会主义阵营军事力量支持的特殊目的和利益服务。为了“实力政策”，为了特殊的、不符合于社会主义阵营利益的、建筑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政策，而需要树立这些观点，这难道不是真实的嗎？他們关于亚洲和非洲是革命斗争风暴中心，关于革命中心向东方转移——这就是說从苏联转向中国——的一些地理学理論不是也可能为这些同样目的服务嗎？

不言而喻，小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的强烈倾向也表现在哲学和意识形态上面。非马克思主义的、非辩证的、唯心主义的特点，在这里有了許多門径。<sup>①</sup>封建时代哲学观念残存的因素，对中国共产党許多同志目前的看法，也有某种影响。这种哲学观念的、基于生产力发展低级阶段上的集体主义，部分地又在人民公社中复活起来。加之，中共許多领导同志是在中国旧社会中受的教育，在这个社会，通常是熟記孔子学說和中国其他哲学家著作中相当多的公式和教条，并死板地用于生活。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和方法，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时候也起了作用，并造成了中国领导人自己称之为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某种歪曲。正是他們的主觀的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割断了事物的辩证的联系，而代之以公式般的死板或主观願望。这种思想方法实际上是唯心主义的，它的影响特別清楚地表现在低估社会規律和过高估計意识的作用方面。如果像致苏共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議》中把騙子、流氓和所有破坏社会主义道德原則的人都提高为阶级，从而认为阶级的存在取决于人們的意识，那么这同馬克思主义的哲学还有什么相干呢？把伟大的中国人民当作“白紙”，“可以写最新、最美的字”，这种估价也表现出对于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的否定。

<sup>①</sup> 參見弗里茨·庫姆夫：《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載 1963 年第 9 期民主德國《統一》杂志第 86—91 頁。

中共領導人在他們的實際政策中簡單地輕視經濟規律和整個發展階段。他們從小資產階級的急躁性出發，試圖通過激進的經濟措施來逃避經濟建設中的困難——這種困難由於中國經濟落后是十分巨大的——，同時試圖加速創造一個為貫徹他們的方針所需要的經濟基礎。“大躍進”必須像魔法棒一樣省去長期的經濟建設；人民公社——連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都沒有建立——却已經是在向共產主義過渡了。但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沒有也不可能對縮短經濟建設的時間有所幫助。相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使中國的經濟遭受巨大的損害。工業生產雖然在1958年至1960年有所增長，但是這些增長不是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而是通過勞動力的數字增加三倍而取得的。在1958年第八次黨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宣布的、不是建築在經濟基礎上的“苦戰三年——百年幸福”的口號已經落空了。由於農業沒有穩固的技術基礎，生產範圍極大地縮小了。中國領導人不去分析他們的經濟政策中的錯誤，反而開始粉飾困境，並捏造了與他們的錯誤的實踐相適應的理論，例如社會主義條件下國民經濟波浪式發展的法則。這就又給中國的民族經驗——而且還是一種錯誤政策的經驗——穿上了普遍規律性的外衣。

由於他們的經濟政策的巨大失敗，中國領導人在這個時期開始拒絕把經濟建設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為主要任務的方針，並否定經濟競賽的作用。在進行革命當中，他們實際上是半途而廢，因為他們向創造比資本主義高的勞動生產率這一任務的困難投降。但是列寧早就已經清楚地把完成這項任務稱作是爭取新的社會制度勝利的最主要之點。

中國領導人一方面用滔滔不絕的極端革命的空話——光是這一點就接近托洛茨基主義者了，另一方面用直接轉向托洛茨基主義理論的方法，來掩蓋他們的具體的政策失敗。因為，

按照托洛茨基主义的看法，胜利的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不是在本国建设社会主义，而是用军事手段在其他国家“煽动”革命。这样，就能避免从事“那种经过了深思熟虑、反复权衡并估计到最困难过渡情形的坚韧革命工作”，如同列宁早在1918年在反对托洛茨基分子斗争中所强调的那样，这些“唱高调的人和清谈家”对这项工作是无能为力的。<sup>①</sup> 在中国领导人的其他一些观点中也可以看到同托洛茨基思想相类似的地方。托洛茨基在1926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次全体会议上认为，由于战争的规模和规模变得越来越大，就能保证并加深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性质。这种观点同中国的小册子《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中所表示的观点有什么不同呢？这本小册子认为，反动派杀人越多，革命的力量就越强大是一种规律。伴随而来的有：武装起义是推翻资产阶级的唯一道路的观点；拒绝新的、多种多样的、包括和平形式在内的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低估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斗争，特别是低估这些国家的民主、反垄断运动；不管任何特殊条件就要求在每个国家内马上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与此有密切关系的是，甚至在肆无忌惮地诽谤苏共和偷偷地攻击其他兄弟党的方法上都（同托洛茨基）有相似之处。

可见，中国领导人的有偏差的概念，在某些极重要方面是具有严重后果的错误，这些错误首先建立在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思想同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論、以及同哲学中若干唯心主义倾向的无原则的结合之上，并为中国历史的某些客观因素，尤其是长期的武装斗争和经济落后所促进。但是，伟大的、经过斗争考验的中共集体，它曾克服了在建立人民共和国的斗争中和头几年建设期间的巨大困难，如今怎么会没有力量阻止这些错

---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20页。



誤的进一步发展呢？这方面最重要的基础在于中共当中盛行的个人迷信，在于缺乏党内民主，在于违反列宁的准则。只有在这个基础上，这些錯誤才能无所阻挡地达到这样的规模，决定着政策并发生着如此有害的影响。由于数十年的军事斗争，集体的形式几乎没有发展，命令和服从的作风也在党内盛行，所以个人迷信在中国党内找到了良好的土壤。

中国领导人几乎是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唯一强烈地反对苏共和其他党批判个人迷信，并公开维护个人迷信的人。譬如，在他们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讲了许多专政的问题，而差不多没有讲到进一步发扬民主的问题，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除其他因素外，个人迷信方法的特点是破坏党内民主的这样一些因素，如新的一次党代表大会的召开已过期两年，很难得才举行中央全会，而全会的过程不让党员和人民群众知道，或者只是发表一份简短的公报。在个人迷信的气氛中，公开表示意见是没有的。但是，甚至在中国报刊上也有显著的迹象，可以使人看出，广泛没有任何民主的状况终久是不堪忍受的。例如，1962年5月22日《山西日报》在谈到省政治协商会议准备工作时说：“为了顺利地举行会议，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必须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1)。”这就像一面反光镜一样。从国内关系和中国领导人的不幸的政策后果可以看出，对教条主义和个人迷信，如果不给予坚决克服的话，也可能在一个伟大的、胜利地通过战斗考验的党内成长起来，这是何等重大的损失呀。

所以创造性地思考显然具有巨大的意义。正如各兄弟党在莫斯科声明<sup>①</sup>中所指出的那样，苏共二十大以创造性的思想丰

---

① 参见1960年第12期民主德国《统一》杂志第1824页。

富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并由此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这一方面是因为党代会确定了对国际工人运动的战略和策略具有决定意义的关于和平共处政策、经济竞赛和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在以后的党代表大会上和苏共纲领中被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了，并且也为世界革命的当前战略和策略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是因为直接消除了个人迷信的巨大缺点和錯誤，但这些缺点在苏联沒有能使党的政策在本质上离开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沒有把党的政策引导到損害社会主义利益的方向上去，而中国今天的情况正好与此相反。但是苏共二十大的意义首先在于，为創造性地解决生活在共发展过程中向我們时代的中心力量——工人阶级提出的問題扫清了道路，并为革命在战略和策略方面以及在斗争形式和方法方面吸取在战斗中产生、成长和发展起来的新事物，扫清了道路。自那时以来只过去了几年，但已经证明，它对許多兄弟党的政策，对在发展新阶段中爭取社会主义的整个国际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方面苏共起了革命中心力量的作用，尽管中国领导人方面宣称革命中心“转变”了。由苏共领导的苏联现在是、而且永远是世界革命运动的中心，因为在苏联新的社会制度最发达，同时与此相应的是在这里集中了世界社会主义最坚定的和最强大的力量。

中共政策中的錯誤和缺点，其根源和开端由来已久，而它們恰恰在近几年成了一个完整的、錯誤的政策体系，中共领导人恰恰現在把爭論推到尖端以及挑起公开爭論，这也不是巧合。这不仅是由于造成这些錯誤的許多因素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才发展加强了。而且这首先是由于好些这样的因素——例如某种民族主义的特点、过高估計軍事斗争和轻视经济规律——在解决反帝游击战争和內战的任务时，甚至在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最初几

年还没有而且也不能发生那么有害的影响。但是，当新阶段的任务，冷静地、长期地进行经济建设，有原则而又灵活地为和平而斗争的任务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时候，这些缺点——由于个人迷信的毒害而更加牢固并得到了加强——导致一种陷入歧途的政策，这种政策不是解决这些任务、而是增加困难。

此外，他们的政策所追求的某些民族主义的特殊目标，也只是在最初几年的成就冲昏了中国领导人的头脑以后，才开始具体地发展。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出现采取缓和国际局势的步骤这一最初的可能性的时候，中国领导人前几年开始进行的反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运动最初是“理论性”的——而一旦他们相信能够以此阻止进一步缓和的可能性的时候，他们就愈发加强这个运动。这事发生在加勒比海地区危机期间，当时，他们也加剧反动力量所导演的印中边界冲突，并利用来加剧争论。中国领导人在拒绝莫斯科部分禁止试验核武器条约的时候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他们以那样一种方式进行争论，似乎他们面对着一个敌人，同时开始把反对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思想斗争，几乎同公开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

这种状态对于国际工人运动是不能容忍的，许多同志忧虑地间今后会如何进一步发展。国际工人运动在其历史中已经经历了许多次背离，尽管不是不遭受损失，它一再克服了这一切背离。诚然，过去的这些背离从来没有像今天所发生的情况那样是建筑在一个巨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和资源之上的。但是，正是这一点提供了客观理由使我们确信，这次分歧最终也将本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取得解决。因为尽管中共领导人有这一切错误，但是他们国家内部的客观规律没有停止起作用。这些规律，也就是生活本身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迫使产生一项正确的、符合它的要求的，也就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策。在某些方

面，列宁如下的这个指示在这里也是有效的：“政党内部之间的意见分歧往往不单靠原则性的论战来解决，同时也随着政治生活本身的发展而得到解决。特别是有关党的策略即党的政治行动的意见分歧，其结果往往是意见错误的人在事变进程的压力下实际上转上了正确的斗争道路，因为事变进程本身把错误意见完全抛在一旁，使它们变成枯燥无味、谁也不感兴趣的東西。”<sup>①</sup>

国际工人运动各个党与中共领导之间根本性意见分歧的产生，并没有客观必然性，因而解决这些分歧也没有客观障碍。而且存在着要求人们、并且将愈益强有力地迫使人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客观因素。这就是共产党和工人党反对共同敌人即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这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目标；最后，就社会主义国家而言，这就是共同的经济和社会基础。所有这一切，尽管有争论，却依然存在，正如伟大的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继续是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共和国的朋友一样。我们确信，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这种友谊，也将有助于在兄弟党在莫斯科通过的总路线的基础上消除分歧，并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重新加强合作。

（译自1963年10月10日第10期民主德国《统一》杂志）

---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2页。

# 1917年10月——人类历史的 轉折点(节譯)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候补委員 庫尔特·提德克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輝证明。它证实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它的前提和它的內在規律的学說的正确性。

根据弗·伊·列宁发现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客观規律，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了胜利。正如列宁所預言的，在一整个历史时期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存成为事实。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竞赛基础上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政策，必然成为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学說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列宁写道：“現在，我們是用自己的经济政策对国际革命給以主要的影响。所有的人，世界各国所有的劳动者，都毫无例外地(絕非夸大)注視着俄罗斯苏維埃共和国……在全世界范围内斗争已经轉到这个方面来了。我們一旦解决了这个任务，那我們就是在国际范围内真正地最終地取得了胜利。因此，经济建設問題对于我們有非常重大的意义。”<sup>①</sup>捍卫和創造性地运用这些学說，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具有根本的意义。

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却企图修改十月革命的普遍适用的教訓，这些教訓在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決議

---

① 《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27—428頁。

中，以及在1957年和1960年共产党和工人党會議文件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中共领导人6月14日的信中，像一根紅线似地貫穿着貶低工人階級及其最重要的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他們不把和平共处政策看作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而且也不再提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的经济竞赛了。

他們的信中說，“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間实行和平共处，这是一回事……階級斗争，民族解放斗争，由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另一回事。”

这种把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总路线与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階級斗争的各种形式对立起来和孤立起来的看法，是完全违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这些观点的最終結果是破坏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意义。他們否认这一事实，即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間的和平共处的政策和经济竞赛，为資本主义国家的階級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創造更有利的条件。

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之日起就进行的争取和平的斗争，对于各国的反帝斗争和社会进步过去和現在都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支持，这是一个不容置辯的事实。和平解决加勒比海危机又一次证实了这一点。由于苏联和进步阵营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强大，由于創造性地运用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和平和古巴的社会主义革命得以保持。

这个政策在历史面前通过了考验。在世界三分之一的土地上，社会主义成为不可抹煞的事实。現在存在着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它的工业生产已占世界工业生产的38%，并且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决定着世界的发展。1917年还統治世界77.2%土地的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实际上已经崩潰了。在資本主义国家，强大和富有影响的共产党正在不断发展，它們站在所有进步力量的

前列，为爭取和平和社会进步而斗争。

尼·謝·赫魯晓夫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說：“目前主要的是，要不断发展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爭取使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在绝对产量方面超过世界资本主义体系。”<sup>①</sup>苏联的成就，尤其是最近十年来苏联的成就是坚决执行列宁这一政策的明证。

通过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用这些经济成果进行的这种直观教育，增加了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加强了资本主义国家和受殖民压迫的国家的被剥削的人民群众的战斗意志。下述事实表明，中共领导人的“和平共处政策破坏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的观点，是一种凭空捏造的論断。1919年到1939年参加罢工的劳动者大約有八千万人，而1946年到1960年就超过两亿两千万人。最近几年，资本家往往很快就接受罢工要求，这无非证明他们在社会主义的日益增长的威力和吸引力面前不得不谨慎行事并作出让步。

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的经济力量，它們給予为民族独立和社会独立而斗争的各国人民的无私的经济援助，也有助于解决民族解放运动当前的主要任务——加强爭取经济独立的斗争。

\* \* \*

害怕传播和创造性地运用十月革命的思想的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竭力利用我們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原則性意見分歧为他們的反共煽动服务。对他們來說，特別重要的是詆毀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学說。他們装模作样地問道：“这是什么科学？它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誰也不会期待資本的宣传員会保卫

---

<sup>①</sup> 尼·謝·赫魯晓夫：《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第14頁。

那种在最尖锐的反对资本的斗争中产生的、并且科学地论证了资本必然灭亡的学说。

掌握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并不表现在抽象地重复它的理论原则，也不表现在叙述工人阶级的最一般的任务。而重要的是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帮助下，周密考虑具体情况，从而为人民的斗争制定一个符合民族要求和国际要求的建设性纲领。忠实于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意味着忠实于这些或那些过时的论点。情况变了，与过去的结论相适应的前提也就变了。瓦尔特·烏布利希同志在讲话中常常强调指出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引起的政策转变的伟大意义。他称它是克服斯大林时期在共产党内盛行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狭隘性的转折点。“它是向广泛发挥本国人民群众的才能和力量的过渡，是向广泛发展世界各国人民群众的合作和信念的过渡。”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尤其是尼基塔·謝尔盖耶维奇·赫魯晓夫同志的伟大功绩是根据对形势的透彻分析，用许多新的重要的结论丰富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在1957年和1960年的会议上，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致而且全面地确定了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的主要任务。

中共领导人今天的观点不是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又一种解释，而是背离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历史的教训是：背离的行为迟早会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被克服。争论的结果将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更团结，更壮大。

（譯自1963年10月24日第21期民主德國《新路》杂志）



# 資本主义国家工人階級斗争的 历史意义(节譯)

保尔·馬尔科夫斯基

## 工人階級的历史使命

中共领导在攻击共同商定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时候,不仅企图贬低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階級的作用,特别还企图贬低帝国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意义,并企图把世界革命先鋒的作用归之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实际上是企图使其他一切革命运动从属于这个运动。但是中共领导人的这种态度絕不符合世界革命现阶段中的革命斗争的经验,从而使人认为它是放弃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性階級立場。馬克思主义的最伟大发现之一,就是认识到工人階級的历史使命。工人階級与現代社会的其他所有階級不同,只有它能够领导争取新社会制度的斗争。这是由它在同最新的技术和大都已社会化的生产过程結合在一起的生产中的地位,即它对生产資料的地位决定的,也是由它的科学世界观的意义决定的。相信中国领导人的主张,就是推行錯誤的战略,就是不促进世界革命,阻碍世界革命。对于資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階級來說,就是使他們的斗争成为曾经受过殖民压迫和現在还在受殖民压迫的国家的民族运动的附庸,就是要求他們靜待事态发展而延緩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这样做,就犯了某些資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人曾犯过的同

样錯誤，不过形式相反而已。那些共产党人认为，只有帝国主义宗主国中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殖民地的民族独立才有可能实现。可是，在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之间实际上存在着相互辩证的关系。两种运动都汇合在一个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统一革命过程中。只有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才能为民族解放运动胜利的可能性创造基础，并给以重大支持。法国、英国、荷兰、比利时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为支持民族解放斗争，对本国资产阶级进行了无比英勇的斗争，是尽人皆知的。在这一斗争中，工人阶级遵循马克思的口号：一个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本身是不会自由的。这是对民族解放斗争的重大支持，并加速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灭亡。同时这也是争取所有工人和劳动者的权利，反对本国反动力量的阴谋诡计的斗争所绝对必要的。

另一方面，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英勇斗争也是一种伟大的反帝力量，它支持着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斗争和社会主义国家保卫和平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努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文件都说，民族解放运动是当代最伟大的社会力量之一，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形成以后，殖民主义的瓦解就是对帝国主义的第二次毁灭性打击，这种提法不是没有理由的。但是我们不能忽略民族解放运动的局限性。它是有最广泛的社会阶层参加的反帝运动，这些阶层是：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一部分资产阶级、有时甚至还有封建势力。这个运动的目的是争取民族独立。它不是一个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运动。凡是民族解放运动由一般民主的、反帝反封建阶段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的地方，都是在重新组织阶级力量以后才实现的；在重新组织阶级力量的过程中，工人阶级成为运动的领导，反动剥削阶级的代表从领导职位和经济

权力地位上被排除出去。真正关心本国人民命运的最有远见的、最坚决的民族主义领袖越来越接近馬克思列宁主义，这不是偶然的。

尽管出现了导致资本主义全面削弱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第三阶段的各种现象，尽管有许多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革命运动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低于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的成就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成就。许多同志一再提出这个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虽然有过一时的伟大革命斗争阶段，然而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能够打破或者基本上限制住垄断资产阶级的权力，代之以人民民主权力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为什么？中共领导人恰恰死死抓住这个事实，他们断言反帝斗争的“风暴中心”已转移到从前的殖民地，因为那个地方——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反——在最近若干年来从帝国主义手里夺取了一个又一个阵地：

可是，难道因为帝国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力量至今还不足以战胜资产阶级，我们就能像中国领导人一样从中得出结论，说反帝斗争的“风暴中心”已转移到从前世界上的殖民地地区了吗？因此民族解放运动也就成为革命斗争的先锋队了吗？提出这个主张就是相信借助民族解放运动能够消灭帝国主义。然而经验证明，尽管帝国主义在殖民政策方面不得不忍受严重的失败，但是帝国主义并没有崩溃，而且今后显然也不会只因殖民制度的消灭而崩溃。帝国主义权力和实力的中心不在于它的殖民制度，而在于它控制着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对帝国主义的决战也必然是在这里进行。

## 爭取和平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

对共产党来说，首先而且最主要的就是在维护和平的条件下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制定适当的战略和策略；因为如果经过一场带来巨大破坏的核战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因此正确回答争取和平的斗争和和平共处政策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如何发生影响这个问题，具有重大意义。难道就像中共领导人所断言的那样，争取和平的斗争不是革命斗争，而是转移反帝斗争的方向吗？难道只有武装斗争才是革命斗争吗？争取和平的斗争同反帝斗争是对立的，还是互相结合的呢？

中共领导人硬说，至今为止，一切社会主义革命事实上只能通过“革命战争”，并且只有在战争造成的后果中才可能实现，由此还得出结论说，将来也必然是这样。当然，在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确实存在联系，因为两者都是一切帝国主义矛盾极端尖锐化的后果，两者在同一基础上产生，其原因基本相同。如果说至今一切社会主义革命都是经过世界战争发生的，那么这是同战争导致一切社会矛盾的异常尖锐化和加速全国性危机（这是产生革命形势的前提）的成熟这一点有联系的。战争加速形成了被压迫阶级的状况极端恶化，它们对统治阶级的不满和憎恨迅速增长的局面。同时，战争还导致帝国主义压迫机器的瓦解，导致帝国主义统一战线的削弱。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能够比较容易地动员群众推翻资产阶级。虽然过去有时谈到，战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间接后备军”<sup>①</sup>。

<sup>①</sup> 约·维·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载《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36页。

但是共产党决不希望爆发战争或为了能够更快地推动革命而促成战争。

可是今天，存在着防止战争的现实可能性，共产党就应该一致努力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它们决不能也决不应该把战争看做是“革命的后备军”。这并不是说，帝国主义者发动的原子战争就不是最后的战争，就不是帝国主义的坟墓了。但是共产党人考虑到今天的战争所需付出的巨大牺牲，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采取依靠战争战胜资本主义，并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它们也不需要这样做，因为社会主义能够而且将在和平的条件下取得胜利。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政策是一种绝对可靠的政策，是这些国家争取世界革命的斗争的战略的牢固基础。

## 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

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制定夺取政权的斗争的战略和策略时的出发点是：目前有许多内部和外部的新因素正在发生作用，它们能够加速资本主义国家革命形势的成熟过程，从而日益有利地促使一些新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属于外部因素的，首先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卓有成效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对于人们的思想和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斗争具有深刻的影响。社会主义思想有效实现的范例是新社会比资本主义优越的实际证明。尤其是正当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加强，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尖锐化的时候，社会主义使得劳动人民的摆脱资本主义枷锁的愿望成为一种现实的、不断增强的社会力量。尤其是因为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所有自动化和合理化的问题，都能对社会和个人有利地加以解决，而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却会导致剥削的加深和不可解决的新矛盾。

盾的产生。十分明显，社会主义国家越是在一切物质生产方面不仅赶上而且还大大超过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从而在经济竞赛中取得决定性胜利，上述革命化的作用也就越大。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的社会成就是对争取社会权利和经济权利的工人斗争的直接援助。假如资本家不是处在社会主义国家榜样的压力之下，那么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状况将会比今天坏若干倍，这是肯定的。问题并不像中国领导人诬蔑我们的那样，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似乎也会使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自动走向胜利。从来也没有哪一个共产党有这种看法。不过问题在于，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中的工作和成就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是一种巨大的援助和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经济竞赛中的成就对于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力量对比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力量也间接地减轻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困难。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特别是在军事上已经超过帝国主义的苏联的存在，打落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手中的对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各国人民输出反革命的工具。

兄弟党在回答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前景问题以及阐述自己的政策的时候，遭到了中共领导人方面的激烈的攻击。中国领导人指责帝国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奉行改良主义的政策，据说是因为它们争取改善工人阶级的社会状况和经济状况的斗争只为工人贵族的利益服务，促使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化，从而引导工人阶级脱离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他们要求这些共产党不在和平、民主、保卫劳动人民的社会权利和经济权利、限制垄断资本的阵地这些问题上进行争取群众的具体斗争，而是不顾具体条件，用似是而非的革命空话动员工人阶级立即“直接进攻”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中共领导人攻击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时的出发点是，只有使这些国家的劳动人民贫困化，通过饥饿、混乱和战争驱使他们感到极度绝望的时候，才能实际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一种见解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毫不相干的，它是小资产阶级的、非无产阶级的，反映出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革命力量缺乏信任，这也说明中共领导人低估了它们的革命力量。这样一种态度违反阶级斗争的所有经验。马克思和列宁已经一再指出，共产党的义务是，帮助工人阶级甚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争取能够过得去的生活条件；而且也一再指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要动员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斗争，只有从工人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基本的忧虑和需要出发，坚决争取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出卖劳动力，除此以外没有其他途径。马克思主义者懂得，只要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发生作用，工人在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中只能达到使劳动力这种商品按值出售的目的。可是，劳动力这种商品的价值是可变的，是由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决定的。这就是说，工人阶级的斗争起决定性作用。这种认识并不是新的，但是，工人在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斗争的条件却是新的。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存在的影响下，面对资产阶级的历史性的衰弱，今天劳动人民完全有可能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重要的社会成果和经济成果。例如，意大利劳动人民在资本主义繁荣的条件下进行斗争的经验证明，即使工人取得重大的社会成果和经济成果，工人阶级的斗争热情不但没有减退，甚至还在增长，不过工人阶级要有一个坚定的政治领导，这个领导没有任何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并且能够利用斗争的一切可能性和形式。这是进行阶级觉悟教育的途径，是夺取政权的群众性政治斗争的发展的必要阶段之一。

面对着新的国际形势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变化，如果像中国

领导人那样死死抱住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的概念和条文不放，对于工人运动的先锋队来说，这就意味着，否认和不利用人民运动的斗争的新的可能性，把自己孤立于工人阶级群众和人民群众之外。这就不可避免地促使共产党变成一个小宗派，在它的口袋里虽然有一个新的、完善的社会制度的处方，但是在革命斗争中，谁也不跟着它走。因此，当中国同志提出现在的问题是“要不要革命”的问题（他们想用这一点责备兄弟党不革命）的时候，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党在回答时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说过，革命不只是我们所期望的，而且是历史的必然性。对兄弟党来说，重要的不是解释要不要革命的问题，而是在今天的条件下怎样才能进行革命的问题。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兄弟党考虑到一切新的因素。

（译自1963年11月12日第11期民主德国《统一》杂志）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會議 1963年11月14日向人民議院 提交的报告(节譯)

我們感到遺憾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关系並沒有免受意识形态分歧的影响。

我們尤其感到遺憾的是，由于这种发展，我們两国之間的经济合作減弱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希望并期待重新发展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即社会主义国家之間可能和必須发展的那种关系。社会主义国家良好的兄弟关系，要求一項一貫基于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則上的政策。

(譯自1963年11月15日民主德国《社会主义民主》周刊)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會議 1963年11月14日在人民議院會議上 所作的关于上一屆任期的 工作报告(节譯)

部长會議遺憾地指出,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事态的发展,同中国的经济合作减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断貨物供应和取消工业合同,給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带来了可觀的損失。显然,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合作的意义,被主张所謂“自力更生”理論的中国政府低估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主张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保持良好关系,希望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間的经济关系重新正常地发展。

(譯自1963年11月22日民主德國《社会主义民主》周刊)

## 霍尔斯特·辛德曼代表德国統一社会党 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第五次 全体會議(1964年2月3日至7日) 所作的报告(节譯)

我們很感遺憾，我們被迫不得不在这一次全会上对中国領導人的行为再一次表示态度。众所周知，苏共中央以及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中央委员会，曾經向中国领导人提議暂时停止兄弟共产党之間的任何公开論战。实际上，苏共以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近两月已沒有就与中国领导人的意見分歧进行公开論战。

在这整个时期，中共領導不仅继续不断地进行公开的爭論，而且于1964年2月4日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刊《人民日报》和《紅旗》上发表了所謂七評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在这篇文章中不光是继续进行論战，而且直接鼓吹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这篇文章是对共产党和工人党在1957年和1960年共同制定并通过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以及对苏共中央及其第一書記尼·謝·赫魯晓夫同志的最卑劣的攻击。德国統一社会党中央憤怒地拒絕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发表，是一个与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間关系准則格格不入的、应受譴責的行动。这篇文章中所表示的态度，离开了一切严肃的客观討論的立場。

数星期以前，中国領導人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上发表了关于辯证唯物主义中国化的著作。这些具有党的官方性质的材料，表明中国党的領導离开了馬克思和列宁的学說。

德国統一社会党保证，它同苏共及其以尼·謝·赫魯晓夫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不可动摇地团结在一起。我受政治局之托声明，我們的党将尽一切努力来保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基础上的团结。

(譯自1964年2月13日民主德国《新德意志报》)

# 爭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結

德国統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

《新德意志报》編者按：

《新德意志报》今天发表了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重要文件，即：米·苏斯洛夫同志《关于苏共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而斗争》的报告和苏共中央全会1964年2月15日通过的決議。

德国統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就此向我们写道：

德国統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在1964年2月3日至7日举行的第五次會議上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旨在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統一和团結、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反对1957年和1960年共产党和工人党联合声明的活动，再一次表示了态度。它一致贊同政治局的报告。在报告中憤怒地譴責了中共领导人的分裂活动和反列宁主义的观点，并表示德国統一社会党与苏共及共以尼·謝·赫魯晓夫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不可动搖的团結。

在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會議作的报告中說：

“我們感到很遺憾，我們被迫不得不在这一次全会上对中国领导人的行为再一次表示态度。众所周知，苏共中央以及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中央委员会，曾經向中国领导人提議暂时停止兄弟共产党之間的任何公开論战。实际上，苏共以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近两月已沒有就与中国领导人的意見

分歧进行公开論战。

“在这整个时期，中共领导不仅继续不断地进行公开的爭論，而且于1964年2月4日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刊《人民日报》和《紅旗》上发表了所謂七評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在这篇文章中不光是继续进行論战，而且直接鼓吹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这篇文章是对共产党和工人党在1957年和1960年共同制定并通过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以及对苏共中央及其第一书记尼·謝·赫魯晓夫同志的最卑劣的攻击。德国統一社会党中央憤怒地拒絕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发表，是一个与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間关系准則格格不入的、应受譴責的行动。这篇文章中所表示的态度，离开了一切严肃的客观討論的立場。

“数星期以前，中国领导人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上发表了关于辯证唯物主义中国化的著作。这些具有党的官方性质的材料，表明中国党的领导离开了馬克思和列宁的学說。

“德国統一社会党保证，它同苏共及其以尼·謝·赫魯晓夫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不可动摇地团结在一起。我（即辛德曼，他代表政治局向五中全会作报告。——譯者）受政治局之托声明，我們的党将尽一切努力来保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基础上的团结。”

五中全会以后，德国統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在1964年2月18日对中共领导的活动作了一个估計，除其他內容外还指出：

“在实现1957年和1960年莫斯科會議上一致協議的、在革命斗争中经过考驗的总路线的过程中，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設，在爭取和平、民主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取得了新的成就。苏共及其以尼·謝·赫魯晓夫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历史功績就在于：通过在苏共

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发展的政策给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指出了道路和目标。苏共通过它的坚决的、原则性的斗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的进一步发展，对人民群众的力量的充分发展，对和平、民主、民族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的巨大思想攻势在全世界的开展作出了最大的贡献。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一向努力加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团结。因此我们曾经欢迎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在莫斯科就意见分歧进行较长的会谈。不幸，这次会议中断了，而且至今还没有继续举行。赫鲁晓夫同志在我们的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受苏共中央的委托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停止公开争论的建议。党代表大会同意这项建议。遗憾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此非但没有回答，而且发表七篇文章加剧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对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攻击，并且在1964年2月4日的文章中，公然要求进行分裂活动。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一如既往认为应该停止公开争论，应该举行苏共和中共之间的会谈。可是，只有中共领导放弃在这个时候继续散发1964年2月4日的文章，并且停止散发他们反对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文章，以及停止在共产党和工人党内部的分裂活动，停止公开争论才有实际意义。

“必须检查一下，为了筹备一次共成员与1960年会议相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必须采取哪些措施。

“中共领导人追随另一条，即非马克思主义的总路线。在政治局给我们党五中全会的报告中已经指出，中共领导人继续进行了公开论战，并且尤其是由于所谓七评的发表，在与中共领导意见分歧方面出现了一个新的形势。

“这个新的形势的特点是，中共领导人公开地、直接地鼓吹分裂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且在他们的宣传和实际活

动中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发动了全面的进攻。中共领导人已经用他們的1963年6月17日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議》，用发表周揚在1963年12月26日的讲话《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的作法和對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一系列所謂評論(至今已有一篇)，全面地說明了自己的綱領。这个綱領采取的形式是对苏共及其中央委员会和赫魯晓夫同志本人，以及对一切一贯执行建立在1957年和1960年莫斯科會議文件的基础上的政策的党，进行卑鄙攻击。

“关于他們的綱領可作如下的估計：

(一) 中共领导人不仅否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的力量对比的条件下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他們不仅否认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及其他兄弟党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已经作出的和正在作出的巨大贡献。他們篡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并公然用所謂的毛澤东思想来代替它們。他們号召所有的人服从他們自己所說的中国化的馬克思主义，即他們的冒充的‘真正馬克思列宁主义’，从而要求所有的兄弟党取消馬克思列宁主义。他們取消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問題就表现在：

(1) 篡改1957年和1960年莫斯科會議上一致通过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

(2) 否认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結論；

(3) 篡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辯证法，并用詭辯的非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观点来代替它；

(4) 篡改国际工人运动史。

(二) 他們鼓吹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每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只要他們不向中国领导人的路线屈服)的‘必要性’



和‘必然性’。

(三) 中共领导人现在要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有的党都承认中共的领导作用。他们要求所有的党放弃它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策，并且服从中共领导人的政治路线。他们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特殊的条件。这些条件归结为：否定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放弃和平共处、和平经济竞赛的政策，以及否定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工人阶级的决定性作用。这就是说离开在1957年和1960年文件中共同规定的总路线。

他们提出这些条件，就是号召推翻苏共领导和其他反对中国路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的领导。

“中共领导人的政策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原则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背离，按其内容和他们的斗争方法来说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托洛茨基主义，它在中共——一个执政的党——的领导人身上表现为大国沙文主义、种族主义、左倾激进冒险主义、反苏主义和宗派的分裂活动。”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本着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和团结以及促使中共领导人停止他们的有害的分裂活动的愿望，在3月中曾给中共中央去过一封信。在这封信中，我们再一次建议停止公开争论，并且说明德国统一社会党支持苏共提出的关于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举行联合会，以及至迟在今秋举行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建。奇怪的是我们没得到这封信的回信。

中共领导不同意苏共、德国统一社会党和其他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这些建议，而是越来越尖锐地继续进行反对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总路线的公开运动，最后竟然在3月31日在北

京《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又一篇超越了一切論战界线的编辑部文章。这一篇文章是对苏联，苏共及其以尼·謝·赫魯晓夫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对我们党和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坚持1957年和1960年一致協議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的其他所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荒謬的誹謗。由于这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以及对所有反对中共领导人路线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工人党执行的政策所进行的露骨的誹謗性攻击，公开作出答复便成为必要的了。

发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材料有助于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反对帝国主义，爭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团结，有助于揭露中国领导人的反列宁主义的纲领和分裂活动。德国統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声明它完全贊成和支持苏共的措施。德国統一社会党与苏共及其中央委员会和尼·謝·赫魯晓夫同志的牢不可破的团结，现在是而且今后仍然是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誼的确实的保证，是和平的保障。德国統一社会党同所有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一起，为馬克思列宁主义学說的純洁性和神圣不可侵犯性、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統一和团结、为和平与和平共处、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而进行不屈不挠的坚决斗争。

(譯自1964年4月4日民主德国《新德意志报》)

## 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結

《新德意志报》社論

共产党和工人党在1957年和1960年的會議上制定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国际事态发展的整个进程完全证明了这条总路线的正确性。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成为我們时代最有影响的政治力量，成了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因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沿着这条共同制定的总路线势不可挡地向前迈进。世界社会主义体系順利地发展着，它对帝国主义的优越性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进行着巨大的阶级搏斗，参加搏斗的劳动人民越来越多。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使又一些殖民国家争得了政治独立。由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所有其他和平力量的共同努力，得以采取巩固和平的新的重要步骤，并且挫败了帝国主义的最富于侵略性的集团发动热核战争的企图。

如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放弃他們的反对这条总路线的斗争，停止分裂活动，像其他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一样地遵循共同的決議，那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成就还会更加巨大。

\* \* \*

中共领导把一場耗費时间和力量的爭論强加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我們党不得不再地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当代基本問題上的非馬克思主义的态度进行斗争。众所周知，我們党的三中全会詳細地討論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观点，并且譴責这

些观点是非馬克思主义的。我們党的五中全会又一次被迫对中共领导人表示态度。中共领导人对苏共、德国統一社会党和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提出的停止公开論战的一切建議的回答是发表数百篇充滿了无根据的断言、歪曲、謾罵和誣蔑的文章(或是其他公开的行动)。

这些文章的作者走到那样远，竟然这样声称：由于意見分歧的性质再也不存在妥协的可能性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已是不可避免的了。他們断言，分裂作为阶级斗争的反映是合乎規律的。如果要統一，那就只有无条件地承认为毛澤东所“中国化了的”馬克思主义的思想概念。

今年3月31日中共机关报刊《人民日报》和《紅旗》又发表了一篇党的官方文章。假面具揭下了，并且公开要求修改1957年和1960年的共同決議。这重新向全世界表明，中共领导不仅仅在策略問題上持有与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不同的意見，而且他們还离开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主张一条自己的、与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共同決議相对抗的总路线，并且在此基础上从事分裂各个兄弟党和分裂整个运动的活动。中共领导的政策和活动今天已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的主要危险这 論断是有道理的。

\*                     \*                     \*

鉴于这个事实，4月4日《新德意志报》发表的苏联共产党的文件具有特殊的意义。赫魯晓夫同志是停止共产党之間公开論战建議的創議人。苏联同志对中共领导的态度表现了极大的耐心。他們为了推动中共领导遵守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共同決議，一再提出建設性的建議。他們在这方面得到了各兄弟党的支持，各兄弟党从自己的方面設法促使中共领导放弃共錯誤观点。比如我們党也做了一切努力，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在六大的讲坛

上以及在多次談話中，我們都在這種精神下發揮了作用。可是，由於北京的人們以為可以蔑視兄弟黨的意見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利益，並且更加無恥地展開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首先是反對蘇共的一場公開戰役，蘇共中央便在今年2月決定揭露中國領導人的反列寧主義的觀點和分裂活動。根據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慣例，蘇共中央在發表全會的材料之前，同兄弟黨進行了磋商。蘇共中央的建議得到了全面的諒解和支持。

在磋商的過程中，有一個兄弟黨的領導人表示希望蘇共中央暫緩發表全會的材料，因為他們還想作一次達到停止公開論戰的嘗試。這個兄弟黨的創議被北京拒絕了。北京電台以加強對蘇共和其他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煽動性廣播，來伴送這個代表團離開北京。

\*             \*             \*

現在發表的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蘇共中央書記蘇斯洛夫同志的講話以及蘇共中央關於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而鬥爭的相應的決議（見今年4月4日《新德意志報》）是對中共領導的非馬克思主義政策和理論及其目的和原因的深刻分析。蘇聯同志們以這些文件對國際工人運動作出了不可估價的貢獻，因為他們維護了共同決定的總路線，保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純潔性，並且在全世界爭取和平、民族獨立和社會主義的鬥爭的主要問題上，幫助發展了正確的战略和戰術。蘇共這一次又證明了1960年共產黨和工人黨一致同意的聲明的正確性，即：蘇聯共產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最有經驗和久經考驗的隊伍，過去是、今後仍然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公認的先鋒隊。

中共領導人表明，他們自己沒有能力理解由於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的產生、民族解放運動和帝國主義國家大規模群眾運動的發展而在世界上引起的巨大變化。蘇斯洛夫說得對：“各兄弟

党在結合現时代的条件創造性地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的基础上通过集体努力而作出的新的評價和結論——关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关于建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关于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关于反对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的必要性、关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摆脱了殖民主义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等的新評價和結論，这一切都遭到中国領導的歪曲，实际上被它抛弃。”

中共領導人从大国沙文主义和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立場出发，企图修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提出了实质上可以归结如下的思想概念：否认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对世界发展进程的日益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斗争采取轻视态度；把民族解放运动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工人运动对立起来；对外政策上的冒险主义和維持冷战；在革命問題上的宗派主义和暴动主义；維持并保持已遭共产主义运动譴責的个人迷信，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为派別斗争辯护。

因此，我党中央政治局对中共領導人的政策作了如下估計：“中共領導人的政策就是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原則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背离，按其內容和他們的斗争方法来说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托洛茨基主义，它在中共——一个执政党——的領導人身上表现为大国沙文主义、种族主义、左傾激进冒险主义、反苏主义和宗派的分裂活动。”

\*                     \*                     \*

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全体爱好和平的人們已经看到，中共領導在战争或和平这样极重要的問題上是用多么冒险主义的方式处事的。他們低估世界热核战争的危險，把原子弹称之为紙老虎。他們要苏联放弃为在苏美关系中发展和平共处政策而作的努力，他們的这个要求足以說明这一不理智的政策。

不难理解，苏美关系对于維持和平是具有极大意义的。苏共及其中央委员会，尤其是尼·謝·赫魯晓夫同志在这方面的原則性的明智的政策，对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对一切革命运动和世界和平作出了不可估价的貢獻。这显然令中共领导人感到不快。他們大概是希望苏美爆发一場軍事冲突，而这无疑就等于爆发一場世界核战争。然而，这个目标的提出是与1957年和1960年通过的維持和巩固和平的斗争的总路线直接相对立的。

中共领导狂妄地要禁止苏联同美国建立正常关系，而他們自己却同戴高乐实际上締結了联盟。真是奇怪的邏輯！但是，因为北京的人士对寻找假的理論根据是很老练的，所以想出了所謂世界中間地带的論点。被算在这个“中間地带”之內的有除美国以外的非社会主义世界的所有国家。他們断言现阶段国际政治的軸心不是两个体系即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之間的斗争，而是美国对“中間地带”的侵略。諸如西德、法国、日本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年轻的民族主义国家，全被混为一談。根据中国人的观念，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西德工人阶级就得藐視1960年莫斯科声明所指出的欧洲的主要危险是来自西德这一論断了。不仅如此，按照中国人的邏輯，西德极端主义分子簡直是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斗争中的盟友了。这是对馬克思主义辯证法的一个什么样的嘲諷！

各个国家的阶级本质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实际上被中共领导忽略了。中共领导人不再从阶级立場出发来处理对外政策問題。显而易见，他們在追求其他的，即民族利己主义的目的。为此他們也毫不犹疑地力图把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与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分隔开来，并在肤色和种族归属的基础上策划建立一个由自己对共施加领导的集团。这种政策对正处在爭取获得或巩固本民族独立、爭取发展本民族国民经济

和爭取一條新的发展道路的斗争中的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是有害的。中共领导人告诉他们的就是“武装斗争”的左的词句，其内容没有任何符合摆在这些国家日程上的任务的积极思想。按照大国沙文主义目标的精神，中共领导人已开始 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建立分裂的组织（工会、新闻工作者、作家、大学生和其他的组织），要使这些组织同那些联合了全世界的人的国际组织对立起来。中共领导人的这个方向对于全世界进步人士的统一斗争是一个危险。

\* \* \*

中国领导人把意识形态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日益转到经互会成员国的国家关系上去，这是个令人遗憾的事实。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始终坚决反对这样一种做法。苏斯洛夫同志的报告根据具体的事实说明了中共领导用哪些手段和方法企图扰乱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他们力图利用驻在国外的国家机关来散布中共领导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观念，以便也在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找到听从北京指挥棒的人，他们的这种活动是特别恶劣的。

中共领导顽强地——这种顽强如用在 一件更美好的事业上会是有价值的——追求着分裂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尤其是影响社会主义国家同苏联的关系的目的。在缔结关于部分停止原子武器试验的莫斯科条约方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必须拒绝这样一种企图。我们共和国的每个公民都清楚地知道，正是由于苏联在缔结莫斯科条约方面的态度，我们共和国才得以参加这个意义重大的国际条约，而这个步骤也是符合德国人民切身利益的。采取中共的立场，即在核问题上支持西德极端主义分子，就会使德国人民的利益遭到迎面打击。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联之间播种不和的卑鄙企图是一定要失败的。我们的标准是我们党



的綱領的這一段話，“蘇聯的道路和實踐，這就是見諸于行動的列寧主義。對蘇聯——國際工人運動的中心、馬克思列寧主義與和平的堡壘的態度，無論在今天還是任何時候都是共產黨和工人黨以及社會主義國家的政策的試金石。蘇聯對於反對修正主義、宗派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鬥爭的勝利具有決定性作用。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人道主義思想的純潔的保證，是世界社會主義體系和國際工人運動的一致和團結的保證。”

中共領導正在直接組織共產黨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分裂。他們用大筆資金在西方國家中搜羅托洛茨基主義的、民族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的勢力和多次被開除出共產黨的道德敗壞的分子，糾合成分裂分子集團。一般地必須說，中共領導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總路線是不擇手段的。他們竟直接向帝國主義新聞界的瘋狂的獵奇的報紙免費提供誹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及其擁護者的原文材料。這樣的事，國際工人運動只是從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鬥爭歷史中才有所知的。

\*                     \*                     \*

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感到不得不对中共的非馬克思主義政策和他們的分裂活動表示態度。絕大多數共產黨和工人黨拒絕中共領導的思想概念，並忠實于共同制定的總路線。但是，為了把中共領導對革命運動的態度所引起的危險減少到最低限度，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表示態度是不可避免的。

蘇共中央在今年3月7日給中共中央的一封信中建議蘇共代表團和中共代表團在1964年5月舉行會晤，然後，參加籌備1960年莫斯科會議起草委員會的各共產黨代表在6月或7月舉行會議，以便在1964年秋能夠舉行所有兄弟黨的會議。蘇共的建議和措施得到了我們黨的充分支持。這一方針符合于正在不倦地為爭取和平、為在兩個德意志國家之間的关系中貫徹和平

共处原则、为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而劳动着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劳动人民的利益。

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其中包括我們久经考驗的党已经清算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形形色色的背离。現在也同样会清除来自北京的背离。尼·謝·赫魯晓夫同志星期五在布达佩斯的讲话，說出了所有共产党人的心意。他說：“毫无疑问，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将在反对分裂者的斗争中，在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旗帜下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在这场斗争中他們将变得更坚强、更巩固，并将把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带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的历史性胜利。”

(譯自1964年4月5日民主德国《新德意志报》)

## 德国統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反对 中国领导人的分裂政策、主张 加强共产党和工人党的 一致和团结的声明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代表在 1957 年和 1960 年在莫斯科共同制定并且一致通过了共产党和工人党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声明。

共产党和工人党最近几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是实现这一共同制定的总路线的结果。生活本身证明了这些决议的正确性。

我们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劳动人民全心全意地赞同这两个声明。由于我们言行一致，我们为这两个声明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也根本不可能采取另一种作法。因为在 1957 年和 1960 年的文件中对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现时代作了科学的分析，根据世界上新的力量对比对确保和平和争取社会进步的斗争作出了正确的结论，并且指出了实现时代基本要求的途径。

这些基本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避免一场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和贯彻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政策；彻底无遗地消灭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争取民主和社会进步的斗争。

德国统一社会党就像苏联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一样，遵循着这一条集体制定的、共同通过的并且也为我们的斗争多次经验所证明是正确的总路线。我们的始终不渝的和平

政策，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全面地建設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計划和管理的列宁原則的貫徹，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族文化的发展——所有这些都是遵循这条总路线的证明。

今天，凡是有健全理智的明眼人都能看到：我們党所走的道路过去是今天仍然是好的。我們共和国在经济上更强大了，这一点不仅仅我們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都感觉得到，而且連我們的敌人——尽管是咬牙切齿地——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我們共和国在政治上也更强大了，它的国际威望增长了，和其他人民和国家的关系扩大了。西德帝国主义和軍国主义遭到了沉重的打击，阿登納集团的侵略政策遭到失敗，而且只要艾哈德继续执行这一政策，它也将导致同样的結果。

因此这就十分清楚：今后無論什么东西、無論什么人也不能使我們离开已证明是正确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总路线和我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綱領（它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創造性地应用到德国复杂的斗争条件上去）。

## 一

中共领导人反对这条卓有成效的总路线，我們党曾多次地拒絕中共领导人的立場。我們党这样做是和苏共（它前几天发表了中央委员会二月全会的材料）以及絕大多数的兄弟党一致的。

德国統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很了解，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居民对中共领导人的政策感到憤慨。他們是有理由的，因为这个政策給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損害。現在很清楚，中共领导要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和团結。

讓我們再一次追述一下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會議。当时，中国领导人就已经反对这一規定：任何一种宗派和分裂活动被

譴責为是与列宁的党的关系准则完全不相容的。从此之后中共领导人沿着他們的錯誤道路走得更远了。他們在所有根本問題上都离开了1957年和1960年莫斯科宣言和声明的立場。他們用自己的无原則的綱領——各种反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观念的拙劣混合物，同宣言和声明相对抗。不仅如此，当他們认识到，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以及他們的经过考验的先鋒队——以赫魯晓夫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下的苏联共产党断然拒絕篡改一致協議的总路线的任何企图，并且始終不渝地继续执行为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政策的时候，他們就使用宗派斗争的各种手段发动反对苏共和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运动。

我們想追述一下，德国統一社会党同苏共和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一样，曾經向中共领导人及时地指出了他們的政策的非馬克思主义性质，并且建議停止公开論战，进行实事求是的、同志式的討論。但是，他們把这个忠告当作耳边风。他們用更加粗暴的攻击、侮辱和指責来回答兄弟党同志式的建議。他們甚至公然号召推翻列宁的党和其他許多共产党的经过考验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而这就意味着：他們已經轉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进行公开的攻击。他們在兄弟党内組織反党的宗派集团，他們招兵买馬，在宗派斗争的肮脏旗帜下搜罗无原則的、腐化墮落的和向上爬的人物，以及托洛茨基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宗派主义分子。他們甚至把分裂和可耻的宗派斗争带进国际民主組織和运动，例如亚非团结运动。

他們把其主要攻击矛头针对着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共同体——国际工人运动和一切革命力量的最伟大成就。显而易见，中共领导人所追求的目的是用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号召来实现他們的领导要求。

他們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是无原則性、小資产階級民族主义、

冒险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混合物。这种政策已经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主要危险。

中共领导人发明了一种“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他们的分裂政策是“合乎规律的”。然而真理是什么呢？真理是，革命工人运动分裂的规律是不存在的。历史的经验倒是多次教导我们，那些叛变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实践、与革命运动分裂的力量迟早必然要合乎规律地遭到失败。

合乎规律的是，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的增长。合乎规律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在争取达到他们的共同目标的斗争中日益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合乎规律的是，共产党和工人党力量的增长，他们的一致和团结的加强。

我们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劳动人民很明白，工人阶级的分裂意味着什么样的不幸。但是，我们也特别清楚地知道团结会使力量增长十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由于他们的团结而能胜利地向前迈进。作为德国社会主义者团结的化身而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产生的德国统一社会党，过去维护，并且将永远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和团结。

这个团结的基础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学说及在此基础上制定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决议。为了这种团结和巩固这种团结起见，有必要彻底揭露和粉碎中共领导人的错误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我们的口号是：通过澄清来巩固团结！

## 二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许多劳动人民询问中共领导人反马克思主义观点及他们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原因，这是自然的。中国领导人的观点和分裂活动首先使我们不禁想起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包括我们党在内）在各个不同的斗争阶段所

进行的反对相似现象的斗争。这些现象的阶级根源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本性。

在中国，由于国家的性质仍然以农业为主，由于工人阶级的数量微小和党的社会组成，所以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影响特别强大。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观点在中共领导人的政策中逐渐地占了上风。

今天，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已经成了中共领导人政策的特有的标志和动力。除其他地方外，这表现在他们如何低估其他国家人民和兄弟党的成绩以及如何傲慢地过高地估价自己的成绩方面，表现在他们如何努力追求实力乃至原子弹上面，表现在他们如何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以及对其他人民发号施令上面。中共领导人已经与今天对他们的邻国挑起边界问题的人结成一伙；他们自己也把这样的问题加剧到甚至和印度共和国发生军事冲突的程度。然而应当特别予以谴责的是：他们对其他国家的人民的态度不是由阶级观点，而是由种族主义的观点决定的。

中国领导人的政策和态度也表明没有能力对当前的形势作科学的分析，没有能力根据形势制订革命的战略和战术，也没有能力以持续地、有组织地反对任何主观主义和小资产阶级自发性来实现这些战略战术。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面对着由武装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解放斗争和恢复国民经济向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过渡这一复杂任务时，这一点便突出地表现出来了。根据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决议，当时的任务是不要用一般的口号去指挥国家，而是把经济看作是新的主要的战场，并且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这就是中国当时所需要的，而且今天仍然需要的东西。在1956年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基本上符合这些客观规律的决议。但是，这些决议后来被“大跃进”政策用种种方式替换

了。因此，不断建設社会主义的任务加重了并复杂化了，致使勤劳、聪明的中国人民受到損失。

我們党在揭发中共领导人采取那种态度的原因的时候，也不能忽略这一事实，即他們維護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质格格不入的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現象。人人都明白，在理論上和實踐上消除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后果有助于发展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并且有助于建立一个排除行使权力方面的专橫行动的保証。只有沒有这种願望的人才会把自己奉为个人迷信的維護者。

### 三

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坚定地遵循着共产党和工人党总路线，在爭取确保和平的斗争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由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和优势以及它們的始終一貫的和平共处政策，防止了美国极端反动势力对社会主义的古巴进行袭击。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防止了一场热核战争的爆发，这已垂載于史册。正是这些力量爭取到了使大气层、外层空間和大海免受放射性污染的莫斯科条約。自簽訂莫斯科条約起，母亲們又可以希望她們的孩子們健康地成长，而她們的孩子們自己也将有健康的孩子。

今天，既然使用热核毁灭武器的战争会使整个整个民族的肉体生存受到威胁，战争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不能是解决国际爭端的手段。正因为这样，我們才說：因为德国人民的生存和幸福的明天取决于能不能維持住和平，所以建立两个德国之間的关系只有一种现实可能——这就是和平共处政策。

有利于我們民族利益的只有这一种政策。因此，我們党、政府和全国陣线一再采取主动，以便使两个德国之間、德意志民主



共和国和西柏林之間的关系正常化，并且实施理智和善良願望的政策。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历史使命，我国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贡献就是要通过社会主义的全面建設創造条件，以使和平和进步的力量在整个德国取得胜利。

那么，在和平共处問題上是怎样的呢？当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拒絕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总路线的和平共处政策时，他們的各种各样声明有什么用呢？他們以此来粗暴地违反各国人民的意志和客观的历史要求。他們虽然装扮成超革命派，但是实际上是坏的革命者，內心里很无信心。他們根本不相信，尽管存在着帝国主义，解放了的人民能够通过和平的劳动建設他們的新世界，并将在经济竞赛中战胜帝国主义。因此，他們企图把发动反对帝国主义的有限战争的政策强加于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而这会无法排除一場世界性原子灾难。

不需要有什么想像力也能設想，要是德国統一社会党追隨这样一些极左的、冒险主义的和反人道主义的观点，这对德意志民族会产生什么后果。实行这样一种政策就会給侵略成性的西德复仇主义者甚至提供后援。那就沒有可能确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长期在边界开放的条件下和平地建設社会主义了。要是我們跟隨中共的路线，那末这只能意味着慫恿西德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不断地进行更大的挑衅。这样一种政策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导致发生世界原子战争，使德意志民族肉体的存在处于危险之中。

所以，人們不禁要問：为什么中共领导人想隱瞞这一切呢？他們到底是在追求什么目的呢？他們是不是真正把世界革命的胜利放在心怀？他們是不是也許只在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和方式上迷惑不清呢？

回答是清楚的，他們为了追求自己狹隘的、为大国沙文主义所决定的利益，不惜拿国际革命的命运和各国人民的命运孤注一擲。他們拒絕逐步裁軍的态度和謀求获得原子彈的願望，也只有在这个观点下才能理解。他們声称，掌握核武器是一个国家主权的标准，是不作“一个二等国或三等国”的保证。这同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革命自然是毫不相干的。这甚至同安全的需要也沒有什么关系，因为苏联的核火箭力量保证着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他們那样做就是有意无意地帮助对原子武器提出要求的西德軍国主义者。

中共领导人建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資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把它們的斗争仅仅集中于美国帝国主义。这也是用超革命的声調陈述的，并用这一論点为“根据”：西德、法国、英国和日本帝国主义“只不过”是某种不重要的“中間地带”，是美国帝国主义的“影子”。这个“理論”对西德帝国主义的臭名远揚的侵略性置之不顾并低估它的危险性。然而中共领导人竟敢把这当作革命的政策提供給曾屡次身受德国帝国主义掠夺之害的德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从总是喜欢装扮成民族解放运动的辯护士的中共领导人的这一政策中也可以說明，为什么他們对于像西德这样一个“中間地带”帝国主义国家的新殖民主义政策严守沉默。

至于我們的党，它主张彻底地、最終地消灭敌視人类的殖民主义制度。它用以帮助今天还在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人民的，不是假革命的叫嚷和“中間地带”的理論，而是对任何新殖民主义进行不調和的斗争。它特別反对西德型的新殖民主义。民族解放运动的整个过程证明了社会主义国家共同体，尤其是苏联的经济和軍事力量，是对年轻的民族主义国家的正义事业和繁荣的最好的支持与援助。

#### 四

我們的黨致力於社會主義的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是確保人們有和平、社會安全、人的尊嚴和博愛、自由和正義、人道和生活愉快的社會制度。

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取得最終勝利以及共和國的國界有了可靠的防禦以後，社會的進步和人民生活水平便首先取決於如何利用社會主義的經濟法則來最大限度地提高勞動生產率。德國統一社會黨以制訂國民經濟的計劃和管理的新經濟體制，一脈相承地繼承着列寧主義的經濟政策。這個經濟政策的目的是促進科學技術的革命，提高產品質量和降低成本。我們黨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政府的這種經濟政策的目的是，發揮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一切優越性，以便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經濟競賽中作出民族的和國際的利益所要求作出的那一份貢獻。我們每一個人都知道：這是使我們大家的生活更加美好、更加富裕的政策。這是為勞動人民所理解的真正革命的政策。

但是，中共領導人卻恰恰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的這一卓有成效的政策說成是修正主義的政策，是一項所謂導致“資本主義復辟”的政策。

中國領導人從這種神話中到底希望得到些什麼呢？他們是不是期望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勞動人民離開多年來一直是有計劃地、連續不斷地執行的經濟政策呢？他們是不是期望我們按照他們的榜樣，不顧社會主義建設的客觀規律而從事“大躍進”的冒險呢？假如我們的黨曾經試圖随心所欲地跳越過必要的社會發展階段，那會怎麼樣呢？那我們就根本不會從1945年的廢墟中走出來！每一個理智的人從他個人的生活中知道，如果他

要建立并处理健康的家政，那他是不能作“大跃进”的。在国民经济的发展方面也只能提出存在着相应条件的那些目标。要是我们不考虑到这一点，我们的革命就无异于平均分配贫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在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心目中就会被贬低。

培养落后性以及原始的平均观念是同社会主义建设格格不入的。但是中国领导人所想的和所做的却是另一个样子。在他们的“大跃进”政策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发展倒退数年以后，他们——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观念相反——把社会主义下的贫困奉为一种美德。这样一种“有道德的社会主义”所能找到的拥护者是寥寥无几的，这当然是用不着证明的。难道工人阶级及其盟友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就是为了使面包篮子挂得更高吗？

不，他们走这条道路是为了通过发展生产力来比资本主义更好地满足自己的物质的和文化的需要。

但是，中共领导人却使人对这些自然而又崇高的社会主义思想发生怀疑。他们单调地一再說：谁要是系统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谁要是提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劳动的组织形式，谁要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谁要是发展劳动人民之间新的社会关系——谁要是犯了这一切“罪行”，那他就是在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当中“半途而废”，就是陷入“资产阶级的福利陶醉中”。不必是哲学家，人们也能理解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的概念是根本错误的。

那些断言按劳分配的正当原则会导致“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发展、导致损害社会主义经济”的人，怎么能把自己称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呢？弗·伊·列宁在苏维埃国家的早年曾经与所谓“左派共产党人”的相似的概念进行过斗争。他们把列宁的

经济政策称作是一种“右派布尔什维克的背离”，称作是“向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弗·伊·列宁在他那名著《論“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中彻底駁倒了“左派共产党人”的这种荒謬的观点，把他們駁得体无完肤。看来只有中共领导人至今还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我們党在1960年就已坚决拒絕了在我們共和国宣传中国“人民公社”的企图。要是我們离开逐渐发展合作社这条经过考验的道路而走上“人民公社”——“通向天堂的阶梯”的道路，那末我們的情况一定会恶化。

发揚社会主义的民主是社会主义建設的本质之一。但是在中国领导人的表述中却找不到一句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和发揚这种民主的必要性的話。而是更多地用軍事的和官僚主义的方法和发号施令来进行工作。自1964年初以来，甚至把人民解放軍的軍事形式和方法强加于社会生活的其他各方面。

我們党向来拒絕强使社会主义处于这样一种穷困境地，拒絕把行政管理的手段置于說服教育方法之上。我們的党今后也将不允許別人引导我們离开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工人阶级政党的学說，离开发揚党内民主，离开与人民各阶层的紧密联系。我們的党無論过去或現在都是为人民而存在的。因此它也是工人阶级和德国人民的真正的利益代表，是公认的经过考验的領袖。

## 五

为了在爭取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全体进步力量的团结一致是极重要的力量的源泉。因此，共产党和工人党（包括中共）在1957年和1960年會議上曾保证要以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結合的精神教育劳动人民。它們保证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任何

残余作坚决斗争。

我們党向来都是这样做的。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根除了民族主义、沙文主义、法西斯的种族煽动，这是它的最大的历史功績之一。今天全世界都了解我們共和国，今天各国人民尊重和重視我們共和国，因为它的人民所受的是国际团结、人道主义和人民間友誼的教育的教育。我国十五年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时候，那末这既有利于民族利益也有利于各国人民的利益。

那末，为什么中共领导人贯彻国际主义，不贯彻经过考验的、共同签订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而贯彻他们那具有大国沙文主义、民族自大和唯我独尊的领导要求的恶龙的形象的“二十五点总路线”呢？难道各国人民对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经验还不够惨痛嗎？无论如何，我国人民很了解，它们絕不會有助于发展人民間的友誼和加强和平。

中共领导人一方面断言是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忠实信徒，另一方面推行反苏政策，这二者如何能相容呢？中国人民所受的反苏精神的影响，是极共违反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因为苏联是国际工人运动的中心，是馬克思列宁主义与和平的堡垒。无论是今天、过去或任何时候，对苏联的态度是对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的試金石。

苏联已成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本世紀国际工人运动最大的成就的起点和基地。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可以忘記——无论何时——感謝苏联人民的英勇业绩嗎？他们可以忘記人民民主国家能够如此迅速地建立社会主义的基础，首先是由于他们能够利用苏共的无私的物质援助和丰富的经验嗎？他们可以忘記，无论过去或現在，首先正是苏联的经验和物质力量为各国人民确保着和平(卓有成效的社会主义建設的根本条件)嗎？他們

可以忘記，蘇共以蘇聯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為全人類鋪平通向這個目標的道路嗎？

我們的黨和我國人民時刻都沒有忘記這一點。以其他方式行動就是不僅不尊重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而且不尊重德國歷史的全部教訓。

我們黨也斷然拒絕脫離兄弟黨、各自“自力更生”去建設自己的社會主義這一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那樣做就會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經濟競賽中降低我們的速度，削弱社會主義國家共同體，並且最終使社會主義的勝利成為問題。社會主義同它的學說一樣不是民族性的，而是國際性的現象。

每一個真正的國際主義者都明白：社會主義的經濟力量在和平的經濟競賽中成長得越快，社會主義共同體就將越強有力地影響歷史的進程，就為更得力地支持那些數百年來曾是帝國主義剝削和奴役對象的人民創造更多的條件。因此，我們的黨將堅定不移地對發展和加強社會主義國家共同體的合作作出貢獻，因為這再好不過地既符合民族利益也符合國際利益。

## 六

長期以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勞動人民通過親密的友誼和反對帝國主義的共同鬥爭的光榮傳統的紐帶同中國人民連結在一起。

我們當中有許多人還清楚地記得這樣的口號：“不許干涉中國！”我國人民的革命力量曾經在這個口號下支持中國工人和農民的解放鬥爭。他們記得自己在这个時期為在飢餓和罷工中的中國工人組織了精神上和物質上的援助，他們記得恩斯特·台爾曼起而支持1927年廣州公社的行動，他們記得德國共產黨的反对德國帝國主義供給武器鎮壓中國革命的大會。他們記得瓦

尔特·烏布利希在国会上所做的揭露帝国主义反华战争的演说。

在1945年以后怎么样呢？我们党始终不渝地反对反动的波恩政治家从背后破坏中国人民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政权的斗争的一切企图。它揭露了阿登纳沙文主义的反华的攻讦。恰恰是在这些年，中国人民和德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更加增长，更加巩固了。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1949年几乎同时建立的时候，这种友谊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忠于无产阶级的这些传统来建立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这曾是一种对我们两国人民互利的友好的兄弟般援助和合作的关系。在中共领导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意见分歧出现以后，我们党仍然始终不渝地继续执行这个政策。

可是，中国领导人却把意识形态上的意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去。他们有意识地致力于恶化两国间的关系。例如减少贸易和中断重要原料的供应给我们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可是，中国领导人却认为，与此同时加强他们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是适宜的。

尽管中共领导人采取这种令人忧虑的态度，我们党仍忠于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始终不渝地坚持同中国人民友好的政策。它不仅努力维护，而且努力促进这种国家关系。德国统一社会党表示希望，至少在这个问题上理智将在中国领导人那里取得胜利。

## 七

由于中国领导人的分裂活动，我们党的党员、我们共和国的公民都怀着正当的忧虑心情问道：事态将怎样发展呢？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认为，重新召开共产党和工人



党的会议已经成为必要了。因此，我們支持苏共的建議：在今年5月进行苏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代表团的下一次会谈；在6月和7月召开那些曾参加筹备1960年莫斯科会议的起草委员会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会议；在1964年秋举行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会议。

由于我們所作的一切考虑，由于充分意识到我們的責任，我們声明：取得胜利的将是共产党和工人党所通过的总路线，是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生动的正在改造着世界的思想，而不是中国领导人的反馬克思主义的教条和作法。过去的丰富经验所能說明的正是这一点，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曾越过了所有分裂主义者和宗派制造者而前进的革命的工人运动的历史說明了这一点。这是一个历史規律！因为保卫和平和社会进步符合所有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共同体的成就以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所有国家劳动人民的思想 and 行动正在发生越来越巨大的影响。苏联人民在以尼·謝·赫魯晓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中央的领导下，正在实现建設共产主义的綱領。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在他們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下正在爭取获得新的重大成就。我們通过实现经济任务、全面加强我們的工农国家、实现全面建設社会主义的綱領，也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致和团结以及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和团结做出我們的一份贡献。誰能够怀疑我們的一切斗争和工作以及人民群众的受科学的計划引导的創造力量将进一步增加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因为我們的事业是正义的，因为它是美好的和正确的，因此它必将胜利！

德国統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

1964年4月14日于柏林

（譯自1964年4月15日民主德国《新德意志报》）

## 和平、社会主义和北京的 錯誤学說(节譯)

埃伯哈德·海因里希

近日来，世界輿論又在討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中共领导人之間的爭論。有些同志认为这是件最令人憤慨的事。这的确是令人遺憾的，但却是現在完全不可避免的。这有許多原因。

首先，因为中共领导人不仅沒有停止，反而加剧了他們的公开攻击，并且正要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分裂出去。

其次，自从社会主义成为一个体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成了本地球上历来存在过的最强大的全球性政治力量（有九十多个党，共約四千多万党员）以来，这个运动的問題便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問題，不仅引起党员的关注，而且引起整个民族、整个国家和整个大陆的关注。

自从那时（即1957年莫斯科會議。——譯者）以来，五年多的历史实践既从正面又从反面证明了所走的道路的正确性。凡是在莫斯科協議的基础上把新的认识創造性地运用于本国条件下的党，都順利地前进了。相反，那些离开了共同制定的綱領的党，則沒有取得什么成就，甚至遭到严重的挫折。这首先是指中共的領導，他們坚持教条主义的和宗派主义的立場，离开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如今企图用他們自己的总路线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相对抗。

使得同中国领导人的爭論成为不可避免的，还有另一个，而且是最重要的因素。爭論在工人运动中曾一再出現过，而且总

是在产生了新情况、創造出新条件和可能性,而这些新条件和可能性尚未被大家同时地、及时地理解和认识的时候出現的。在这些爭論中,無論它是多么令人痛切,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总是占上风的,这一次也沒有理由不是这样。

可以理解,同样在我国,人們对意見分歧也感到忧虑。一种不小的忧虑是,他們恰恰看到近来甚至波恩的极端主义分子在攻击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时也在引用中国领导人的主张。这不就是說不只是中国领导人方面在引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經典著作嗎?

如果要就此作出一个明确的判断的話,必須从何出发呢?判断任何一个共产党的政策的出发点,除了是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不朽的学說以外,只能是由包括中国党在內的所有的党在1957年和1960年共同制定并签了字的莫斯科會議的決議以及历史的经验。那么,我們就来根据最近的決議,即1960年11月莫斯科声明在两个基本問題——和平和社会主义建設問題——上对照一下我們自己的政策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口号吧:

德国統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各项決議对我們的政策是有效的。这些決議是否符合莫斯科声明的路线呢?

每个人都知道,我們在实现党代会的決議方面取得了不坏的结果。我們促使波恩不得不参加莫斯科条約;我們违背波恩的意願,同它进行了关于德国的和平政策的任务的交談;在我們的創議下签定了关于柏林通行证的协定,从而证明了在两个世界体系銜接的地方,在德国,也有可能有成效地取得緩和和进行談判;我們扩大了国际关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为和平的德国国家的威望显著地提高了。

但是,按中国领导人的观点,这一切都不存在,甚至是錯誤的,是投降主义,是胆小鬼,是修正主义,是資本主义,是背叛。

按照中国领导人的观点，我們把和平問題“絕對化”了；最重要的問題不是和平而是革命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最近，受北京鼓舞的一家刊物写道：“革命战争是世界历史的火車头”。不允許在和平共处的名义下同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任何协定。停止試驗原子武器的协定是个“騙局”。

如果我們执行了这种政策将会怎样呢？那我們就不应为用条約形式确保两个德国的和平关系而努力，而必須把战争“解放西德”而不是把和平共处写到我們的旗帜上去。我們的主要任务就必然不是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发展社会主义社会，而是以推翻西德帝国主义者为目标の軍事武装了。

按照中国领导人的观点，我們也决不許参加莫斯科条約。……如果我們不参加，波恩今天就可能同法国一起不受国际义务的限制采取自己的原子武装方針了。

中国领导人会不会把这一点看作是一个成功呢？也許看做是对他們所制造的“第二中間地带”的一个证明吧。这是一个新的“世界范畴”，列入这一范畴的有英国、法国、西德和日本这样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因为它们們受美国的“奴役”，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的同盟者。遵照这种理論行事，我們就会陷入实际上必須支持西德极端分子这一不怎么令人羡慕的境地。

波恩和美国之間有沒有分歧呢？有，过去有，現在也有。譬如，西德极端分子对于美国沒有更快地和无条件地把它的核武器交給波恩支配这一点很不滿。我們是否应当由于这种“反美主义”就夸奖和支持西德极端分子呢？

极端分子过去和現在都不滿——而且他們一再談論——美国沒有对反法西斯防御墙采用暴力。我們是不是应当由于这种“反美主义”就夸奖和支持波恩极端分子呢？

不，我們坚持莫斯科声明所闡明的真理：波恩是“欧洲和平

共处、裁軍和消除紧张局势的主要敌人”；我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反对西德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負有特別重大的任务和責任。我們必須使西德軍国主义者不能从德意志的土地上发动新的战争。这是我們的义务，而不管他們是以反美主义、反苏主义或是别的什么方式来证明他們的意图。

我們的党代表大会使人毫不怀疑，它认为加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是在德国胜利地执行确保和平的政策的前提。因此，它通过了在最现代化的科学和技术方法的基础上迅速发展国民经济的远景計劃，并且为国民经济計劃和管理的新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

与此相反，中国领导人不仅拒絕了社会主义国家兄弟般的合作，而且他們也否认社会主义的按劳付酬原則。他們猛烈地攻击不断提高生活水平的原則和运用物质利益的做法。这会导致“资产階級化”，导致“追求个人利益”和导致“資本主义因素的大規模增长”，如果不断提高生活水平的努力会导致资产階級化，那么避免这一危险的合乎邏輯的办法就是，用不断降低生活水平到普遍的“无产階級化”的最低生存限度来代替我們的政策。于是，工人階級到底为什么要为以社会主义改造資本主义社会而进行斗争，当然这就沒有下文了。

所謂运用物质利益原則的作法会产生“資本主义的复辟”的論断是荒謬透頂的。我們不否认，由于运用这个原則，在我們这里有成千上万的人，甚至成百万的人拥有电视機、洗衣机、摩托車、汽車、現代化成套房間，甚至拥有私人住宅。但是，他們因此就成了資本家嗎？他們剝削誰呢？在我們这里，奖金或者高額劳动报酬在什么地方轉变成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即轉变成資本呢？这样的事实無論在苏联还是在我們的社会主义工农国家都是沒有的。

雖然我們在1945年是一貧如洗的，但是由於始終不渝地運用按勞取酬和物資利益原則，我們今天已經是世界上十大主要工業國家之一。我們的國家過去沒有，而且今天仍然沒有象（比如說）中華人民共和國那樣豐富的礦藏和眾多的勞動力的哪怕一小部分。在1945年我們只擁有我國工人、技術員和科學家的工作經驗。我們當時還沒有重工業。大多數生產設備被破壞了，農業幾乎沒有牲畜，生活狀況是災難性的；在1946年，我國死去的人比生下來的人多一倍。當時嬰兒的死亡率遠遠高於今天的印度和智利。

我們沒有忘記那個歲月，因此知道，一切事情開始總是困難的。當然，我們當時很願意來一個“大躍進”，誰不願意這樣做呢？但是，“條件不是那樣”。因此，在現實的基礎上逐步地向前邁進是更加聰明的。

（譯自1964年4月19日民主德國《新德意志報》）

## 列宁的遺訓和德国統一社会党的政策(节譯)

——赫尔曼·馬特恩在列宁誕辰九十四周年紀念大会上的講話

列宁教导說，“馬克思主义要求我們对各个階級的相互关系以及每一历史时期的具体特点进行精密的客观上可以审核的分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就是根据这些原則在1957年和1960年的會議上确定的。这一总路线已为事态的发展光輝地证实了。

但是，如果中共領導停止反对这一总路线，停止分裂活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成就还会更大些。中国领导人特別企图毒化社会主义国家与苏联的关系。针对着妄图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联之間散布不和的可鄙的努力，赫尔曼·馬特恩說：

德国木匠瓦尔特·烏布利希和苏联鉗工尼基塔·謝尔盖耶維奇·赫魯晓夫之間的友誼、我們德国統一社会党和光荣的列宁党的友誼、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联的友誼是任何东西都不能动搖的。我們坚定地沿着列宁指出的道路共同前进。

馬特恩同志随后譴責了中国领导人的这一企图：使各国人民离开当代最迫切的問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同时以他們的“中間地带”的“理論”否认由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侵略性战争集团，特别是西德帝国主义所产生的危險。

赫尔曼·馬特恩继续說：

## 创造性地运用列宁的革命理論

同志們：

列宁之所以证明自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事業的天才繼承者，正是因为他正确地认识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規律，并且懂得以这个客观規律和对階級斗争的条件的具体分析作为党的战略和策略的出发点。他指出，即使在革命形势的条件下也不允許把无产階級的斗争形式变成僵硬的公式。

例如列宁在准备和实现十月革命的实践中就卓越地显示了这种斗争的灵活性。从1917年4月至9月，列宁向俄国群众指出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同中国领导人所謂的这个指示只适用于1917年6月以前的断語相反，列宁在9月底还写道，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列宁在1917年9月26日和27日所写的“革命的任务”一文中說：

“苏維埃掌握全部政权，现在还能够（看来这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保证革命的和平发展，保证人民和平地选举自己的代表，保证各政党在苏維埃内部进行和平斗争并通过实践来考验它們的綱領，保证政权由一个政党和平地轉到另一个政党手里。

“如果错过这个机会，那末从4月20日的运动起到科尔尼洛夫的叛乱时止的革命发展的全部进程已经表明，在資产階級和无产階級之間必然发生最尖銳的国内战争。”<sup>①</sup>

在这篇文章发表后一个月，列宁根据改变了的条件，在对階級力量又进行了具体分析之后认识到，现在武装起义、暴力革命变为絕對必要的了。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0頁。



同志們！我所以这样詳細地談到通过具体分析而产生的列宁的两个結論，是为了表明，在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家列宁与中共領導中的教条主义者之間存在着天淵之別。如果我們把中国領導人在最近几个月內关于革命的絮絮叨叨的声明概括一下的話，那末它的彻底背弃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論的本质就很清楚了。

在中共領導人最近的声明中，特別在他們的所謂八評中，他們完全摘下了假面具。他們先前还虛伪地声称忠于1957年和1960年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文件，現在則放弃了这种伪装。他們公开要求修正八十一个党集体制定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

他們把主要攻击矛头針对着共中关于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不同形式的論断。同时他們用恶劣的方式方法污蔑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領導人，特別是忠实的列宁主义者尼·謝·赫魯晓夫。他們断章取义地从列宁的著作和苏共的文件中摘用一些引語，企图在列宁和現在的以赫魯晓夫为首的苏共領導之間制造矛盾。

## 理論外衣

中共領導人竟致恶毒地硬說赫魯晓夫同志和馬克思主义政党的其他領導人超过了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因為他們是在共同制定的文件的基础上貫徹自己的政策。关于我們党自己，恐怕可以說它同傳統的改良主义以及同今天的社会民主党內的新改良主义的斗争中，积累了足够的实践经验来认识这种比較是荒唐的。既然人們不能假定这种誣蔑是基于对历史和馬克思主义的无知，那末只能得出这个結論，这就是为中国領導人的实际的分裂活动披上“理論”的外衣。

正如創造性地发展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論是同克服个人迷信連系在一起一样,在中国共产党內坚持个人迷信的做法,必然是同思想僵化以及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創造性的理論和实践活动所取得的結果連系在一起的。

在共产党和工人党的经验宝庫中也包含了我們党在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中所取得的成果。

德国統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指出,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垄断資本的侵略政策和德国人民的和平利益之間的矛盾,已經通过反法西斯的民主改革得到解决。从而創造了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平过渡的条件。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道路

如果中国领导人断言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和不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例子,那末,1945年胜利的苏軍在国会大厦上空升起紅旗就已经意味着在德国东部开始社会主义革命了。其实,苏联軍队战胜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只是使德国帝国主义在軍事上受到打击而已。彻底粉碎资产階級国家机器、剝夺垄断資本和大地主的权力,是在1945年以后的若干年中,经过激烈的階級斗争和群众革命行动才实现的,然而是用和平和民主的手段实现的。

从軍事上粉碎德国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意味着德国帝国主义的严重削弱,同时有利于工人階級和一切进步力量的斗争。但是,在德国的一个部分进行人民民主革命的决定性前提还在于,站在这个革命过程最前列的是具有明确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綱領的德国工人階級統一的党,它善于把工人和农民以及其他全体进步民主力量結成巩固的联盟,它善于根除帝国主义和軍国主义。

中国领导人在他們的誹謗性的文章中,罵所有承认革命的

和平过程的党是修正主义的党，是背离了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和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党。如果按照把历史事实抛諸脑后的中国领导人的邏輯，那末，德国統一社会党就是用“修正主义的綱領，用对无产阶级的专政的背叛”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取得胜利的了。

众所周知，我們党早在1946年在《原則和目标》中就已经宣告它謀求革命的和平道路，只要资产阶级不离开民主的立脚地的話。我們党的这个目标完全符合列宁的观点。列宁曾說，革命的和平发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虽然是历史上极其罕見的，但却是极有价值的可能性。<sup>①</sup>毫无疑问，我們党始終一貫地走革命的和平道路，从而把列宁所說的有价值的可能性变成了现实。因而，我們党为国际工人运动的理論和实践作出了一个重要的贡献。

### 夺取政权就是革命行动

革命行动就是：夺取政权和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誰能怀疑德国統一社会党充分地完成了这一革命义务呢？列宁十分正确地談到领导起义的艺术。如果我们說，用和平手段实现爭取社会主义制度的阶级斗争所需要的艺术并不亚于起义时，我們正是按照列宁的精神說的。

### 激烈的阶级斗争

只有头脑简单、对历史事实置若罔聞的人才会上断言，不经过

---

① 《列宁全集》第25卷，德文版第315頁。

階級鬥爭、不對社會主義的敵人實行強制就可以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

北京的新托洛茨基主義者以為，德國壟斷資產階級在1946年向我們交出了他們的康采恩和企業是自願的嗎？不，我們是依靠人民群眾用暴力粉碎他們的經濟力量的。

中國領導人認為容克地主把他們的土地分配給少地的農民和移民是出自本意嗎？不，我們是從他們的莊園中把他們驅逐出去而消除了几世紀來的邪惡。難道建設一個今天已在世界上占第十位的現代化工業和建立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鬥爭不是不斷伴隨著尖銳的階級鬥爭的嗎？這一鬥爭由於西德極端分子的特別的侵略性而急劇地尖銳化起來，他們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殘余，過去和現在都在濫用西柏林作為前線城市。

極端分子為通過挑釁和使氣氛白熱化促使我們脫離旨在維護和平的政策作的努力確實不少。我們的以清醒而有原則、堅定而又靈活為特徵的措施，往往足以使作垂死冒險的政治家們頭腦清醒起來，並且迫使他們退於守勢。

如果我們遵循中國領導人作為最高的革命政策所宣布的“以牙還牙”和“針鋒相對”的冒險主義的理論的話，今天在歐洲會出現怎樣的狀況呢？

中國領導人在他們的小冊子里大叫大嚷地宣布暴力革命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普遍規律，這是他們近來經常使用的抹殺爭論的本質的一個花招。正如爭論不在於社會主義革命是否必要或是否可能，而在於過渡的具體形式一樣，這個所謂的普遍規律也是這樣的問題。

## 恶意的誹謗

中国领导人需要这样的辞句，一方面是为了把革命的和平道路誹謗为非革命的道路。

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的普遍规律的目的，在于使暴力理想化。中共领导人把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降低成单纯的暴力，这就同誹謗列宁的革命理论的资产阶级分子汇合在一起了。反共产主义就是用这种“暴力理论”证明列宁主义的非人道性，并把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歪曲成关于战争的政治学说。

中国领导人在他们的第八篇评论中支持这种歪曲列宁的革命理论的行动。他们明确地强调说，他们出于策略的考虑愿意谈论社会主义革命的和平道路，但这不应当是总的方向。

## 不同的行使权力的制度

列宁反对将暴力绝对化，他强调，“强力能够对付那些想要复辟的人。强力的作用也仅限于此，而以后起作用的则是影响和示范。必须在实际中用例子来表明共产主义的意义。”<sup>①</sup>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决不只表现为暴力的运用，而是必须把它理解作无产阶级行使权力的一整套制度。除对被推翻的阶级运用暴力以外，无产阶级行使权力也包括诸如说服教育、组织社会主义建设、发挥榜样的作用等等这样一些形式。

把行使权力的这些非暴力形式发展成一种体系并在生活中胜利地予以实现，这是我们的工作的创造性方面之一。

---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16页。

## 完善社会主义民主

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创造性的进一步发展，在目前就表现在使社会主义民主臻于完善、巩固人民的政治道义一致和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多种形式上。

在中国领导人迄今发表的八篇包罗万象的评论中民主问题没有起什么作用，这绝不是偶然的。而且，由于颂扬暴力，也就没有给民主问题留下余地。

如果从无产阶级专政的现实内容、从阶级社会中民主的最高形式出发，考虑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无一例外地都必须创造性地运用行使权力的一切形式，那么就可以看出，把无产阶级专政缩减到单纯的暴力是多么荒谬了。

### 我们必须公开讲

同志们！像今天这样的纪念日使得我们共产党人要问，我们是怎样完成列宁的遗训的。列宁的遗训包括：他要求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斗争，他要求不使“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销声匿迹。

我们感到沉痛的是，在这样的一个日子不得不和另一个共产党的领导进行激烈的争论。但是，为了列宁的遗嘱，为了全体爱好和平的人们对我们共产党人所寄予的期望，我们不得不公开讲话。

从我们党的历史中我们知道，只有不屈不挠地进行反对破坏我们学说的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斗争，才能够取胜。

因此，我们完全支持苏联共产党及其由精力充沛、热情、具

有堅定原則性的赫魯曉夫同志所領導的中央委員會。

## 苏联共产党的成就——我們力量的源泉

苏联和他的共产党的成就，是我們的力量的源泉之一。

我們时代的主要內容是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基本的規律。但是，这一过渡的快慢，是由我們双手創造的事业、我們的实践能力、我們的創造精神來决定的。同时，我們相信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兄弟般的团結，相信我們的世界觀的威力以及我們的力量。

那些要結束人剝制人的制度、實現人类幸福的梦想、給人类帶來持久和平的力量，將不允許在自己的队伍里出現妨碍他們胜利前进的障碍。因此，我們党支持苏共中央关于召开兄弟党會議就目前国际工人运动問題广泛交換意見的建議。

（譯自1964年4月23日民主德國《新德意志報》）

## 中国对国际工人运动史的看法

阿諾德·賴斯貝格

德国統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攻击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表明态度时指出，中国领导人否认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問題，其中包括“歪曲国际工人运动史”。<sup>①</sup>

实际上，中国领导人越来越广泛地进行历史考察，以便为他们反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服务。在他们看来，国际工人运动史是赋予他们的分裂活动以“历史功績”的最好园地。他们认为，这里能最通行无阻地发展他们的非馬克思主义的、伪科学的折衷主义。他们不是对事实作全面客观的分析，而只是从历史方面随便挑选出一些片断的引文来加以評注。这里，他们首先认为，通过表面的牛头不对馬嘴的类比，一定能装出这副样子：他们现在的分裂活动是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伟大事业的直接继续。

早在1963年发表的似乎純“科学”的关于国际工人运动史的著作，就是用这种观点写成的。郑言实在1963年第4、5两期北京《紅旗》杂志上連續发表的题为《列宁反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斗争》一文就是一个例子。郑只限于选录列宁的引文，按年代順序編排起来并加以評注。引文本身是正确的，它的历史的真实內容是无可爭辯的。但是，編者把引文和評注汇合而成的事实輯录却是如此片面，每一事件发生的具体历史情况是如此严

<sup>①</sup> 《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載1964年4月4日民主德国《新德意志报》。



重地孤立起来，以致必然使人产生这种印象（北京《红旗》杂志没有说出的观点亦是如此），现在对待这些问题也象在五十年前一样，当时对这种问题的回答也能说明现在的情况。这里，人们必然会用列宁那样的话发问：“我们能够说他只是在闹着玩吗？说他在进行政治欺骗是不是更正确些呢？”<sup>①</sup>

这种方法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考察的方法论原则相对立的。差不多在五十年前，列宁就用下面这段话指责过这种非科学的方法：“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选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sup>②</sup>列宁认为，唯一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考察方法，“就必须毫无例外地掌握与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事实的全部总和，而不是抽取个别的事实，否则就必然会发生怀疑，怀疑那些事实是随便挑选出来的，怀疑可能是为了替卑鄙的勾当作辩护而以‘主观’臆造的东西来代替全部历史现象的客观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这种怀疑是完全合理的。”<sup>③</sup>

这一论断，字字句句都击中了中国理论家方法的要害。

如果说郑言实的文章还没有公开说出“替卑鄙的勾当作辩护”，那末，现在中国领导人在他们反对苏联共产党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论战性的文章里就不再隐瞒，他们援引国际工人运

---

① 列宁：《统计学和社会学》，载《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79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279—280页。

动史是为了替他们分裂的“卑鄙勾当”作“辩护”。“不妨回顾一下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sup>①</sup>这就是他们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合写的文章《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毫无顾忌地公开承认的目的。

中国领导人虽然在那里声称，他们“为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sup>②</sup>，但是，这种自诩的价值如何，已由它与恩格斯在1873年所说的反对“统一的呼叫”这句话相联系而说明了。因此，他们已经想使恩格斯成为他们分裂活动的主要证明人。其实，他们历史考察的主要途径正在于此。他们歪曲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反对一切敌对思想意识的斗争，好借此不把它们说成本来的样子，即为了无产阶级的团结、为了他们进行共同斗争的队伍的纯洁而斗争，而把它们说成是一个不断的分裂的序列。他们试图把为在革命基础上的团结而斗争的先锋，说成是象他们自己那样的分裂主义者。他们“回顾历史”也包含这种用意。

中国领导人从国际工人运动史中引出的最重要的理论，他们自己表述在《经验和教训》这一部分里。在那里，他们写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说明了什么呢？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表明，国际工人运动，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总是一分为二。”<sup>③</sup>

这种怪诞的论断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的，是有意识地滥用哲学概念。

---

① 《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以下简称《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页。

② 同上书第1页。

③ 同上书第10页。

馬克思主义从未承认过自行分裂的規律。实际上，分裂工人階級是階級敌人干的事情，它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在工人运动中影响的結果。工人运动的客观趋向則相反，它通过克服工人階級中的資產階級影响为团結而斗争。列宁曾一再強調，分裂工人階級是資產階級干的事情：“資產階級破坏工人运动的另一种方法是分化工人，瓦解工人队伍，收买无产階級的个别代表或个别集团，把他們拉到資產階級方面去。”<sup>①</sup> 不仅右傾机会主义者，而且“左”傾宗派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也同样地为資產階級进行这种分裂服务。

中国领导人把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国际工人階級最伟大的团結运动的旗帜歪曲成分裂的旗帜。他們不仅通过上面所引的“理論”否定我們经典作家活动的团結方面，而且他們还试图对他們的分裂活动进行“哲学的”論证，从而把它提高到“辯证的規律”的地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們提出了反列宁主义的論点：“团結，经过斗争甚至分裂，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結，这就是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辯证法。”<sup>②</sup> 他們毫不怀疑地把它看作是自己的历史任务，并通过这种冒充的辯证法促进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灭。因此，他們就同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处于尖銳的对立之中。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认为，国际工人运动史不是通过继续不断的分裂决定的，而是通过为在更高阶段上的团結而进行的斗争决定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下进行他們的終身事业的。列宁还在1904年反对孟什維克分裂主义者的斗争中就已写道：“无产階級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

---

① 列宁：《資產階級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載《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58頁。

② 《七評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第11頁。

組織而外，沒有別的武器。無產階級既然被資產階級世界中居于統治地位的無政府的競爭所分散，既然被那種為資本的強迫勞動所壓抑，既然經常被拋到赤貧、粗野和退化的‘底層’，無產階級所以能夠成為而且必然會成為不可戰勝的力量，就是因為它根據馬克思主義原則形成的思想統一是用組織的物質統一來鞏固的，這個組織把千百萬勞動者團結成工人階級的大軍。”<sup>①</sup>

如果考察一下中國歷史學家對國際工人運動史各個事件所作的論述，那末，就能明顯地看出二種企圖：第一、總是把分裂的因素提到首位，而把團結的原則排之于後，有時也在这里或那里點綴一些關於無產階級團結的意義的評論；第二、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反對右傾和左傾機會主義、反對修正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堅持不渝的鬥爭，片面地歪曲成只是反對右的修正主義的鬥爭，抹殺了反對宗派主義和教條主義的鬥爭。

如果說中國領導人是以“共產主義者同盟”和《共產黨宣言》開始他們的历史論述的，那末，他們這里一個字也沒有提及，馬克思和恩格斯是怎樣同小資產階級冒險主義和“提出想用以限制無產階級運動的宗派的原則”<sup>②</sup>的宗派主義者進行鬥爭的。他們避而不談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請求：“共產黨人到處都支持一切旨在反對現存社會政治制度的革命運動”，“到處都努力爭取世界各國民主主義政黨之間的團結和協議。”<sup>③</sup>

中國歷史學家對第一國際歷史感興趣的只是反對巴枯寧主

---

① 列寧：《進一步，退兩步》，載《列寧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10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德文版第474頁。

③ 同上書第493頁。

义者和其他反马克思主义派别的斗争，但是，他们却抹杀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际总委员会中所作的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这种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是为了使国际运动团结起来并帮助他们在共同的行动中培养社会主义的阶级觉悟。他们抹杀了马克思在顽强的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时，有意识地把国际的最初的一些纲领局限于这一点：“容许工人直接的协商与共同的行动，而在阶级斗争和组织工人成为一个阶级的需要上则给予直接的培养和推动。”<sup>①</sup>

如果说中国领导人还谈及反对巴枯宁主义分裂主义者的斗争，那末，他们还是抹杀了（并且不是偶然地）巴枯宁主义的宗派主义和变节的内容，好借此隐蔽它与他们自己观点的明显的血缘关系。让我们看一看马克思为什么批评巴枯宁，“他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社会革命，只知道关于社会革命的政治词句。在他看来，社会革命的经济条件是不存在的。……他的社会革命的基础是意志，而不是经济条件。”<sup>②</sup> 中国领导人断言，“今天，占全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众，包括那些暂时还没有觉悟但终究会觉悟起来的人们，都是要革命的。”<sup>③</sup> 这时候，他们确实差不多一字也没有提及巴枯宁在差不多一百年前宣传的东西，但是，这里我们明显地看到巴枯宁主义式地用幻想代替真实的估计。

在论述德国工人运动史时，他们也只是看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腐败风气”，他们“同机会主义妥协”。<sup>④</sup> 在他们看来，就没有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它“使许多工人在他

---

① 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页。

② 马克思：《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95—696页。

③ 《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第39页。

④ 同上书第4—5页。

們革命的旗帜下團結起来”，并且“在反对社会主义者特別法的斗争中，首先发展成为国际工人运动中实行馬克思主义的最著名的、影响最大的党”<sup>①</sup>。他們只看到拉薩尔分子和伯恩斯坦分子，而看不到奥古斯特·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其他馬克思主义者。如果說他們还提到哥达联盟，那末，他們也只是援引馬克思反对哥达纲领草案中抛弃馬克思主义原則的正当的憤怒字眼；然而，他們又描出一幅歪曲了的图画，因为这里抹杀了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德国工人运动的團結而作的斗争。这样，他們便吹起了資产階級和机会主义者誹謗馬克思主义的号角。恩格斯还是在1891年就对这种态度提出了抗議，他甚至有意识地宣布，“糾正几个不正确的地方”，例如馬克思和他好像“不願意合并”。<sup>②</sup>因此，当我們的党按照我們经典作家的意見，证明哥达联盟虽然在党纲中有缺点，但仍不失为“一个巨大的成績”<sup>③</sup>时，它是正确的，尽管这与中国历史学家相对立。

对中国领导人說来，馬克思、恩格斯和他們的学生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反对左的喜爱空談“革命”詞句的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是不存在的。既然中国历史学家爱公开地以引文作論证，那末，对他們說来，证明这一点是不乏其引文的；列宁从不孤立地談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右傾的斗争，而还总是強調反对“左”傾空談的斗争。比如，列宁在他对馬克思的研究中写道：“当1848—1849年革命时代已經結束时，馬克思便反对任何玩弄革命的儿戏（反对沙佩尔和維利希一流人物），要人們善于在似乎是‘和平地’准备着新革命的那个新阶段进行工作。”<sup>④</sup>在1878—1879年，在社

① 《德国工人运动史纲》，柏林1963年德文版第13頁。

②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91年2月23日）》，載《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79頁。

③ 《德国工人运动史纲》第60頁。

会主义者特别法頒布以后，正像列宁所强調的，馬克思“严厉地”斥責了“莫斯特的‘革命空談’”。<sup>④</sup> 列宁称莫斯特之流是“一些蠱惑人心的人……(他們)一味地贊美群众的‘有力的拳头’，煽动他們……去从事轻浮的‘革命’行动，散播对于坚定刚毅的領袖的不信任。”<sup>⑤</sup>

恩格斯在1890年談到德国党内小資产階級半无政府主义的另一变种即“青年派”时写道：他們“冒死地‘夺取障碍’……但是，当把它从想象变成现实时，就能把甚至是最强有力的拥有几百万党员的党葬送在整个敌对世界的洋洋得意的胜利笑声中”<sup>⑥</sup>。

如果要問，这种故意抹杀馬克思主义整整一个方面的政治用意何在，那末，只能有一个回答：中国领导人之所以抹杀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反对小資产階級革命狂热的斗争，是因为他們自己就是主张这种冒险政策的。难道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反对“毫无顾忌地抛开党的斗争的一切实际条件”<sup>⑦</sup>的每一句話，不都是对中国领导人的片面的历史論述和他們的分裂政策泼冷水嗎？

中国关于第二国际史的論述，是列宁所斥責的那个一般的和只是建筑在例证上考察的典型，这种考察也許不能证明任何东西。中国历史学家忽略了，第二国际也是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然而，他們却只是把它当作一个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

---

④ 列宁：《卡尔·馬克思》，載《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7頁。

⑤ 同上书第58頁。

⑥ 列宁：《怎么办？》，載《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32頁。

⑦ 恩格斯：《答〈薩克森工人报〉編輯部》，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德文版第69頁。

⑧ 同上。

的组织加以对待。因此，中国领导人就同列宁处于对立之中，列宁在1914年同第二国际领导人的叛变行为进行顽强的斗争时写道：“第二国际完成了它的有益的准备工作，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在最残酷的资本主义奴隶制和资本主义最迅速发展的漫长的‘和平’时代里把无产阶级群众初步组织起来。”<sup>①</sup> 列宁曾一再提到这种估计，甚至是在第三国际建立之后，然而中国历史学家对此却避而不谈。只是在一个地方他们才写道：第三国际“继承了第二国际的工作成果”，而又不让读者了解，这种成果何在。

中国领导人对列宁在俄国和国际舞台上进行的斗争，作了同样带有倾向性的论述。他们完全抹杀了列宁反对左的宗派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的光辉斗争。他们对列宁反对“社会革命党人”、“抵制派”、“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其他左倾激进团体的斗争只字不提。列宁在强调指出机会主义是工人运动内布尔什维主义的主要敌人之后，还补充指出：“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作长期斗争中成长、形成和得到锻炼的，关于这一点，国外知道的还很不够。这种革命狂热有些象无政府主义……1903年布尔什维主义诞生时，便继承了同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的（或者是倾向无政府主义的）革命狂热作无情斗争的传统；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向来有这种传统。”<sup>②</sup>

中国报纸在他们的非列宁主义的、片面的考察中走的如此之远，以致他们只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社会沙文主义分裂国际工人运动，而对德国左派和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反对帝国主义

---

① 列宁：《社会主义国际的状况和任务》，载《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3页。

②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载《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3—15页。



战争并争取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的英勇斗争却只字不提。但是，既然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工人运动的真正历史了解得很清楚，那就不能认为，他们是偶然地忽略了这一事实，或者他们的片面性是出于无知。不，这是有一个完全确定的原因和一个完全确定的目的的。原因在于：“列宁针对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代表人物、或者象他所讽刺的小资产阶级‘革命狂热’的每一句话，都正打中了中共领导目前的政治思想概念和方针。”<sup>①</sup>

中国领导人的思想的出发点是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因而他们对列宁在第三国际中反对民族布尔什维主义、反对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KAPD)的冒险主义、反对“极左派”的“攻击中派的游戏”的斗争只字不提，他们对列宁反对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出现的“夸大的危险”的斗争也避而不谈。列宁在谈“夸大的危险”时说：“如果不纠正这种夸大，势必会使共产国际走向灭亡。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够损害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威信，如果他们自己不损害自己威信的话。……但夸大，哪怕是少许的夸大，也是会阻碍胜利的。”<sup>②</sup> 不仅右倾机会主义者分裂国际工人运动，而且小资产阶级左倾宗派主义者也同样地分裂国际工人运动，中国领导人对这一点也是照样避而不谈的。

目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还不是通过内在的倾向受到威胁，而是通过中国领导人完全有意识的分裂活动受到威胁。他们借歪曲的历史论述来为他们的分裂政策辩护，并把责任转嫁到苏联共产党领导的身上。但是，这种企图一与国际工人运动的真正历史相对照就破产了。

① 米·安·苏斯洛夫同志1964年2月14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关于苏共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载1964年4月4日民主德国《新德意志报》。

② 列宁：《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载《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08—509页。

中国领导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还使用了另一种同样与任何科学性格格不入的方法，即将各个不同的阶段混淆起来，将不能比较的东西互相加以比较，好借此证明他们的错误结论。用列宁的话说，他们“打着别人的旗帜偷运自己的货色”，完全有意识地运用“一个很小的军事机智”，以便暗中偷运分裂的私货。虽然他们在列宁主义者的伪装下隐蔽起来，但还是违反了列宁的方法论的要求：“只有……首先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我们才能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sup>①</sup>。如果说中国历史学家把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令人敬佩的斗争同他们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活动相提并论，那末，他们就是在以魔术家的手腕运用“军事机智”。

我们把他们的一些相提并论的东西拿来看看，他们说，在马克思主义的故乡，社会民主党向机会主义蜕化；在列宁主义的故乡，苏联共产党变成修正主义。他们明确地写道：“在这里，我们不妨温习一下列宁在二十世纪初对待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态度。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第二国际最强大最有影响的党。但是，当列宁一旦发现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机会主义的时候，他就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指出，不应当‘把德国社会民主党最不体面的东西作为仿效的榜样’。”<sup>②</sup>这样一种类比是有意意识的，无非是替污辱苏联共产党和它的领导、污辱它的过去和现在的行为辩护。事实上，一个人如果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还有那怕是一点点关心的话，难道他能想象，把苏联共产党同帝国主义进行英勇不屈的原则性斗争与艾伯特、谢德曼、休特古姆和考茨基之流的右翼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跑向帝国主义阵营

---

① 列宁：《打着别人的旗帜》，载《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4页。

② 《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第28—29页。

相提并論嗎？

这里，中国领导人达到了曾被历史抛弃的那种“过激派”的水平，列宁在1920年曾斥責过“过激派”，因为他们执行“机会主义”和“叛变革命”的反动政策。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共产党提出指控的内容和水平，同“过激派”没有什么区别。

1920年，海尔曼·果特在他的《致列宁同志的公开信》中，高唱无产阶级分裂的贊歌，并指責列宁：“您不愿意分裂，不愿意重新组合，因而也就不愿意达到更高的阶段……在我们看来，这就是机会主义，最坏的机会主义……当时的社会民主党是怎样的，您也怎样作，现在的第三国际也怎样作……但是这意味着……如果您和莫斯科执政府还保持这种策略，还站在这种立场，那你们就不能领导西欧革命并通过它领导世界革命。”<sup>①</sup> 现在中国领导人重弹同样指控苏联共产党的老调，把果特大肆宣扬的分裂政策用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

指控苏联向资本主义蜕化，也是中国领导人从历史的垃圾箱中拣出来的。现在他们写道：“苏共领导宣布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改变苏联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为资本主义势力在苏联泛滥大开方便之门。”<sup>②</sup> 当时，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左派”的领导人问：“谁来指导共产国际呢？”他们自己答道：“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也就是俄国共产党指导共产国际。

“但是，俄国资产阶级——农民民主党的影响越来越大，它的力量超过了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包括经济和政治的力量。

“但是，资本主义的外国也赢得了超过苏维埃共和国的力量。

“究竟谁来指导共产国际呢？俄国资产阶级——农民民主

<sup>①</sup> 海尔曼·果特：《致列宁同志的公开信》，柏林1920年德文版第32、33、67页。

<sup>②</sup> 《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第27页。

党，从长远看，却渐渐地成为资本主义指导共产国际。”<sup>①</sup>

这就是那些曾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所写的，当他们试图把自己说成列宁和共产国际那样的“左派”时，他们却登上了历史的垃圾堆。难道历史的经验还不应该使中国领导人深思吗？

中国领导人为了达到廉价类比的目的，还引用马克思关于英国工人运动“资产阶级化”的言论（尽管他们同时以十分恶劣的态度对待列宁关于机会主义的社会经济根源的理论），以向人们证明，苏联人民为提高他们的福利水平而进行的斗争，造成了苏联共产党的机会主义。但是，所有的社会主义者从来都是为共产主义社会而斗争，在这个社会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sup>②</sup>而且，国际工人运动史也就是同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群众贫困化的内在倾向作斗争的历史。社会主义的吸引力随着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福利水平的提高而增长，社会主义阵营则通过它的示范力量影响世界政治。这种类比的欺骗性在于：马克思说的是，资产阶级靠损害广大群众和殖民地人民的利益来收买工人阶级的很小一部分即工人贵族；而苏联和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则是通过推翻剥削者和共同的劳动来提高他们全体人民的福利水平。但是，这并不导致“资产阶级化”，也不会陷入机会主义的泥沼，而是同目前形势相适应的两大世界社会体系之间的阶级斗争形式。为了认识中国的类比的全部荒谬性，只要把这点用于德国的情况，只要问一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福利水平

---

① 海爾曼·果特：《莫斯科国际》，柏林1921年德文版第1頁。

② 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3頁。

奧·倍倍爾說：“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不是为无产阶级式地活下去，而是为废除大多数人的无产阶级式的生活才形成的。”

的提高是有助于加强我们在整个德国的斗争呢还是妨碍了它就够了。

中国历史学家还企图把另一类比硬塞给读者，他们把列宁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描写成个别人的斗争，尽管这些个别人暂时还处于少数，他们还是继续进行他们的斗争。从而他们企图装出一副姿态，好借以显示出，尽管他们反对的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多数，但是正因为如此，才证明了他们是列宁主义的。他们从历史中搜索证据：“一切大人物都是小人物变成的。起初看起来好象很渺小的人们，只要他们手里有真理，得到群众的拥护，他们最终总会胜利的。”<sup>①</sup> 一个多么软弱无力的证据！我们这里甚至不想谈起，中国领导人怎样表明他们同左倾宗派主义的“青年派”的血缘关系。“青年派”在反党斗争中拿出的“证据”（恩格斯在1890年写的《答〈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文章中也同样地引用过）是：“多数常常很快地成了少数”。<sup>②</sup> 但是，这里中国的方法的愚昧无知和倾向性是十分明显的。他们决不了解列宁的斗争。他们的类比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列宁在第二国际中的斗争是反对那些容忍机会主义在自己的队伍中存在的政党的，而机会主义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影响的体现。这些党的机会主义领导，通过他们的阶级合作政策分裂工人阶级的革命团结，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公开跑向他们本国的资产阶级方面去了。鉴于这种叛变，列宁主义者不得不为抛开这些机会主义者，为创造新型的政党，特别是为工人阶级重新团结起来而斗争。列宁在1903年创立的布尔什维克党就是这样的一个党。但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是由世界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① 《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第45页。

② 恩格斯：《答〈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德文版第68页。

的政党組成的。这是工人运动的真正的革命队伍。他們絕大多數具有十几年的革命的階級斗争的经验，全部都站在反对垄断資本和帝国主义的前哨。如果把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奠基者反对机会主义的第二国际所作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英勇行为拿来用于革命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那就是犯罪。誰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宣传分裂，誰談这种分裂的“必然性”，誰声称这是“历史发展进程中合乎規律的現象”，<sup>①</sup> 誰就是犯罪，誰就是帮助帝国主义进行反对革命的斗争。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而决不是詭辯哲学所能扼杀的。

中国领导人为了他們党派斗争的利益，否认列宁主义政党的基本組織原則是铁的紀律，否认列宁曾一再強調的“少数觉悟工人服从多数的觉悟工人”。<sup>②</sup> 他們从精神上和物质上支持各国共产党內的一切攻击我們的团结即我們极其宝贵的财富的分裂集团。

在中国的历史考察中，他們发现的另一个所謂国际工人运动史的“規律”起着特殊的作用。他們写道：一个党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前列地位“也不是长期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而轉移的”。<sup>③</sup> 他們描写工人运动的重心怎样从西方移向东方，从英国移向法国，从法国移向德国，然后又移向俄国。从而企图給人造成这种印象：現在該輪到中国成为中心了。但是，工人运动重心的变更不是按形而上学或地理—政治因素进行的，而是一个社会经济和政治問題。階級对立极其尖銳化的国家的党，在为夺取政权而斗争时，成为工人階級的前卫；現在在世界范围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和两种社会制度斗争的时代，

① 《七評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第57頁。

② 列宁：《論冒险主义》，載《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60頁。

③ 《七評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第31頁。

只有那种具有丰富的革命经验和领导社会关系高度发达的国家的党，才是工人阶级的前卫。只要苏联共产党还是这种情况，那就仍然是国际工人阶级的前卫。

苏联共产党了解它的领导作用，科学地分析了世界发展中的历史变化，并根据变化了的力量对比关系作出理论上和政治上的结论：这种结论也曾为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1957年和1960年莫斯科的决议中所承认并共同加以制定，这些都证明了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因此，苏联共产党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进一步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然而，中国领导人这里看到的却是修正主义。列宁总是经常不断地同那些不能或不願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来作结论的教条主义者进行斗争。列宁在1907年同“抵制派”的论战中写道：“可是正因为我們珍視这种爱护革命传统的态度，所以我們应该坚决反对一种错误观点，以为采用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口号，就能促使这一时期的基本条件重新出现。维护革命的传统，善于利用这些传统进行经常的宣传鼓动，使群众熟悉对旧政权直接采取攻势的斗争应该具备什么条件——这是一回事。把一个口号从过去产生它并保证它得到成功的全部条件中抽出来加以重复，并把它拿到根本不同的条件下去运用——这是另一回事。”<sup>①</sup>

同时，列宁还援引马克思如下的一段话：“马克思非常珍視革命传统，严厉斥責对革命传统的背叛和庸俗态度，而同时要求革命家善于思考问题，善于分析采用旧斗争手段的条件，而不是简单地重复已知的口号。”<sup>②</sup>1917年，列宁还提醒这一点：“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須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須考虑现实的确切

---

① 列宁：《反对抵制》，载《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2—23页。

② 同上书第23页。

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論不放，因为这种理論和任何理論一样，至多只能提出基本的和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生活中的复杂情况。”<sup>①</sup>

列宁经典式地和創造性地丰富了馬克思主义；他根据变化了的条件作出新的結論，从而进一步发展了馬克思主义的理論。如果說馬克思和恩格斯曾期待革命首先在資本主义高度发展的西方国家取得胜利，那末，列宁則通过自己的分析证明，俄国不應該无条件地等待西方革命，而通过自己的革命也能赶在前面。馬克思和恩格斯曾把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看作是在大多数資本主义国家中同时进行的一个过程，列宁則根据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从理論上論证了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可能性。在列宁領導下的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光辉地证明了这一原理。这一原理实际上是在变化了的斗争条件下对馬克思主义的創造性的应用，然而以考茨基为首的机会主义教条主义者却把它当作“修正主义的东西”加以反对。这一原理給列宁的党和俄国工人阶级以进行世界历史上最英勇的斗争的勇气，以便以他們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前卫。中国领导人反对通过目前国际工人运动的革命实践創造性地丰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只能证明他們同右翼教条主义的馬克思主义的破坏者的血緣关系。在反对革命发展的斗争中会出现右的和“左”的极端，历史经验每每如此。

如果說苏联共产党在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在他們的新綱領中，根据世界变化了的力量对比情况作出結論，那么它过去和現在都是在实行馬克思列宁主义。当它作出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有防止的可能性以及通过和平的、不经过国内

---

<sup>①</sup> 列宁：《論策略書》，載《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5頁。



战争的道路建立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新结论时，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起作用。这一点，中国领导人在1957年和1960年也曾承认过。然而他们现在却攻击这个决议，说它是“修正主义的”，并且宣布：由于这种原因，苏联共产党“当然也就丧失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为首’的地位”。<sup>①</sup>他们在1964年3月30日的所谓八评中，甚至要求修改两次共同声明中的规定。当他们培植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因而责怪苏联共产党和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进行反对个人迷信腐败影响的斗争时，他们便滚入教条主义立场上去了。但是，他们的立场早已不再仅仅由教条主义所决定，而实际上是意味着在理论和实践上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还企图通过他们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的补救，把这种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巩固下来。

他们企图通过他们对国际工人运动史所作的片面的、不符合客观的因而也不符合党性的论述，为他们准备争夺领导权，为他们自诩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一的捍卫者和解释者奠定基础。

为此，他们还企图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寻找这样一类比：列宁在恩格斯死后怎样起而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进行斗争，照他们看来，斯大林在列宁死后也就怎样继而独自一人地进行这种斗争，而在斯大林死后，领导权就转归站在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斗争之首的毛泽东。

如果他们的理论得逞，就使他们攫取了这种权力，即可以对所有共产党的内部事务横加干涉，对他们发号施令，命令他们作什么或怎样作。他们首先攫取宣判谁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谁是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决定权。他们早已自作主张地决

---

<sup>①</sup> 《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第34页。

定了，他們承認誰是合法的共產黨。他們企圖建立一個以他們為首的占有特殊地位的黨派性集團。早在1962年底，阿爾巴尼亞勞動黨領導人之一的謝胡已經公開承認，“目前以中國黨為首的忠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的營壘正在形成”。

中國領導人庇護比利時、印度、澳大利亞和錫蘭的共產主義團結的分裂者，把他們稱作是“真正的革命家，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戰鬥的唯物主義者”，并把他們的分裂活動看作是“一條必然的客觀規律”。<sup>①</sup>

國際工人運動的歷史教導我們的卻與中國領導人的斷言恰恰相反，國際工人運動的規律不是分裂，而是頑強地、孜孜不倦地為團結而鬥爭。由於中國領導人的分裂活動，為加強統一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隊伍的團結而進行的鬥爭變得更加艱巨和具有長期性。但是，正是國際工人運動史教導我們，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長期地阻止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的合乎規律的過程。我們堅信，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遲早總會回到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來，並在國際工人運動史中占有適當的位置。

（譯自1964年5月15日第4期民主德國《德國工人運動史論叢》）

---

<sup>①</sup> “七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第15-16頁。

# 一种冒險主义政策的矛盾重重的哲学 ——論在北京出版的 《辯証唯物主义》教科书

魯·赫罗尔德、吉·卡德沙夫卡、海·奥皮茨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证明，創造性地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最重要的工具。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使共产党人在最复杂的社会生活环境中也能够正确地辨明方向和确定有科学根据的战略和策略。因此，在1957年莫斯科宣言里特別用一节的篇幅指出了辯证唯物主义哲学——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基础的卓越意义。

我們党在发展和巩固我們国家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也正是由于我們党的政策是建立在創造性地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的結果。不容任何人爭辯，迄今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是在极为复杂的条件下进行的。使我們党引以为荣的是，它懂得正确地把握复杂的德国的发展过程的客观辯证法并且創造性地把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具体情况中去。这絕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我們党不得不经常地批判政治上的錯誤意見，而这些意見也常常和錯誤的哲学观点联系着。因此，我們党早在反法西斯——民主改革时期就已经駁斥了“通往社会主义的特殊的德国道路的理論”，因为这种理論以我国发展的特点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普遍規律。同样，粉碎了希德万集团抹煞社会主义建設和为德国統一而斗争的辯证法，即粉碎了实际上导致放弃社会主义革命的修正主义观点。

我党斗争的经验表明，哲学问题上的明确性是关系到工人阶级政党统一和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前提。由于这样一个原因，过去和现在总是把最大注意力放在我党党员掌握辩证唯物主义方面。瓦·烏布利希同志说：“我相信，我们是德国第一个并且是唯一的向它的党员这样自觉地、彻底地提出了哲学问题的党。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认为德国统一社会党作为我国的领导和指导力量只有具备思想上牢固的团结和统一才会成功地完成它的任务。辩证唯物主义是保证我党统一和团结及其战斗力的理论基础。”<sup>①</sup>

世界观问题上的明确性能巩固党的统一和团结。这一观点也适用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和团结。因此，为了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坚决驳斥不管来自何处的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种种攻击是每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义务。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反对中国领导人的分裂政策、主张加强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一致和团结的声明》中确认，中共领导人所代表的是“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观点的拙劣的混合物”<sup>②</sup>。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中共领导人的实践和理论活动的各个领域里，也表现在哲学领域里。

看看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及其发展，就会毫无疑问地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已证明了是一门极富有生命力的、不断发展着的、推动历史前进的学说。恰恰这一点最清楚地表明了它作为工人阶级哲学的阶级特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工人阶级为完成它的历史使命的斗争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社会生活的每一变化、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斗争所

---

① 烏布利希：《自由、科学和社会主义》，柏林德国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09—110页。

② 1964年4月15日民主德国《新德意志报》。

引起的每一个社会变革，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中都得到了科学的反映，因此，哲学本身也在变化并为新的认识和論題所丰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1957年和1960年莫斯科會議的著名宣言、苏共綱領和建立在对德国的社会关系准确分析基础上的我們党的綱領都是当代在这方面的見证。

无产阶级的哲学必将实现——馬克思在一百二十多年前就对他創立的哲学作了这样的論断。工人阶级的哲学只有当它面向现实，面向生活，考虑到自然界和社会上客观世界的可变性时，才会变为现实。否則，它就变成一套空洞的概念的体系，变成一种抽象的公式和样板的堆积。

中国领导人的哲学已表明就是这样一种脱离生活的哲学，是一种現成的样板、空洞的抽象概念和公式的堆积，它提供了在“理論上”为他們的肆意行动进行辯解的种种可能性。这一点在近几年所发表的哲学著作中表现得特別显著，在北京出版的、由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哲学系一批教授和讲师編写的《辯证唯物主义》教科书，就属于这些著作之列。在这本哲学著作中我們发现教条主义、修正主义、詭辯术、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被折衷地罗列在一起，其目的是为中共领导的冒险主义、沙文主义政策进行辯解。

### 对客观規律的主观主义否认

德国和国际的革命工人运动史证明，只有认识到各时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規律并且从具体分析当时阶级斗争的条件出发，才能制定出真正科学的战略和策略。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实践活动，就其实质說来，就是有意识地向人民群众指明社会发展的規律并且领导人們向一切阻碍規律得到贯彻的力量和現象进

行斗争。

很清楚，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在1957年和1960年莫斯科会议文件里科学地、准确地估计了当代世界革命的进程及其所根据的客观规律。科学的战略和策略只能在这些文件的基础上被制定出来。但是，自1964年3月以来，中共领导人在他们的党报党刊上公开竭力修正共同制定的决议。中共领导人一直把自己装扮成是在国际文件中所作的估计的最坚决的维护者，虽然他们越来越变本加厉地以相反的原则作为他们制定政策的依据。放在面前的这本教科书，形式上表示忠于莫斯科决议，尤其是忠于1957年莫斯科宣言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作用和意义的阐述。但同时，却企图为中共领导人的、与莫斯科决议相对立的政治方针建立哲学“基础”。本文将就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由此而得出的对党的现实政策的结论等问题来阐明这一点。

在《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性》一节里和其他地方引证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立人关于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性的论述。难道表面上引证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论点，就算符合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分析问题的要求吗？完全不能。恰恰相反，正如弗·伊·列宁在与孟什维克的观点进行论战时指出的那样，简单地引证我们经典作家的言论，只能是扼杀马克思主义富于生命力的本质的一种手段。很明显，这正好与中共理论家和领导人处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的情况相吻合。但是还不仅仅如此！他们竟无耻地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威信，来为他们的冒险主义政策披上科学性的外衣。

《真理报》认为，在北京思想家的态度背后，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一种提高为原则的非原则性，即：随时准备提出、保卫和承认任何一个观点，只要它符合中共领导的政治目的就行。<sup>①</sup> 《真理

<sup>①</sup> 1964年5月12日苏联《真理报》。

报》的这一論断，也完全适用于中国“理論家”論述表現在規律中的客觀必然性的历史特点这一行动。这些論述是建立在形而上学地把普遍和特殊分割开来这一点上面的，这种分割使他們能“按需”对一般和特殊进行不允許的夸张和絕对化。就这样，不顾某些規律存在的历史条件把这些規律的作用說成是“絕对的”和“无条件的”（例如关于帝国主义的規律）。中国的思想家并以此来为他們拒絕和平共处政策进行辯解。

社会的規律性犹如现实中的其他現象和过程一样，一般总是与个别相依并存。同时，在个别中实现一般，即一般以何种方式方法出現在个别中，总是依赖于当时具体的条件。为了确定社会規律性的作用須要准确地探索在什么样的时代以及在这个时代的什么阶段之内，一种規律在起作用和社会关系是以什么方式貫穿始終。……社会規律不管人們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通过在物质生活生产过程中人和階級的相互作用而产生，同时在这个或那个时代处于中心地位的階級也决定社会环境的主要内容、主要方向和最重要的特点。<sup>①</sup>

在二十世紀初資本主义是唯一的，无所不包的社会体系，不是工人階級而是帝国主义資產階級决定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帝国主义的規律性赋予这时代以特征，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正确地把这个时代称之为“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的时代”。

但随着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資本主义的鏈索被冲破了，不仅仅俄国的历史，而且世界历史也开始了一个新紀元。教科书的作者虽然复述了列宁的估計，但没有把这种估計与其迫切相关的結論联系起来：“消灭資本主义和它的遺迹、实行共产主义制度的原則，构成现在已经开始的全世界历史的新

---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1960年德文版第134頁。

时代的内容。”<sup>①</sup>

随着新时代的开始，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成为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工人阶级成了这个时代的中心。今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决定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主要方向和主要特征。如果说在教科书中没有把这一规律看作记述当代特征的基础，否认了世界上具有质的不同的新条件（今天，帝国主义的规律在这些条件下仍然起作用），那么这不是偶然的事情。他们想以这种方式为自己创造一种可能性，以使用“自己的”，即臆想出来的规律代替实际上仍在起作用的规律及其作用的方式。例如，毛泽东用来“深刻地揭露帝国主义本质”的、并在教科书中被作为特别具有方针性加以强调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力量发展的规律”，这个规律称：“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见《辩证唯物主义》上册第三章第四节）

只要还有一点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一定会从帝国主义的这一定义中觉察到，他们竟如此厚颜无耻地将这样的“智慧”吹捧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认识”。教科书的作者是怎样使这一“规律”和对帝国主义的本质的准确描绘——正如列宁所达到的那样——协调一致呢？人们不能设想，这些大声疾呼地自称是唯一正确的列宁主义思想财富的维护者、这些甚至在这本教科书的另外一个地方说“列宁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本质”的人，会恰恰不知道列宁对腐朽的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重要分析和总结。因此，北京的“理论家”大概也不会对资产阶级理论家，如阿·费尔维克所得出的这样的结论感到惊讶，这个结论是：“列宁的具体的明确性（关于帝国主义。——作者）和中国共产党‘理论家’的模糊性之间的差异是如此清楚，使我们难以相信，中国人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54页。



沒有意識到這一點。”<sup>①</sup>

離開與變化着的階級力量對比的任何具體聯繫去理解帝國主義的發展規律，這樣，就既不能看到保衛和平的可能性，也不能看到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和平過渡的可能性。中共領導人宣稱帝國主義的侵略是絕對合乎規律的，而且實際上是不可避免的，宣布“暴力革命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普遍規律”，這樣，他們旨在反對莫斯科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反對蘇美英三國政府關於限制為軍事目的生產裂變物質的聲明以及反對為實現和平共處而採取的其他步驟的政策，就彷彿是“革命的”了。

中共領導人攻擊由共產黨和工人黨主張的列寧的和平共處政策，並且斷言，這些黨已失去了對帝國主義的評價能力，從而相信帝國主義的本性已經改變了。而實際上帝國主義仍然是殘酷的。中國領導人利用所謂中間地帶的“理論”實際上把法國、西德、英國和其他國家的帝國主義者變成了反對所謂唯一具有侵略性和新殖民主義的帝國主義——美國帝國主義的鬥爭盟友。這一點且不說，我們只要問：究竟是誰認為帝國主義的本性已經改變了呢？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堅決相信莫斯科會議的估計，並且聲明，只要帝國主義存在，它的本性就不會改變。所以，他們強調，各國人民必須警惕，社會主義國家有責任把他們的防禦力量保持在必要的水平上，直到一切戰爭危險從人類生活中排除為止。1960年莫斯科聲明寫道：“社會主義國家、其他愛好和平的國家，國際工人階級和廣大的人民群眾，進行積極的堅決的鬥爭，就有可能孤立侵略集團，使擴軍備戰遭到挫敗，迫使帝國主義者接受普遍裁軍的協定。”

來自帝國主義的戰爭傾向只能由一定的階級力量來實現。

---

<sup>①</sup> 1961年第2期美國《美國歷史評論》雜誌。

但是，今天国际帝国主义的这股侵略势力受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有着国家经济、军事基础的强大力量的有效抵制。和平必然来自社会主义。当社会主义、民主与和平力量得到团结一致的发展时，这支历史力量的作用会日益强大并且能够最有成效地取得反对战争倾向的最终胜利。联合的力量不仅是个别因素的总和，而且是表示一种势力的更高质量。恰恰在这里证明了中国领导人旨在分裂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政治方针的极端腐朽性。今天，像中国领导人所作的那样，在判断战争问题时只看到帝国主义的存在及其可能性，那么，这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这种立场同时表明了不相信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工人阶级、民族解放运动和世界范围的和平阵线的力量。这些力量能够而且必然会迫使帝国主义执行和平共处政策，以致通过这种方式使世界战争还在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之前就能从各国人民的生活中排除掉。所以，我们党在莫斯科共同决议的基础上详细地研究了当代的规律在德国复杂的条件下如何起作用的问题，准确地估计了力量对比关系，并运用和平共处政策制定了两个德国彼此谅解和接触、组成邦联和最后重新统一的纲领，这个纲领的最重要方面就是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并与此相关地完全实现社会主义的规律。中共领导人对帝国主义及其规律的阐述不是出自对今天世界上阶级斗争的具体条件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如果以他们发现的“规律”作为确定国际工人阶级的任务的出发点，则意味着以主观主义代替为实现现时代的客观规律而进行的自觉的斗争。不言而喻，他们以此来为每一个违背国际工人阶级利益，从而也违背中国人民利益的民族主义政策进行“理论上”的辩解。

在1957年和1960年莫斯科宣言中所阐述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在教科书里毫无地位。这不是偶然的。到1956年

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为止，所提出的任务，基本上是适应于当时中国情况的客观规律的。这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所指出的进一步发展的步骤，证实了这一点。但此后中共领导人执行了一条显然是不以客观所要求的方式完成社会主义进一步建设的路线，也就是说没有继续和彻底完成八大提出的任务。实际上，他们是向困难投降，并根据主观主义的判断提出任务。

教科书的作者一方面写道，人们根据规律的客观性不能任意创造和抹煞规律，而且绝对不能违背它。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把那些反对宣布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政策的人评价为以主观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机械主义世界观的想像为指导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第四章第三节）。人们提出的论证，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政策既不适应中国的客观发展规律，也没有顾及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经验，尤其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被中共领导人打上了机械论和经验主义的烙印。

上述一切，表明对于客观的社会规律性作用的论述完全是武断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政策是主观主义的表现，它事实上否认了客观社会规律性的作用。社会主义社会规律的客观要求为中共领导人的愿望所取代，他们相信只要发动千百万人而不依赖于国内现有的物质条件和群众的觉悟就能实现这些愿望。因此，他们提出了超越必要的发展阶段而在几年之后作为第一个国家冲进共产主义的任务。提出这种主观主义的任务，竟然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教科书里被称为是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运用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的光辉典范！但是从“理论上”为中共领导的冒险主义政策进行辩解的这种企图也不能掩盖他们实际上是为争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创造基础的这一企图。

自195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的发展表明了，“大跃进”和人民

公社事实上已导向何方。尽管在他們的经济政策方面連續不断地在实践中作了調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显然不愿意承认他們的錯誤政策，不愿意回到1957年和1960年在莫斯科通过的、并且也由他們自己签字承认的、以当代社会发展根本規律为基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总路线上面来。

### 馬克思主义的辯证法， 还是詭辯术和形而上学？

在为他們的反列宁主义政策进行辯解时，中共领导人在他們的讲话和文章中喜欢引证辯证法。在这部教科书里也不乏证明中共领导人的理論观点和現行政策是以彻底运用馬克思主义的辯证法为基础的企图。在中国空談家的哲学著作里往往认为中共领导人簡直是“辯证法大师”。但是进一步考察一下，这个“大师資格”的全部可疑性就馬上暴露出来了。

不管是在这本教科书中还是在中国哲学家的其他著作里，人們都看到这样的現象：辯证法几乎仅仅是簡化为对矛盾的闡述。馬克思主义辯证法的另外一些法則和范畴最多也不过只是附帶提一下或者干脆描繪为第二位的東西。按照他們的邏輯，似乎回答有沒有矛盾的問題比回答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問題具有更大的价值。认为不承认矛盾我們“就不能始終如一地从客觀实际出发，彻底科学地解决思維和存在的关系問題”（第二章第二节）。<sup>①</sup>

这话的确很蠱惑人心，因为矛盾确实关系到辯证法的核心。

<sup>①</sup> 必須在此指出：很久以来，在中国的哲学著作中，就对是不是有一个或两个哲学上的根本問題进行着激烈的討論（第二个根本問題是承认矛盾的問題）。討論尚未結束，但是认为哲学上有两个具有同样伟大意义的根本問題的意見越来越多。

但究其实，教科书作者的論点是脱离唯物辩证法的基础的。这里不单单是关系到“問題的提法”，因为，假如我們不是彻底地从客观实际出发，即不是站在科学的、唯物主义的解决哲学根本問題的基础上，我們將不会懂得辩证法的实质。不是有没有矛盾的問題最終决定哲学根本問題的科学解决，而是恰恰相反；只有科学地解决哲学的根本問題，才能正确理解辩证的矛盾本质。人們可以回忆，像黑格尔，他就完全承认矛盾，但他始終沒有彻底科学地解决思維和存在的关系問題。其原因首先在于，黑格尔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是从观念(绝对观念)是物质的第一性这一观点出发的。黑格尔的辩证法——也是他唯一的伟大之处——是唯心主义辩证法，矛盾是发展着的绝对观念的源泉和动力，绝对观念被說成是现实的創造者。众所周知，这正是阻碍黑格尔彻底科学地解决辩证法的矛盾問題的唯心主义的基本观点。

事实上，人們必須首先和彻底地从客观实际出发，然后才可能正确地确定辩证的矛盾本质，而不是顛倒过来。就是說，要从这样一个事实出发，即：世界的統一性就在于它的物质性；物质对意识來說是第一性的，物质在空間和時間上是无限的，但同时又存在于在空間和時間上有限的現象之中，物质既是連續的又是不連續的。因之，物质的运动和发展是物质現象产生、消失和彼此轉化的无限的过程。我們对这个问题給予这样大的注意力，似乎显得很奇怪。但是，尽管如此，这絕不是理論上的吹毛求疵。

把辩证法局限于解释矛盾，这必然导致矛盾將最終变成一种詭辯的概念和形而上学的样板。中国的“辩证法大师”是逃脫不了这一結論的。从外表看来，这在中国近期的哲学著作里已表現出来，他們把局限于矛盾的辩证法說成是所謂的“毛澤东的‘两点’論。”

对这种“理論”的剖析令人无庸置疑：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

中国领导人的手里已变成了一种“两点論”，就某种关系而言，这理論就是古代中国煩瑣哲学经验的一种現代翻版。中国的“理論家”是怎样理解“两点論”呢？“毛澤东同志把分析矛盾的方法通俗地归結为‘两点論’，就是說要分析事物內部矛盾的双方……由于两点論，我們才能解释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必然趋势。”<sup>①</sup>中国哲学家簡單地在每一事物(現象)內部寻找对立的两个方面，以此证明辯证地研究問題的全面性和深刻性。例如說帝国主义“有危險的一方面”，所以应该在策略上重視它；但另一方面帝国主义是“紙老虎”，——这是本质的一面，所以必須在“战略上藐視”它。教科书的編者竭力为这种論調建立“理論”基础，他們援引了毛澤东“发现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力量发展的規律”，从而得出結論：“从表面上看来，帝国主义是强大的；但实际上只不过是一只紙老虎。”“一方面和另一方面”——就是完全“适用”于客觀世界一切現象的“两点論”的基础。“两点論”会导向何处，《紅旗》杂志发表的一篇社論說得尤为清楚：“困难和順利，强和弱，胜利和失敗，好事和坏事，进步和落后，真理和錯誤等等都是对立的两个方面，无一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依存，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轉化。”<sup>②</sup>

諸如此类就是借助于“两点論”把它冒充为辯证法的手法。要了解这种玩弄概念，即把相互为用的圓圈冒充为对辯证法矛盾的闡述的全部荒謬，不一定必須是哲学家。<sup>③</sup> 只要对这一

① 艾思奇：《辯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北京1962年版第98頁。

② 1960年第15期中国《紅旗》杂志。

③ 黑格尔早就嘲笑过这种手法并且称它为“相互为用的圓圈，通过这个圓圈，人們无法知道事物本身究竟是什么，既不知道相互作用的这一个，也不知道另一个究竟是什么。……这样一种智慧所行使的伎倆，由于它容易行使，立刻就被学会了。……这种單調的形式主义的乐器人們要去掌握它，并不比掌握这样的一种繪画調色板更困难些，在这种調色板上，只有比如，紅、綠两种顏色。”（黑格尔：《精神現象学》，采比錫弗利克斯·瑪埃納出版社1911年版第33-34頁）

概念用实际的内容一填充，那么“两点論”的极端荒謬絕倫就显而易見了。作为“坏事”的法西斯主义在一定条件下能变成“好事”，或者帝国主义能够轉化为“好事”，无产階級轉化为“坏事”嗎？这些問題的提出就意味着回答說：中国的“理論家”也在矛盾問題上用千篇一律的、对认识现实毫无帮助的一方面—另一方面的結構代替創造性的馬克思主义的方法論。

这种“試驗”的目的是，在“运用辯证法”的外衣掩盖下，为他們反对列宁主义的路线进行辯解。人人皆知，中共領導在1960年莫斯科會議上頑固地反对应批判与列宁的党的关系不相容的任何宗派和分裂活动这一論断。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揚在1963年10月26日作的题为《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的报告中，借助于“两点論的辯证法”为中国領導人的态度作了解释：“世界上無論什么事物，总是一分为二。学說也是这样，总是要分化的。有革命的、科学的学說，就一定会在共内部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它的对立物，产生反革命的、反科学的学說。”

同样，“两点論”也被用来为中国領導人的分裂政策裝飾上“合乎規律性”的帷幕。因此，在一篇北京的“評論”中一本正经地宣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国际工人运动，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总是一分为二。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这种或那种右傾机会主义。……团結，经过斗争甚至分裂，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結，这就是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辯证法。”<sup>①</sup>

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說明了什么呢？历史经验教导我們，在理論上和实践中背叛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把自己从革命运动中分离出去的一切势力，迟早将必然遭到失败。合乎規律的，不是

---

① 1964年2月4日第2—3期中国《紅旗》杂志。

工人政党的分裂，而是其力量的增长、一致和团结。

难道我们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曾经不得不亲身体验了工人阶级的分裂意味着什么吗？我们党的历史不是教导我们，只有工人阶级政党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一致，才是我们与我们的同盟者一起胜利地反对国际反动势力和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保证吗？因此，我们的责任和行动准则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产生的、体现了德国社会主义者的团结的德国统一社会党，过去和现在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和团结而斗争。”<sup>①</sup>

我们党在过去就充分反对过工人政党的历史是分裂和宗派斗争的历史的观点，并且驳斥了这种观点是不科学的和毫无根据的。在这里人们会联想到，我们党批判过把德国的历史看作是“灾难”或者把德国共产党的历史描写成为宗派斗争的历史的“理论”。为此，瓦尔特·乌布利希同志在第十六次中央全会上说道：“今天谈‘灾难’不是意味着别的什么，只能是否认历史的辩证法，并且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相反、与历史的真实性相矛盾地把德国历史上的进步路线推移到次要地位”。把党史阐述成是连续不断的党内斗争的历史，“就必然会导致缩小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右翼领导人对德国工人阶级的惨重失败所负的罪责，从而贬低了为工人阶级和民族利益而斗争的德国共产党的历史作用。”<sup>②</sup>

揭露自然界和社会中的矛盾，在任何情况下总是以具体分析具体情况为先决条件的。这是辩证法的基本要求。在揭露和确定矛盾时，重要的是真正客观存在的实际情况。如果像中共领导人和“理论家”那样把实际情况置之度外，那么最后从辩证法中

① 1964年4月5日民主德国《新德意志报》。

② 1962年第8期民主德国《统一》杂志第13页。



剩下的只有概念。用这样一种手段，那么就可能以詭辯的方式为当代設想出种种矛盾，把它們影射到将来并規定为“不可改变的法则”。

正如“两点論”絕不是什么新創造一样，今天中国共产党內这种理論的代表人物也絕不是第一批恰恰也在这个問題上遭到工人运动的革命理論和实践的捍卫者的坚决拒絕的人。大約在一百二十年以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批判过蒲魯东的“两点論”。蒲魯东把矛盾从生活的实际过程分割开来，把它变为一种样板；然后按照这个样板把千差万別的事物和現象“辯证地分为”好和坏、丑和美、真和假等等。馬克思在給普·符·阿恩考夫的信中写道：由于在所有的小市民看来，矛盾是“本质的核心”，蒲魯东把矛盾这个范畴神化了。因此，“您在他那里一开始就会发现一种存在于生活与观念、灵魂与軀体之間在許多形式下重复着的两元論”<sup>①</sup>。馬克思說明了蒲魯东的“两点論”的根源，并且如同我們立刻会看到的那样，馬克思的評語对于中国领导人的“辯证”观点仍然是适用的。他說：由于蒲魯东“从未真正懂得辯证法，所以他只是把它变成了詭辯术。事实上，这和他的小資产階級立場是联系在一起的。小資产者……是由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构成的。他在自己的经济利益上是如此，因而在自己的政治上、在自己的宗教观点、科学观点和艺术观点上也是如此。他在自己的道德上是如此，在 everything（一切事情）上都是如此。他是活生生的矛盾。如果他同时还像蒲魯东一样是个有才智的人，那末他很快就会学会玩弄他本身的矛盾，并且根据具体情况把这些矛盾变成出人意外的、大吹大擂的、时而丑恶、时而輝煌的怪論。科学上的招搖撞騙和政治上的投机，都是和这种观点分不开的。对

---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959年德文版第556頁。

这种人来说，只有一种动力，那就是虚荣心，像一切爱虚荣的人一样，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眼前的成功、一时的风头。”<sup>①</sup>

中国领导人对当代“辩证法的发现”，其特征就是“玩弄矛盾”，把矛盾变为“出人意外的大吹大擂的怪论”。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争辩，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得不违背意愿地承认，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世界革命运动在过去几年中取得的成就应归功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正确的战略和策略。但是斗争的正确战略和策略是科学地分析当代特征的结果。在两个莫斯科声明中确认，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是我们时代的特征，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反对帝国主义、为争取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斗争的力量决定着我們时代人类社会的主要内容、主要方向和主要特征，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是当代的主要矛盾。

中国领导人特别强烈地反对关于时代特征的科学的估计以及由此产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和策略，因为这些与他们自己的冒险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政策是不相容的。为了对他们的行动进行理论上的辩解，也大肆滥用矛盾。例如关于当代的主要矛盾，时而假设为四个，时而假设为六个，时而假设为八个——各按适宜与否而定。又如，他们捏造了一个玄妙的“中间地带”，并且宣布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再如，他们发明了一种独特的“两点论辩证法”，把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并把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说成是一种单纯的外因。然而，根据毛泽东的观点，“外因”是次要的、第二位的<sup>②</sup>。因此，认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内部的发展根本不会对世界事态的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根据他们的意见，所有非社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6页。

② 参见毛泽东：《矛盾论》，柏林狄茨出版社1954年版第8页。

会主义国家构成了一个单一的整体，并且这个还不是社会主义的世界的内部矛盾，是当代的主要矛盾。他们“寻找”这一个主要矛盾，并且“发现”，美国和所谓中间地带的矛盾就是主要矛盾。而属于这个“中间地带”的、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有：如加纳和西德，阿尔及利亚和法国，安哥拉和葡萄牙。我们的时代的进一步发展将取决于这个“中间地带”与美国之间的矛盾解决。这就是从中国领导人的“逻辑”中得出的结论。要是我们党以这种“估计”作指南，那么其结果就会是，西德帝国主义者和复仇主义者就是我们的同盟者！！

中国领导人闭眼不看这一事实：由于今天世界上存在的两个社会体系的斗争，出现了一个客观的整个人类发展进程，这个进程的主要方面和主要性质今天已经日益由社会主义所决定。正由于如此，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每一成就都直接影响着世界上事件的发生，同时，它也对世界革命的发展起着催化剂作用。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哪一个国家的革命斗争的成果如此直接地与国际形势的发展、与全人类的命运、与世界范围内的革命进程联系在一起。把统一的革命的世界进程的各个方面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就只能给革命运动造成损失。

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立场出发，只有考虑到整个特定的有关体系的情况下，谈外因和矛盾才有意义。没有什么“绝对的”或者“纯粹的”外因和矛盾。人们不应该把外因和内因形而上学地彼此对立起来。因为“外部”矛盾也是在一个更大体系之内的矛盾，而且是处于世界的物质统一体之内的。

由此表明，以形而上学和诡辩术代替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全盘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论，这就是中共领导人的“辩证法的观点”的特征。

## 关于毛泽东思想中的哲学的根本問題

越是彻底地分析“毛澤东思想”的“哲学理論”的內容，便越加清楚，这是一种矛盾重重的論断和公式的混合物，它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創造性精神是不相容的，而仅仅是为毫无原則的大国沙文主义政策进行辯解。但在这本哲学的混合物中，某些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論点——尽管被顛倒，被歪曲——一再出現，它的吸引力被利用来誘导党員和人民群众相信中共領導人的方針，因此有必要彻底揭露这种折衷理論的真实的哲学內容，并且請問它的創始人：你們对所有哲学基本問題給予怎样的回答？

在《哲学的根本問題》一节中，教科书的作者首先从恩格斯的著名論点出发：“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最重大的根本問題，就是思維与存在的关系問題。”<sup>①</sup> 他們解释恩格斯这句话的方式方法却很能說明問題。如他們宣称哲学的根本問題其实就是“主观和客观的关系”問題(第二章第一节)。他們竟以客观与主观的关系問題代替了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問題！这一点，他們首先是从世界的可认识性开始——而在这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也已经被抹煞了——随后他們就把客观与主观的关系問題明确地解释为哲学的根本問題：“主观与客观何者为第一性，是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不能有任何其他标准。”(同上)

以此回答哲学的根本問題，就彻底背离了唯物主义的立場，因为它模糊了唯物主义区别于唯心主义的决定性界限，即，承认

---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柏林狄茨出版社1962年版第274頁。

客觀現實存在于意識之外並且不依賴于意識，所以也就徹頭徹尾地承認了唯心主義觀點。

為什麼說以客觀和主觀的關係代替物質和意識的關係是滑到唯心主義之中的一種表現呢？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範疇包括了在統一于多種多樣的物質世界之中的不同的方面、形態和關係，並且再現了它們。正如列寧所下的定義，哲學上的物質概念是：“標志客觀現實的哲學範疇，這種客觀現實是人感覺到的，它不依賴于我們的感覺而存在，為我們的感覺所復寫、攝影、反映”<sup>①</sup>。他清楚地強調指出，物質的存在不依賴于意識的存在；而且他還指出了另一方面，意識必須聯系于物質存在，沒有它就不能產生。經典作家明確地規定了物質和意識的哲學範疇的內容和範圍。把這一範疇解釋為客觀或主觀並以此取而代代之是錯誤的，因為客觀不同于物質，它既可能是物質的又可能是觀念的。所以，對黑格爾來說，客觀世界則是絕對觀念的化身，即精神；而絕對觀念就是客觀。哲學史上的這一例證已清楚地表明，僅僅根據它對主觀與客觀問題的回答，還不能判斷它是唯心主義哲學還是唯物主義哲學。承認客觀對主觀是第一性與承認物質對意識是第一性，並不是一回事。認為客觀對主觀的關係問題是哲學的根本問題的观点，給唯心主義打開了方便之門。它有助於為中國領導人政策中的主觀主義辯護。

如果人們看一看這種對根本問題的偽造是為什麼“結論”和“認識”找根據的話，那麼也可清楚地看到，這種主觀主義實際上也是中國“理論家”的矛盾重重的哲學觀點的決定因素。例如，這種偽造是為了宣稱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存在是與客觀和主觀的存在相聯系的，並且由於主觀的東西總是有的，唯心主義也就

<sup>①</sup> 《列寧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8頁。

必然万世长存了。“在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不管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会以不同形式出现，尽管它们的性质不一样，但区分它们的标准依然如故。”(第二章第一节)“在共产主义社会里……阶级将被消灭，但由于仍将存在着客观和主观之间的矛盾，因之仍会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间的矛盾。”(第二章第三节)把哲学的根本问题降低为客观和主观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就是把唯心主义说成永恒的社会现象。在这方面，他们完全忘记了唯心主义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忘记了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随着人们对自然及社会本身的控制能力的日益增长，唯心主义的基础将会愈益迅速地被剥夺的事实。

究竟值不值得与这样一种混乱不堪的理论进行辩论呢？这样一种哲学也和一切篡改马克思主义的企图一样，在历史的垃圾堆上找到归宿，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正由于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不可辩驳性，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必然会变为共产主义人类的整个集体行动和生活的理论基础。所以，我们有义务，对于把一种反动的、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相敌对的政策隐藏在它的名义后边的任何企图，进行彻底的斗争。正是因为只有通过工人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才会变为斗争的武器，因为我们要最大成效地和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牺牲地进行斗争，所以我们要最坚决地反对像中国领导人，今天在其理论和政策中暴露的那样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歪曲；我们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的武器变为一把纸剑的任何企图，人们用它也许会戳破“纸老虎”，但不能有效地反对敌人。因此，在这些问题上，不是什么哲学上的吹毛求疵，而是关系到我们必须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解决什么样的任务，才会完成工人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

## 社会主义民主或者“群众路线”？

国际工人运动史教导人们，在工人阶级哲学及其政策之间有着怎样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坚定的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对于真正科学地分析各阶级和阶层在社会中发展着的物质和思想关系以及在政治上正确地领导群众，是一个决定性的条件。因此，科学地回答哲学的基本问题同实际政策的一个决定性的基本问题——即群众工作，是紧密关联的。

这种认识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工人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部领导活动的主导思想。我们在我们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取得成就的原因首先在于党和国家一直都向群众提出适合于我国公民的觉悟和客观发展状况的要求，这些要求促进了社会主义觉悟的形成，并且有助于发展公民的创造性。因此才有可能通过明智地和有意识地运用物质和精神因素的辩证法，在不断增长的程度发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决定性动力和唤起公民在主动自觉地参加创造社会主义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方面的能力和潜力。在1960年10月4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的纲领性声明中，瓦尔特·乌布利希特别强调指出，国家领导就是“在为争取社会主义胜利而自觉斗争的道路上对人们进行领导”，发挥群众的创造性，发展群众在国家在经济领导方面的合作是我们制度的切身问题，因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它的强大，它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便在于此。这项声明也阐明了为列宁所奠定的并且在我們环境中和任务中得到了运用的主要原则。这些原则对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方面进行国家领导活动有决定性意义，这些原则也在日益增长的程度使我国公民有可能全面

地认识自己的决定性的权利：自觉地参与創造整个经济、文化而首先是国家一政治生活。与这些原則相一致地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組織和领导社会生活成了在我們共和国胜利建設社会主义的决定性因素，这决定性地有助于使劳动人民的活动越来越自觉的同社会主义建設的社会要求相一致，有助于发揮他們的創造力以及在这种方式下自觉地、有目的地广泛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加强社会主义。

人們可以說中国领导人实行的群众路线是建立在馬克思主义哲学理論基础上并能最大限度地、全面地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設中发揮人民的創造力嗎？提出这种問題是正确的。教科书的作者非常突出了哲学和政治的关系，同时特別強調了中国领导人为政治斗争而发展的“群众路线”的意义。教科书(第五章第六节)甚至硬說是毛澤东第一个在全面发展馬克思主义认识論的基础上闡明了領袖和群众的关系。但是每个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列宁已经研究过党—阶级—群众之間的关系(不只是从馬克思主义认识論的观点出发，而且是全面的!)；我們当然并不会因此而放弃深入地研究毛澤东的这一“新发现”的义务。

如果人們进一步观察一下“群众路线”这个概念所依据的认识論，立刻就会看見固然一直在讲感性和理性认识的辯证統一，但是最終却仍然把人的认识过程分成了完全不可靠的单个部分。在原則上这种“认识論”归根結蒂是要证明人的思想只有在感性认识阶段上才能形成。否則怎么能理解下面的話呢：“领导人的认识是群众认识的概括化和系統化，因为这是从感性认识或者群众经验到理性认识的突变……”因此，“实现‘从群众中来’和‘把群众意見概括化’……的原則就是从感性认识阶段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的过程……”，而“实现‘把意見拿到群众中去’并‘通过群众检验这些思想’的原則，就是从理性认识回到实



踐中去的過程。”(第五章第六節)

中國領導人貶低人民群眾在歷史進程中的積極作用和創造性活動，其“理論”基礎是對認識過程的非辯證觀點。按照這種“理論”只有領袖才能進行理性思考，因此所謂的“群眾路線”最終仍被證明是一種對群眾束縛的“路線”。因此在教科書中(第五章第六節)指出了毛澤東的要求，即總結“這些(孤立的，不系統的)群眾意見，把它(經過研究而概括化和系統化了)再搬到群眾中去宣傳和講解，使群眾把這些思想變為行動”<sup>①</sup>。教科書的作者竟然進而把群眾的意見看作是“原始材料和半成品……”，而把“領導人的大腦看作為把原始材料和半成品加工成成品的工廠”。研究和概括群眾的實際經驗毫無疑問是社會主義領導的一項任務。但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路線卻旨在假裝尊重群眾的意見和從理論上對它們進行加工，實際上他們卻輕視群眾意見。他們只是企圖維持一種錯覺，似乎他們的教條主義的公式化的和與生活陌生的理論是已在實際中得到證實、檢驗和進一步發展了的認識。

在教科書中談道：“‘實踐——認識——實踐’這是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公式。‘群眾——領導——群眾’這是黨貫徹‘群眾路線’的公式。這兩種公式是完全一致的。”(斜體字[中文用仿宋字]是我們標的。——作者)這不是別的而正是把群眾和實踐、領導和認識等同起來，也就是設想群眾永遠沒有能力取得真正的、獨立的認識。從原則上看這就是企圖為否定能有計劃地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和能教育勞動人民成為具有獨立的創造思想和行動的人尋找理論根據。這一情況通俗地反映在下述要求中，“學習毛澤東思想，宣傳毛澤東思想，按照毛澤東思想組織一切事

<sup>①</sup> 參見《毛澤東選集》第4卷，柏林狄茨出版社1956年版第148頁。

情”<sup>①</sup>。也反映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联的下述要求中：“在建設中做一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sup>②</sup>

在向群众提出“向解放軍学习”和具备服从的士兵紀律等要求时这条路线就变得更为清楚了。如果按照这些原則教育劳动人民和指导他們行动，那么哪里还有余地讓他們发展对国家和经济领导的自觉的和创造性的合作呢？这条归根結蒂是反对群众的“群众路线”把劳动人民贬低为共任务只在于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创造性思想”变为实践的执行机构和盲目工具。

在这种情况下，在教科书中以及在中国思想家的其他哲学作品中十分努力企图证明，毛澤东是当代天才的和唯一的馬克思主义的創造者，就不足为奇了。人們甚至肆无忌惮地把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提出的某些馬克思主义原理写在毛澤东的帐上。比如在教科书中是这样写的：“毛澤东同志要求从实际出发并且在实在的事实中确定其本质的原則，是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卓越发展。”（第三章第五节）所有这些企图都是旨在为在中国实行的对毛澤东的迷信进行辯护并且制造证据“证明只有毛澤东才能在理論問題上作科学的”有效的闡述。这种企图在“群众路线”中特別明显，因为通过它——正如看得十分明显的那样，——应当从认识論和世界观上使毛澤东的领导要求得到确认。因此“群众路线”是为个人迷信和从国家和经济领导中排除劳动人民作辯护的。

因此，“群众路线”和馬克思主义科学地确定的关于党在社会主义建設中领导群众的原則毫无共同之处。它恰恰否定了社会主义建設和有計劃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以及不断吸收劳动人民参与国家和经济领导之間的必然关系。这条“群众路线”不是

---

① 1960年第3期中国《七一》杂志。

② 1963年11月20日中国《青海日报》。

促进而是麻痹群众的自觉的创造性,而且是与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背道而驰的。

人民群众的自觉创造性力量,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只能得到发挥,如果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社会发展的原则和为此领导群众的原则是按每个成熟了的条件而坚决的运用了的话。例如我国国民经济和计划的新经济体制表明了这一点。在此基础上,由于创造性地运用了列宁的、作为我们发展的主要动力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原则——社会需求与每个劳动者、生产队、团体和企业集体的物质利益完全一致的原则——就铺设了通畅的道路,使人民群众的自觉活动的伟大力量得到充分地发挥。特别是正确全面的运用经济杠杆的完整制度,为使我们的公民越来越好的认识社会要求和集体、个人私利的一致性,为在贯彻科学技术革命斗争中日益更加自觉全面的发挥他们的富有创造性的能力和提高他们的精神文化水平,做出了贡献。这是一个国家按照条件发挥群众创造性的列宁道路。这条道路和对群众的牵引和约束不一样;它要求在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过程中,在创造社会主义社会财富的过程中,人们要对自觉按置一切创造性的力量感兴趣,而同时要具备这种能力。这里人,他的幸福,他的尊严和福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作中心。这显示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最深刻的人道主义特性。

正如“群众路线”没有为发展自觉的社会主义个性,没有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留下地盘一样,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特色就是它的反人道主义和轻视人的本质。这种反人道主义的顶峰就在于中国领导人准备为了民族主义的大国利益不加思考地牺牲和平,从而也牺牲整批整批民族的生命和前途。而且还试图用“科学”的外衣把这种令人吃惊的企图掩饰起来!例如,我们应该怎样评价那些中国历史家在估计清朝时

所得出的結論呢？“人們不該把擴張領土視為侵略，不該把弱小的處於衰落過程中的民族稱為侵略對象，從而憐憫他們。一個強民族和強國家旨在擴張領土的行動，適合它當時的社會發展的規律。……”<sup>①</sup>這些論點的與人类的敵對性和危險性是不可避免的：他們反人道主義的性質是顯而易見的！如果我們把中國領導人的理論概念同這些論點聯繫起來看，我們就和《真理報》完全一致地得出同樣的結論：“在國際工人運動史中向來幾乎沒有這種情況——企圖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伟大原理，用為他們的純潔性而辯護的無稽之談來掩蓋如此狂妄的、與這種理論思想背道而馳的目的。”<sup>②</sup>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為了他們冒險主義的大國政治利益而歪曲社會主義高尚的人道主義的願望並且在世界人民面前敗壞其聲望的一切企圖，歸根結底也是在反對勇敢勤勞的中國人民本身。象歷史的教訓一樣，這種反人道主義的理論和其政策的延續總是給人民帶來說不出的痛苦。這些理論和政策損害了英雄的中國人民在世界人民面前所享有的威望，同時還有目的地、有意识地阻礙了將一切力量集中於社會主義建設。

中國領導人的冒險政策和折衷主義的哲學永遠不能也不會成為在世界範圍內為爭取自由和社會主義勝利而鬥爭的人民的行動準則。我們確信：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達到一致的工人階級，象過去一樣，將來也不會讓任何分裂企圖阻止他們實現自己的世界歷史性使命。他將繼續拋棄一切分裂主義者，忠於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精神，創造性地勇敢地走向我們這個星球上的社會主義的勝利。

（譯自1964年6月1日第6期民主德國《統一》雜誌）

① 1963年第10期蘇聯《歷史問題》第16頁。

② 1964年5月12日蘇聯《真理報》。

# 我們怎样对待 中华人民共和国呢？

(节譯)

汉斯·卡尔繆勒

中国领导人今天总喜欢巍惑人心地从列宁的作品中摘引他批判德国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对殖民地问题的态度的一些話。但是，他們却只字不提左派勇敢地起而反对和激憤地抗議德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干的殖民主义暴行，只字不提德国革命的工人階級声援中国人民的群众大会。

1950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55年簽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友好合作条約是我們之間关系中的一个高峰。条約規定两国参与“目的在于保障世界和平和人民安全的一切国际行动”，等等。条約規定双方有义务进行“紧密的兄弟般合作，共同商討涉及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的一切国际問題并且发展各方面的友好关系”。

我們党和政府在发展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方面，无论过去或現在都遵循条約中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原则。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拒絕帝国主义的“两个中国的理論”，把台湾看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过去支持、現在仍然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的旨在維護它的国家主权和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侵略和挑畔企图的一切其他措施。我国

政府和人民坚决譴責阿登納敵視中国的政策。我們揭露并且反对作为台湾蒋介石反动集团亲密盟友的艾哈德和施罗德的侵略政策。

早在1958年9月24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奥托·格罗提渥同志就說过：“社会主义陣营坚决地支持它的中国兄弟。只要美国帝国主义者胆敢把它貪婪的手伸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末这种冒险只能以侵略者的完全失敗告終。联邦共和国政府在这个問題上也清楚地袒护侵略分子。这一点在波恩外交部发言人的一项声明中已明确地证明了。前納粹海軍上将赫耶甚至要求派遣西德軍事顧問到台湾。”

根据友好合作条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仅在代表和保卫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的时候給予中国人民以兄弟般的支持，而且也根据自己的可能和力量給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設以兄弟般的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五十多项工业設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工程师、技术員和专业工人和中国劳动人民共同劳动，在北京建設无线电器材厂，在西安建立量具厂，在保定建立人造絲厂，在包头和襄阳建設制糖厂以及建設一些水泥厂和发电厂。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培养了四百七十名中国科学家和专家。有二百一十四名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研究生和大学生結束了他們在我們共和国高等院校的学习。我們給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百八十套科学技术文献，其中仅仅关于机器构造和生产工艺方法的文献就有三百多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貿易关系的順利发展在多年中也曾經是有利于两国人民的。我們两国人民之間文化关系的发展使得我們能够相互了解民族文化的巨大成就和我們两国人民的风俗习惯。

許多个人建立了友好的接触和联系。領事条約的簽訂、在各方面进行合作的协定对不断巩固和扩大友好关系作出了貢獻，

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說，在中共领导人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意見分歧出現以后，我們的党和政府也还继续执行这一同中国人民建立友好关系的政策。不幸，对中国领导人却不能再这么說了。我們遺憾地指出，由于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由于把意見分歧带到国家关系中去，由于對我們党和政府的政策进行了公开的和隱蔽的攻击，这一兄弟般的友好关系受到了重大損失。

某些中国领导人向我們保证，他們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斗争，而中国领导人的行动和作法却与此相矛盾，我們該如何认真对待他們的表示呢？根据一些声明，中国的党和政府支持我国人民爭取解决切身的民族問題的斗争，而同时毛澤东却对法国議員說，他想同戴高乐法国、意大利和德国（讀作西德）建立一个“第三种力量”，我們該如何估价这样的声明呢？人們不禁要問，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盟友，即同帝国主义战争集团的成員国的这个“第三种力量”究竟是要反对誰呢？（中国）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关系不断地受到限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陈毅在最近一次同西方記者談話的时候喜色滿面地說，西德的联邦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間的貿易关系发展得极其順利，并在这次談話中甚至誹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我們又該說什么呢？

中国领导人在德国問題上的态度，在对待重新复活了的帝国主义和軍国主义以及对待西德軍国主义分子和复仇主义分子想获得原子武器的要求所采取的态度，不能证明（他們）支持我們的斗争。注意到这点的当然不只是我們。例如，1964年4月

23日的《自由民主通訊》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德国問題上的态度的确有一点曖昧不明。在来自中华帝国的信件和照会中，几乎沒有提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就迄今所知，在这些文件中完全沒有对联邦国防軍的原子武装提出警告，这是可以理解的。”

奥古斯特·倍倍尔对西德资产階級通訊的这种称赞会说些什么呢？請問，中国领导人是否真正严肃地考虑过，他們这种态度为哪些投机行动大开方便之門？

我們提出所有这些事实，感到极大的遺憾，因为我們始終忠于同兄弟的中国人民的友誼。这种友誼在两国人民的长期的共同斗争中经过了考验。因此，我們的中央委员会声明：“尽管中共领导人采取这种令人忧虑的态度，我們党忠于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始終不渝地坚持同中国人民友好的政策。它不仅努力维护，而且努力促进这种国家关系。德国統一社会党表示希望，至少在这个問題上理智将在中国领导人那里取得胜利。”

我們提醒中国党和政府领导人注意，已成了执政党的每一个共产党，都不仅对本国負有历史的责任，而且也对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共同負責。为了維持并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友誼，加强兄弟般的关系，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必須执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的政策，高举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旗帜，对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德国統一社会党教育自己的党员始終献身于工人階級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国际团结以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牢不可破的联盟，并也献身于发展和加强同中国人民的友誼和兄弟般的联盟。

（譯自1964年6月10日民主德國《新德意志報》）



# 烏布利希1964年6月12日在 莫斯科苏德友好大会上 的讲话(节译)

## 关于某些国际問題

亲爱的同志們和朋友們！

請允許我从社会主义各国和人民广闊的远景来談几句关于中国領導人的行径的話。中共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以后，中国領導人不仅歪曲了和抛弃了代表大会的決議，而且还拒絕了他們亲自参加制定的1957年和1960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共同声明。

他們的这种分裂国际工人运动的不負責任的政策，給我們的事业带来了損失。为了防止更大的損害，我們认为，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都明确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并共同努力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各党完全平等和独立的基础上，在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兄弟合作和互助的基础上重新团結起来，是必要的。

德国統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最坚决地譴責了中国領導人的活动及其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的領導同志的誹謗。

遺憾的是，破坏了馬克思列宁主义最起碼的原則的中国領導人由于民族主义的傲慢和竭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維護和保持个人迷信，越发离开了共同通过的決議。

中国領導人对馬克思列宁主义学說采取轻视态度的一个不是不重要的原因是，他們在工人階級的作用和发揚社会主义民主的問題上采取不正确的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在中国国

家政权的体系中工人阶级未享有从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来看应占有的地位。看来，中国领导人甚至害怕工人阶级影响的加强，因为这会要求更多地考虑工人的历史作用和利益。中国工会主张对工人的物质状况作某些改善的企图遭到中共领导的制止并被贴上危险“倾向”的标签。

中国只要求工人盲目地服从，而不是培养他们的阶级意识、培养他们对行动的责任感和使他们理解到自己作为新社会的建设者和领导力量所担负的伟大历史任务。他们这样指挥工人，致使工人的主动性受到抑制。仅凭服从和士兵纪律这样一些要求，解决不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复杂任务。

显然，中国领导人不理解，应当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来代替长期内战所必需的军事方法，否则，人民的创造力就得不到发展，否则，就不可能顺利地、和可靠地建设社会主义。

我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经验也证明，社会主义民主的发扬解放了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我们的经验还告诉我们只有当劳动人民越来越广泛地参加领导经济生活和国家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时候，才能够顺利地建立社会主义。所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1960年10月4日在人民议院发表的纲领性声明说，吸收劳动人民参加对国家和经济的领导工作，不能是一句空话，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切身问题。

中国领导人对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问题的态度，也像对非洲年轻的反帝民族国家的态度一样，截然违背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和国际发展的实际经验。

无论是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或者其他站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一点也不

抱幻想。帝国主义不会放弃对社会主义的敌视，社会主义本身是帝国主义的掘墓人。但是，我们不应不看到，例如，美国政府——尽管对社会主义各国怀着十分敌视的态度——不得不主张进一步谋求协议或者相互协商来减少战争的危險。

因为，对美国来说，核战争也不会不变成一种自杀。这是某些帝国主义集团的结论，这不是因为他们的性质发生了原则性的变化，而只是出于保存自己的欲望。但是，他们为采取进一步的步骤缓和國際紧张局势、减少核战争的危險提供了可能性，当然，还要保持必要的谨慎。

如果我们看一看最近几周的重大国际事件，看看赫鲁晓夫访问埃及，我们也可以看到，不是中国领导人的“要么全部，要么全不”这种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而是苏共和苏联政府的以巩固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为后盾的英明政策在引导我们达到目的。赫鲁晓夫的访问埃及向全世界表明，只不过几年的时间內苏联和埃及之間就在共同反帝立场的基础上，发展了亲善友好合作与援助的关系，这种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给直接有关国家，而且给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所有阿拉伯国家带来莫大好处。

只要想一想，大约还在十年以前，帝国主义国家还把阿拉伯各国人民看作自己传统的剥削对象，比较一下今天的局面：赫鲁晓夫胜利访问埃及和杰出的阿尔及利亚国务活动家本·貝拉访问苏联，我只能对你们说，亲爱的苏联朋友们，德国统一社会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及其公民支持苏联所执行的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其他民族主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的英明而耐心的政策，因为这个政策的出发点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在实际生活中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譯自1964年6月13日民主德国《新德意志报》）

# 列宁的党的生活准则——胜利建设 社会主义的保障（节译）

霍尔斯特·多路斯、鲁多耳夫·韦滕格耳

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党员和候补党员在刚刚胜利结束的党的选举会议上憎恶和愤怒地谴责中共领导人旨在破坏各国共产党兄弟般战斗集体的分裂活动。我们党的党员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这方面所采用的方法深感忧虑。这些方法同1957年和1960年在莫斯科所商定的关于革命的、独立自主的共产党——这些党通过共同的世界观和目标这一兄弟般的纽带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之间的关系准则毫无相同之处。它们是从托洛茨基和其他工人运动的叛徒那里抄袭来的。

中共领导粗暴地破坏这些普遍适用的准则，厚颜无耻地干涉其他兄弟党的，其中也包括我党的事务；他们甚至不惜煽动其他党的党员推翻他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我们的党员愤怒地驳斥了这种傲慢的态度。他们认为这种做法同共产党人和列宁主义者是不相容的。

\* \* \*

我们许多党员充满忧虑地提出问题：如果中共领导人这么粗暴地和有意识地破坏了兄弟党关系的普遍的共同准则，那么中国共产党党内生活的列宁准则会是怎样的呢？难道在千百次英勇战斗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传奇般的“长征”的参加者和把蒋介石和他的美国顾问从国土上赶走的战士们会委托他们

的领导人采取这样的愚蠢态度嗎？

显而易见，事情并非如此，因为人们知道，中国共产党上次的代表大会，即1956年的第八次党代表大会并没有做出诸如此类的决议。党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1958年）还同意了1957年在莫斯科也由毛泽东签了字的文件。

这次大会的决议还基本上符合客观要求，决议指出了小资产阶级思想和主观主义的危险，“如果我们抵不住非无产阶级的影响，如果我们变的骄傲自满，如果我们自己认为没有错误和完全不虚心的学习，我们将不能继续避免主观主义的恶病。”今天，中国领导人已不再考虑这个方针了。很明显，也正是因为他们没有接受党员的委托而采取了另一条路线，所以才不考虑这个方针。

我们的党员要问，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有什么合法权利来推行一项与他们自己的第八次党代表大会背道而驰的政策呢？……“我们党中央和上级机关的指示和文件，是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化……”今年3月《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文章是这样写的：

不是党代表大会和党的会议的决议，不是一千八百万党员的意志（自从1956年党代表大会以来党几乎增加了八百万党员），而是毛泽东的想法决定着中国共产党的当前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后面这一点我们还会看到。当人们看到中国的地方报纸要求每天要三次想到毛泽东，并感谢他给的吃、穿和其他东西时，就会明白，个人迷信——我们看到的不是别的——在中国带来了多大的毒害。

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早在革命解放战争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当时，毛泽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担任了党的领导，同时，作为军事司令官和政治领导人，他的讲话就是不可

违抗的命令和指示。众所周知，在列宁领导之下，在1918—1922年間，即在國內革命战争和帝国主义干涉苏維埃国家的年代里，曾举行了不少于五次的党代表大会和五次党代表會議，更不用說經常的党中央委员会會議了。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今天在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設的条件下，搬出了腐朽的个人迷信的做法，而毫不顾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为这个同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个人迷信而不得不付出的高额代价，同时也毫不考虑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坚决清算了斯大林个人迷信的这一事实。

\* \* \*

我們談到，中国领导人违背他們自己的党代表大会，在国际政策中实行了激劇的轉变，轉向了后果深远的冒险主义。这种冒险主义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严重的损失。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國內政策中的轉变——这种轉变不是党代表大会决定的，是违背理智和无視社会发展規律的——，也給中国人民带来了不亚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面的损失，其后果是灾难性的。我們絕不干涉中国的內政；然而有些事使我們党感到忧虑。“大跃进”是个想在缺少必要的经济条件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情况下，在几年內消灭经济落后状态的不现实的計划。“人民公社”是一次企图在忽視农民和社会的客观利益的情况下，超越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发展阶段的尝试。生活本身迫使不得不悄悄地修正了这样一种极端的現象，如对家具和私有财产的“社会化”。

这种冒险主义的，实质上是小資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國內政策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当最近几年的欠收和自然灾害使情况更加恶化时，中国人民便尤其沉痛地感觉到这些严重的后果。但是，中国领导人不但沒有象一个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应当做

的那樣去承認錯誤，反而還繼續以主觀主義的態度堅持“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政策。他們甚至企圖把這種非科學的政策失敗責任推給別人，首先是推給蘇聯共產黨，其目的是挑起反蘇情緒。

沒有問一問黨就轉而採取了這種後果嚴重的政策。中國領導人用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的“無所不知”代替了集體討論和黨員參與決定最重大的切身問題。因此在中國展開了全面的宣傳運動，鼓吹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最高形式，甚至把我們的時代說成是“毛澤東”時代。這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毫無相同之處，而是象我們已經說過的那樣，是所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所尖銳譴責的對斯大林個人迷信的翻版（1956年中國共產黨第八次黨代表大會也譴責了對斯大林個人迷信的危害性！）。

凡是個人迷信毒草特別興盛的地方，黨的生活的列寧主義的原則、集體主義、黨內民主、批評與自我批評是沒有地盤的，那里就必然會破壞黨的章程。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越來越多地採用軍事和官僚主義的方式和發號施令。從1964年初以來在所有社會生活領域中，都在“學習人民解放軍”的口號下展開了廣泛的運動。有越來越多的軍隊幹部被安插到經濟和行政管理的領導職位上去。人們吸收經濟領導幹部到部隊中去進行訓練。黨本身也越來越成為軍事的領導機關了。許多工業和商業部門都按照解放軍的榜樣建立了政治部。要求科學家象解放軍一樣高高舉起強大的“毛澤東思想紅旗”，使毛澤東思想成為“指導的力量”。（1964年2月11日《黑龍江日報》）

中國領導人今天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條件下，把游擊戰爭和人民解放鬥爭——當時軍隊曾是黨的最重要的支柱——的特點運用於公眾生活，特別是運用於黨內。他們用命令代替馬克思

列宁主义教育，用命令代替对党的政策和決議的闡明，用命令代替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所特有的耐心的說服教育工作，党内民主被取消了。

在这个基础上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威望不是增长了，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在建設新社会中的作用不是增长了。

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显然对于按照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学說使党具备更多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特点这个问题并不在意。显而易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返回到二十年代末期，在上海和广州的惨重失败后毛澤东所持的观点。他当时曾指責工人阶级在“实现领导权的时候沒有表现出决心”，同时，他还把农民阶级描写成是“在中国推翻世界資本主义的革命主导力量”。

只有这样人們才可以解释，党内的工人成份——党在革命胜利之前主要是在农民中活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仍然增长緩慢，1956年第八次党代表大会时才占14%整。中国共产党沒有象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党的生活准则所要求的那样，经常关心并做出系統的努力去改进无产阶级政党的社会成份。在1945年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人們宣称社会出身对于接受党员不是决定性的，而在第八次党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章里阶级成份就根本不起作用了。这符合于前面提到的，当时曾受共产国际批評的毛澤东的观点，而不符合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原则。众所周知，我們党对于社会成份，对于不断加强工人成份一直都給予最大的注意。按照社会出身和职业来看，47.3%的党员在入党时是工人！

此外，如果說中国领导人是列宁主义者，那么他們应该以着手制定党的纲领来代替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挑拨性的声明；由于1922年第二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已有三十多年了，它因而不能回答今天国内建設的許多现实問題。但是中国领导



人沒有制定黨綱，他們蔑視那些正在建立社會主義和按照變化了的任務而提出了相應的綱領的兄弟黨的經驗。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固守人民解放鬥爭時期的鬥爭形式和方法。

這就是中國共產黨黨內生活準則的情況，中國共產黨領導人自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但是他們破壞和蔑視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任何原則；而那些把這些原則和準則當作自己行動規則的人却被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在文章和講話里罵成是修正主義者等等。

因此，在我們這樣一個黨的生活的準則和紀律是不容爭辯的法則的黨內，黨員要拒絕接受中國領導人的“教導”，是不足為奇的。

\* \* \*

再談談當前每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最重要的原則之一的问题：對蘇聯、蘇聯共產黨的關係。

直到不久前，中國對蘇聯的友誼在中國是不可動搖的。劉少奇在1956年第八次黨代會上作的中央政治報告中還這樣講：“中國和偉大蘇聯以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團結和友誼永遠是牢不可破的。……”黨代會同意了這一論述，因為對蘇聯的友誼過去是現在仍然是中國人民切身的事。

但是，此後發生了什麼事情呢？過去和現在都對蘇聯和列寧的黨懷有真正兄弟般情感的中國人民授權給他們的領導人蹂躪這種情感嗎？難道中國人民授權給他們的領導人，將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渣滓、托洛茨基分子和各式各樣的叛徒以及蘇聯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最凶惡的敵人的有問題的“友誼和合作”置於同蘇聯和其它社會主義國家的友誼和合作之上嗎？

從來沒有看到黨和人民有過這種要求。毫無疑問，英勇的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同意中國領導人目前實行的這種給人民帶來

损害的、反苏的和分裂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这种种族主义以及大国沙文主义的政策。

当一个党掌握了政权时，破坏列宁的党内生活准则，用个人迷信来代替它的做法——象中国共产党最近在实践中所做的那样，只能带来更严重的后果（事实上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因此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党员谴责中国共产党破坏党的生活准则。他们坚决支持1964年4月14日党中央的态度。

由于我们党严格注意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生活的不可动摇的准则并使这一点成为我们整个工作的基础，党便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牢固的不可摧毁的保障。

（译自1964年7月2日第14期民主德国《新路》杂志）

# 国际会议

《新德意志报》社论

一种新的形势已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成熟起来，它使得有迫切需要召开一次新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苏联共产党中央根据1957年所授予它的全权并且在各兄弟党的赞同下，向二十六个共产党发出了参加起草委员会工作的邀请。这二十六个共产党的代表曾在1960年成功地为八十一个兄弟党的国际会议作了准备。苏联共产党的这一行动得到绝大多数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同意，他们认为有迫切需要和必须举行一次新的各国共产党会议来克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的严重局面。这样，召开一次新的世界性会议便进入了实际实现的阶段。

\* \* \*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已屡次——最后一次是它今年4月14日的表态——要求采取坚决的步骤克服由于中共领导人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和积极的分裂活动而产生的严重局面，并明确表示赞成（召开）新的国际会议。

德国统一社会党赞成由与1960年相同的成员召开起草委员会的建议并且指定了自己参加会议的代表。德国统一社会党参加起草委员会的代表将像在1960年一样，根据我们党的决议作出一切努力，以通过建设性的合作创造良好的先决条件，为成功地举行定在明年年中召开的世界性会议做出贡献。

\* \* \*

这次会议的责任重大的任务是，采取决定性步骤在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克服严重的意见分歧，巩固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鉴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絕大多数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间的意见分歧的严重性质，这一任务要求有很大的耐心、实事求是的气氛和真诚的努力，把共同的、一致的东西放到首位，取得观点上的最大限度的接近并达成共同的决议，这些决议能給全世界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以新的推动和力量以及更大的必胜的信心。

\* \* \*

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以来已过去四年了。这是充满了各国人民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斗争的重大成果、充满了伟大的革命转变的四年。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战线上、在争取和平和和平共处的战线上、在劳动人民反对垄断资本的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战线上都取得了伟大的成果。

同时，革命进程和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却提出了许多新的、复杂的问题。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彻底全面地讨论和解决这些问题，对革命力量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进一步胜利进军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1957年和1960年的会议上经过广泛的和创造性的讨论而集体制定并通过了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经受住了考验。它是研究社会主义国家、垄断资本国家和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面临的许多新成熟的问题的基础。从新的经验和新问题的角度进一步发展总路线，将是正在筹备着的会议的创造性的任务。共产党人的影响和他们光芒四射的力量正在全世界增长，他们对人类命运所负的责任也更大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至今沒有让人感到他们准备参加新的国际会议的筹备工作。他们仍像以前一样企图阻挠新的国际会议、继续攻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总路线、宣

传反馬克思主义的方針并且从事有害的分裂活动。但是，召开和筹备新的国际运动会議不允許由于一党的否定态度而失敗。否則就意味着将一党的意志强加予所有其它的兄弟党。不应当給帝国主义国家以可乘之机来继续对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以及共产党和工人党大家庭內的齟齬和不團結进行投机。为了加强我們的运动的統一，首先是为了它的继续进步，不能、也不应当容許继续拖延这一运动的新的国际会議。

因此，德国統一社会党欢迎苏共中央关于召开和筹备国际会議的倡議，认为这是对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对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新成就和胜利极为有利而正确的行动。

（譯自1964年8月21日民主德国《新德意志报》）

## 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政策(节译)

格奥尔格·貝克尔、格尼阿·諾貝尔

### 历史的教訓

列宁曾不断向共产党人警告过民族主义的危險。他曾在《战争与俄国社会民主党》一文中十分清楚地闡明，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是如何地适合于从国家内部使工人阶级的斗争陷于瘫痪并破坏工人阶级的团结。他闡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第二国际領袖們的背叛正是在于他們以民族主义替代了社会主义，用本国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口号为战争辩护，并且号召工人阶级背离阶级立场、使自己的立场同帝国主义政府的立场融合起来。

列宁也指出，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也具有反压迫的一般民主主义的内容，共产党人无条件地支持这种内容。但是，他們同时也反对民族唯我独尊和为本民族要求特权的企图。<sup>①</sup>然而，旨在为反对他国民族的大国沙文主义开辟道路的大国民族主义，只能具备反动的、与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深为敌对的性质。列宁写道，共产党人必需“建立各民族工人最亲密的联盟，使他們协力进行反对各种各样的沙文主义、各种各样的民族特殊性、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的斗争”。<sup>②</sup>

无限地过高估计本国，把尽可能多的优秀成就归功于本国

① 《列宁全集》第20卷，柏林狄茨出版社1961年版第415頁。

② 同上书第221頁。

(尽管这些成就是他国人民获得的),同时又歧视其它民族,对任何“外国的东西”普遍地不信任和骄傲自大,这些就是民族主义思想的特征,只有在这种思想基础上,资产阶级才能把对其它民族实行的掠夺和压迫政策說成似乎是为了证明本民族的“伟大”所必須的。

### 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場上

近几年来,中共领导人在他們的实际政策中已愈来愈脱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中共领导人拒絕并且以各种可能的方式破坏苏联有效而审慎地执行的和平共处和緩和國際紧张局势的政策<sup>①</sup>。这特别表现在他們对待原子武器问题的态度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属于少数几个沒有参加关于停止在三个领域中進行核試驗的莫斯科条約的国家。中国领导人絕對要拥有自己的原子武器。按照中国领导人的看法,一个国家沒有原子武器便是个二等或三等的国家<sup>②</sup>。中国不需要原子武器来保卫自己,因为苏联的强大武器已经保卫了它。但中国领导人却准备为原子武器付出任何代价。他們这样做时,甚至不惜使自己在各国人民的心目中孤立起来。他們的态度絲毫无助于緩和紧张局势的政策,他們直接支持了西德帝国主义对原子武器的追求,但他們对此并不介意。他們毫不犹豫地向着那些会在一場原子战争中遭到毁灭的小国兄弟党

① 参見格尼阿·諾貝尔:《和平共处是社会主义对外政策的总路綫》,載1963年第8期民主德国《統一》杂志第72—81頁。

② 例如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在1963年10月28日对日本記者的談話中称:“原子彈、導彈和超音速飞机等反映一个国家的先进水平。中国如果不在几年內解决,那就只不过是一个二等国或三等国。……在我看来,即使穿不上衬褲也一定要制造最新武器。”(1963年10月31日中国《参考消息》)

指出应为共同事业而付出牺牲的前景<sup>①</sup>，而他们的想法显然是，为数众多的、散布在广阔地区上的中国人，将会有几亿人生存下来。中共领导人为了获得他们认为一个大国所必须有的原子武器，也准备让本国人民付出任何物质牺牲，付出一切。

大国沙文主义已使他们如此地离开了阶级立场，以致他们把帝国主义的美国和社会主义的苏联相提并论，硬说这两个国家在原子垄断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反对世界上的其它国家。<sup>②</sup>同样，中共领导人关于“第三世界”的外交方针——其后果是中国想同一系列重要的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和反对苏联<sup>③</sup>——不但违背了有阶级立场的思想，而且也符合于反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反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的立场。

事实上，问题不只在在于中国领导人显然以占有或不占有原子武器来衡量他们国家的威信。问题还在于他们的整个政治方针是大国沙文主义的实质政策，而原子弹正是这一政策所必需的“实力的手段”。<sup>④</sup>这一政策的论点同某些帝国主义的论点相似<sup>⑤</sup>，这一政策在革命词藻的掩饰下，最近已愈来愈公开地和蛮横地暴露出来。现在，毛泽东显然把提出领土问题提高到原则高度。比如他向社会主义的苏联提出了领土要求，并且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的，即在一百年前有些地区有向满洲统治者

---

① 中共中央委员陶铸及其他人的说法。（参见《苏联政府声明》，载1963年9月24日民主德国《新德意志报》）

② 《1963年8月15日中国政府发言人声明》，载1963年12月12日北京《人民日报》。

③ 1964年第5期民主德国《国际工人运动通讯》杂志第22—23页。

④ 参见1964年第5期民主德国《国际工人运动通讯》杂志第22页。

⑤ 例如斯特劳施任波恩国防部长时声称，“拥有核武器和对核武器的支配权，是标志主权的象征，特点和决定性标准”。（1961年11月28日西德《世界报》）



納貢的義務。他事實上想使蒙古人民共和國變成中國的一個省。同時他也企圖以在社會主義兄弟國家間提出領土問題的方式破壞他們之間的友誼，煽動民族主義情緒。毛澤東不久前同日本社會黨人的一次談話很有代表性。日本《世界週報》在今年8月11日發表了這次談話。他在談話中表示的看法——如果人們把它當真的話——實際上就是要求修改作為第二次大戰的結果而產生的一系列國際協議，而這些協議是符合於鞏固和平和各國人民的安全的。同時，他也用接近於西德復仇主義者的方式表示了他對奧得—尼斯河和平邊界形成的看法，雖然他不是不知道，這種看法不僅同德國人民的利益相對立，而且也同歐洲各國人民和世界和平的利益相對立。<sup>①</sup>

在所有這一切的背后就是他們要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的實際要求。雖然給這種要求披上了“革命的”外衣，例如以“規律”的形式（出現），按照這種“規律”世界革命的 centre 已轉移到東方了，但大國沙文主義仍然十分顯著和清楚地表現出來。中國領導人的重大目標是，取得對當代強大的力量，即國際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陣營的領導權作為他們（推行）大國政策的支柱。同時，他們還力圖按照他們的政策來利用當代第二個大運動——民族解放運動。中共領導人民族主義的大國政策的目標是，站在一切之前和之上，那怕因而危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致、損害它的戰鬥力、分裂兄弟黨，那怕使民族解放運動由於孤立於偉大的社會主義力量而受到削弱，那怕加重反帝鬥爭的困難。

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大黨的領導人怎麼會在重要的基本政策問題上脫離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立場，而轉到在社會主義的中國

---

① 參見1964年9月2日蘇聯《真理報》。

已不再有其社会经济基础的大国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立場上去呢？这里当然有許多主观上起作用的因素<sup>①</sup>，例如：由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年中取得了伟大成就而产生的对自身力量的过高估計；沒有能力估計新时代的基本問題，并从中得出符合于工人階級历史使命，因而也符合于中国人民的利益的結論。这一切都发生在极度个人迷信的情况下。伴随这种个人迷信的，就是十足地忽視列宁的党的生活准則。……而所有这一切缺陷的共同原因就是中共的政策从来也沒有克服过的、而今天仍然到处充斥的小資產階級思想意识。关于这种思想也存在于中共党內的情况，毛澤东当时曾写道：“中国是一个小資產階級成份极其广大的国家，我們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階級的包围中。我們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階級的，他們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資產階級的尾巴进党来。”<sup>②</sup>

### 起作用的不是主观意見，而是客观现实

毫不奇怪，在这种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像“外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也能做到，外国人做不到的，中国也能做到”，或者简单些說，中国什么都能做到，这类口号开始泛滥。这类口号准确地反映了中国领导人民族主义政治方針的基础。同时，对毛澤东实行了如此过份的个人迷信，以致它几乎具备宗教的形式，这样就为毫无限制的主观主义大开方便之門。在中国已几乎不談馬克思列宁主义，甚至也不談它的“中国化”了的形式，而是根本只談“毛澤东思想”。人們可以在中国报刊中找到这类提法：“我們党

① 維尔弗里德·韦貝尔：《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背离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因》，載1963年第10期民主德国《統一》杂志第87頁。

② 《毛澤东选集》第4卷，柏林狄茨出版社1956年版第64頁。

和上級党組織的指示和文件是毛澤东思想在当前斗争和工作实践中的具体化。”<sup>①</sup>

自然，在全世界能起作用的只能是中国适应它当时的情况所运用的，并为毛澤东所闡明的经验和革命斗争的方式。例如毛澤东的这一“认识”便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上的，即他硬說只有依靠武器才能改造世界；按照中国的观点革命斗争必須是武装斗争。<sup>②</sup>可是，这种以武力来替换客观的社会发展法则的“理論”<sup>③</sup>同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这种理論同那些认为历史的发展实际上不是由阶级斗争，而是由各国之间的战斗来决定的观点，自然是一致的。相应地，毛澤东在衡量一个民族伟大与否时，显然不是以它对人类社会进步或改善本国人民生活贡献为准，而是以它的帝国主义統治者所进行的侵略规模 and 它所占领的外国領土的大小为准。因此他如此地闡明了他对日本民族的估計：“日本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它进行过反对美国的战争。它反对过英国和法国。它袭击了珍珠港，占领了越南、菲律宾、泰国、馬來亚、印度尼西亚。它的攻势扩大到印度的东部。”<sup>④</sup>这也表明，中共领导人已完全脱离阶级立場而站到大国沙文主义的反馬克思主义政策的立場上去了。

在历史发展的規律和力量面前，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政策当然是不能持久的。但是它能带来許多危害，因为它从客观上

---

① 参見1964年3月10日《中国青年报》。

② 《毛澤东选集》第2卷，柏林狄茨出版社1956年版第281頁和273頁。

③ 格奥尔格·貝克尔：《在各国关系上放弃使用武力——社会主义外交政策的要求、德国的民族政策的要求》，載1964年第2期民主德国《統一》杂志。

④ 《毛澤东同日本社会党人的談話》，載1964年9月2日苏联《真理报》。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帝国主义是靠同維琪傀儡政府达成協議而进入前法国殖民地印度支那的，希特勒德国对促成協議起了作用。（参見格·阿·德波林：《第二次世界大战》，柏林国防部出版社1959年版第106頁）

支持了帝国主义政策的一些要求，如反苏煽动、破坏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破坏他们同民族解放运动的联盟，增加国际紧张局势，制造歇斯底里的民族主义气氛等。

(译自1964年9月12日第9—10期民主德国《统一》杂志)

# 見諸于行动的社会主义 国际主义(节譯)

庫尔特·提德克、海因茨·普德尔

国际工人运动在今年庆祝第一国际成立一百周年。科学社会主义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意义深远的不可推翻的口号表述了国际主义的原則,而且也始終根据这一原則行动。他們教导国际工人运动永远把国际主义看作自己的理論和政策的极其主要的組成部分,并且把它創造性地应用于一定的斗争条件。1964年6月12日簽訂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联的友好条約是符合馬克思列宁主义奠基人的这种要求的。条約为我們两国之間的合作开辟了一个新阶段,从而同时使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理論和实践具体化。

## 友誼 和 经济

这些文件的目的在于进行最大限度的合作,特别是在今天对于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几个領域中的合作。文件充分考虑到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第二个发展阶段是与工业发达国家中所进行的技术变革相一致的这样一个事实。在这个阶段,中心的问题在于滿足技术变革的各种需要,把科学技术的最高水平以及最高的经济效益当作经济活动的主要标准加以贯彻。

在这些条件下,这一点簡直已成了公认的道理,即:在为爭取科学技术的最高水平的斗争中,不具体地利用世界社会主义体

系的一切优越性，不最大限度地发展社会主义国家間的合作去解决这些任务，就談不上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

### 竞赛是阶级斗争

友好条约反駁了拒絕社会主义国家之間全面经济合作而宣传只“自力更生建設社会主义”的中国领导人的看法。中国领导人的这条路线不是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口号，而是民族主义的口号。任何人都应当忽視，在今天，“自力更生进行建設”的口号如果付諸实施，客观上将促成放慢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而这归根結底意味着世界力量对比的发展無論在政治上和軍事上将再次变得有利于帝国主义。波恩极端主义分子猛烈攻击这项友好条约的签订，并且在(西德的)《外交政策》杂志(1964年第7期)的一篇专题社論中觉得不得不警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要进行“像友好条约中所商定那样的紧密经济合作”，这是使每个人都必須想一想的。

### 波恩的“警告”

波恩极端主义者的这种“警告”是富有特色的。当工人阶级及其盟友在国内和在国际范围内巩固自己的团结和合作的时候，他們总是发出这样的“警告”。今天有什么东西比中共领导人的反馬克思主义的政策更适合于阶级敌人呢？因为这种政策导致离开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內的一致、合作和相互援助。它支持帝国主义者通过复活民族主义残余来孤立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从而給它們的共同活动增加困难的企图。西德帝国主义的反动理論家們企图用他們的“警告”来证明社会主义国家間的合作

会导致“轻视本国人民的民族利益”。既然这一点无法证明，于是就干脆歪曲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然后，垄断资本的理論家們便以“自由”和“自决”的口号进入“拯救”民族利益的斗争。

### 按照列宁的精神

中国领导人的路线是錯誤的和反革命的，而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紧密合作的路线是1957年和1960年共产党和工人党會議所要求的列宁的路线。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間的一切協議完全符合1957年和1960年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声明，完全符合1962年经互会成員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書記六月會議用綱領方式提出的社会主义国际分工的基本原則。

每一个有階級觉悟的工人都懂得，帝国主义資产階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在有計劃地組織的合作和互助中迅速提高生产和生产力，增强经济力量和继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不可能感到兴趣的。因此，波恩当权者也“警告”人們不要进行紧密的合作。

但是，对于中国领导人的、提出不在历史上最短的时期內和不在兄弟般的合作中，而是在“五至十代”和用自己的力量来取得社会主义彻底胜利这一要求的論点，該作何評价呢？

难道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进行经济竞赛时期的貢獻就是这样嗎？

这倒等于是那些拿不出勇气来改正錯誤的人的呼吁。弗·伊·列宁教导我們，社会主义首先是通过它的经济成就对国际事态的发展給予影响的。他一再要求“在实践中通过榜样来表現共产主义的意义”。

苏德友好条約和它的实现正是服务于这个民族的和国际主

义的义务。条约对于怎样才能解决和回答在新的条件下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体的问题作出一个实际的榜样。

但是，友好条约的国际主义本质不仅表现在关于经济合作的协定中，而且也表现在它对确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权所作的贡献当中，表现在缔约双方始终一贯地维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界和维护和平当中。

### 团结的证明

这无论对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还是对于整个欧洲都是一个重要的安全因素。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了防止外来侵犯的保障。因而，条约是德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的一个明显的失败，它在实践中显示出社会主义的国际力量。它表现出西德复仇政策毫无希望、毫无前途。西德极端主义分子幻想以武力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并入波恩的国家，或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帮助下迫使苏联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交出来给他们或“出卖”给他们，这些幻想的彻底破灭因友好条约的签订变得更清楚了。

在这一方面，友好条约也是基于1957年和1960年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的决议之上的。决议中说，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反对革命输出，但它们也不允许反革命输出。友好条约极其清楚地表明：德国帝国主义没有任何可能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一社会主义国家是巩固、稳定的，德国的未来是属于它的。友好条约对此作出了一个决定性贡献。为反革命输出设置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这也证明苏共和德国统一社会党对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忠实。

中国领导人“批评”没有缔结和约而缔结了友好条约。但



是，在目前的条件下，只有在同两个德国締結和約的时候和約的締結才会实现它的目的。然而，中国领导人很清楚地知道，統治着波恩国家的西德极端主义分子反对締結和約。

因此，西德极端主义分子的侵略政策（这一政策也包括不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結果）是締結对德和約的主要障碍，而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如既往地主张締結合約。

但是，友好条約却对实现同两个德国媾和起着重大影响，因为它十分清楚地指出了存在着两个德国这一现实。迄今締結和約的一个障碍正是在于某些国家还不願意承认两个德国的存在。友好条約无疑地将帮助这些力量对德国的实际情况获得一个清晰的图象，从而促进同两个德国媾和。

### 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有利

此外，人們必須說，友好条約明确地指出了欧洲和平的主要危险的策源地——西德帝国主义和軍国主义——，把它限定在半靠的边界內，挫败了它东进的野心，同中国领导人的所謂“中間地带”論点是有原則上的不同的。这个“理論”否认侵略性的西德帝国主义的危險。在德国帝国主义进行巨大的努力以图获得原子武器和愈益强有力地扩大它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的地位的时刻，这一“理論”就更加有害。这样一个“理論”只会导致放松对德国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警惕。与此相反，友好条約正在实现着在1960年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會議的決議中所規定的反对德国帝国主义的那些任务。因此，友好条約在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一条决定性战线上保障着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边界安全。这将有助于在德国和欧洲創造一个平靜和緩和的气氛。因此，条約对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巨大的意义。相反，企图把德意志

民主共和国孤立于苏联之外的中国领导人的路线永远不会取得这样的结果。他们的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独立自主”、“不相依赖”的宣传，不是什么关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主权的表现，而是受离间苏联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其他国家的关系、孤立这些国家以便于向它们发号施令这一企图支配的。

我们的斗争经验教导我们：与苏联的兄弟般的团结和合作，是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一个根本组成部分。对待苏联的态度现在是，今后仍然是对每一个革命者、对每一个进步人士的测度尺。所以，德国统一社会党在第六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中指出：“对苏联——国际工人运动的中心、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和平的堡垒的态度，无论在今天还是任何时候都是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的试金石。苏联对于反对修正主义、宗派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斗争的胜利具有决定性作用。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纯洁的保证，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工人运动的一致和团结的保证。”

（译自1964年9月18日民主德国《新德意志报》）

# 徒劳的努力

卡尔·繆勒

所有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爱好和平的人們获悉北京领导人  
对社会主义邻国的并吞要求，都极为惊异，并坚决拒絕这种要  
求。但是，北京领导人却又开始耍新的骯髒的花招。这一次，他們  
利用瓦·烏布利希同志在人民議院第七次會議上的講話和已宣  
布的赫魯晓夫同志将对西德联邦共和国的訪問来进行誹謗，他  
們在这些誹謗的帮助下徒劳地力图在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之間播  
下不和，破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同苏联的紧密的友誼紐带。

北京《人民日报》9月8日发表了一篇評論和新华社駐波恩  
記者的一篇报道。这两份材料竟敢进行笨拙的歪曲和撒謊，向  
中国人民錯报情况。中国领导人在不尊重事实和瓦·烏布利希同  
志在人民議院會議上講話的真实內容的情况下，栽賴苏联同志  
不尊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利益和把它当成“交易对象”。他們  
用断章取义的、歪曲的混杂的摘录以及西方通訊社的报道，有意  
地企图使人产生一种印象，好像在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  
間的关系中存在着不一致。

他們蠱惑人心地使这一破坏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間友好关系  
的新的阴險企图具有某种“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外表。实  
际上，在这里装扮成德国人民利益維護者的中国领导人的政策，  
它的目的在于分裂社会主义陣营，而决不是为了德意志民主共  
和国的利益。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长期以来一直很不安地注視着中国

領導人的實現其“中間地帶”理論的政策和企圖。他們是不是果真想同歐洲帝國主義國家和帝國主義的日本結成反對蘇聯和社會主義兄弟國家的聯盟呢？一系列事實朝這個方向作出值得注意的說明：毛澤東向法國議員談話，主張中華人民共和國同西歐帝國主義國家和日本結成聯盟；毛澤東對日本社會黨人的講話對兄弟國家提出併吞的要求，從而實際上反對和平的奧得—尼斯河邊界；西德特務機關協助散發帶有對德國統一社會黨的政策進行誹謗性攻擊的中國材料；最後，中國的出版機關從西德復仇主義者和軍國主義者的報刊的垃圾桶中拾出並翻印誹謗性的消息。

在中國報紙上充斥著西方新聞界的誹謗性報道的同時，却幾乎沒有發表關於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政府的政策（關於我們共和國的全面的社會主義建設、在兩個德國之間的关系中貫徹和平共處原則的倡議、始終一貫的反帝鬥爭和對民族解放運動的支持）的消息，這也不是偶然的。

我們——正如過去一樣——十分坦率地告訴中國領導人，你們在以蘇聯為一方和以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及其他社會主義兄弟國家為另一方之間引起分歧從而播下不信任的種子的新企圖，正如同波恩極端主義分子關於“收買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妄想一樣，是注定要失敗的。

北京領導人企圖同重要的帝國主義國家、其中也包括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西德組成一個“第三種力量”，而蘇聯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德國工人階級和所有愛好和平的德國人的利益的始終一貫的捍衛者。作為反希特勒聯盟的主要力量，蘇聯對於粉碎希特勒法西斯主義和德國人民從法西斯主義下獲得解放作出了最大的貢獻。蘇聯從第一天起就幫助在德國的東部始終一貫地實現也符合德國人民利益的波茨坦協定。在建立一個反

法西斯的民主制度方面，它給予德国东部的反法西斯力量以无私的援助。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存在的第一天起，极紧密的兄弟般的紐帶就把我們同苏联連結在一起。以赫魯晓夫同志为首的苏共和苏联政府言行一致地支持我們共和国为消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迹、为締結对德和約并在此基础上解决西柏林問題而进行的斗争。

由于不久前签訂了德苏友好互助合作条約，我們两国之間的兄弟般的联系得到了发展和巩固。甚至西方的通訊社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德新社9月7日也不得不指出，像德苏条約这样的政治现实是同种种妄測相矛盾的，而中国领导人居然也就拟議中的赫魯晓夫对联邦共和国的訪問散布这样的妄測。

条約从国际公法上确定了1945年之后产生的现实局面，并且保证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主权；其中明确地說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界的不可侵犯是欧洲安全的基本因素之一，帝国主义和复仇主义势力对这条边界的任何袭击都将得到应有的回答。

这一切都是中国领导人不愿意承认的事实。两个德国之間的和平共处政策是确保欧洲和平的一个基本条件，是德国将来重新統一的起碼条件，这一点是不适合他們的大国沙文主义的概念的。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瓦·烏布利希所論证的并且得到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贯支持的——中国领导人所不理睬的——德国和平理論，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联之間的友好条約，指出了应当如何解决德国問題的途径。烏布利希同志在人民議院第七次會議上說：

“苏联、特别是部长會議主席赫魯晓夫同志对于与社会制度不同的其他国家和人民和平共处与和平合作政策表现出的主动

精神，它的通过分阶段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的途径来确保和平的一貫政策，在今天已受到大多数人民的支持……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存在是和平力量也将在德国取得胜利的确实保证。”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欢迎准备中的赫魯晓夫同志对西德联邦共和国的訪問，因为这次訪問只能有利于貫徹和平共处原則和緩和國際局势，因而它也符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們的利益。

但是，所有那些一直对“收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仍还抱有幻想的人——无论是西德帝国主义者也好或北京的在报上写文章的人的授令者也好——都必须知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现在是并且今后仍然是不能出卖的。

(譯自1964年9月20日民主德国《新德意志报》)

# 第一国际和现代共产主义运动(节译)

——烏布利希1964年9月25日在紀念第一国际  
一百周年国际科学討論会上的讲话

在(第一)国际的范围内,工人阶级的民族先锋队深刻地理解他們对本国劳动人民所担负的义务,并且意识到对国际工人运动的责任。馬克思和第一国际拒絕向民族主义作出任何让步。因为民族主义只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影响的表现,它給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带来巨大的損害。如果今天在中国领导人之中有民族主义的现象,那末这是落后的概念的表现,这些概念自然是往往为帝国主义国家所利用。

苏联对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使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个新的局面使苏共和苏联人民面临苏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新問題,也面临对外政策的新問題。

苏联共产主义建設的問題和经验对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具有巨大的意义。仅仅譴責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后果是不够的,要紧的是追根究底得出必要的結論。

人民民主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曾經面临的任務是,在被苏軍解放后形成的特殊条件下,走上对本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这一发展无疑受到个人迷信后果的妨碍和阻挠。

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和教条主义阻碍了共产党和工人党解决摆在历史日程上的問題。

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一切方面,斯大林教条主义都有碍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設。首先也在对外政策方面,使下

述世界政治任务的完成遭到損失：把和平共處、裁軍和在平等基礎上同所有國家——只要他們願意——建立良好關係的政策提到日程上來。直到斯大林死後，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同志才能使第二十次黨代表大會成為克服個人迷信和教條主義的後果的轉折點。

教條主義的現象不僅是個人迷信的後果。它們同國家和經濟領導在克服戰爭損壞、匱乏和國際壟斷資本的壓力時所遇到的困難也有關聯。在匱乏時期，形式主義的行政管理的領導方法起着較大的作用。但是，由於在黨和國家以及經濟的生活中恢復列寧的準則，便鏟除了教條主義滋生的土壤。

某些人看不見社會主義發展的辯證法。他們看不見事物的相互關係，看不見克服過渡時期存在的矛盾和發展工人階級及其他勞動者的創造力的道路，而只是把困難加在一起。

某些人只看見過去的困難，因為他們覺得不容易認識正在發展的新事物的意義和塑造這種新的事物。在另一些人身上，克服教條主義的工作則同自流的政策和過低估計冷戰的敵對措施連系在一起。

企圖按照國家領土或不同的國家制度取消合作的活動遭到堅決反對，因為這樣的活動削弱著國際運動的一致和戰鬥力。

中國領導人想通過戰爭或製造教條的方法來找到一條捷徑，這個企圖是註定要失敗的。

向人民公社的大躍進就是企圖通過躍進來縮短在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已經走過的和正在走的道路。英勇的八路軍的鬥爭和領導方法在反對帝國主義敵人的戰爭中無疑是經受住了考驗的。但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黨、國家和經濟的領導工作中，這種方法是不適用的。運用這種方法，必不可免地要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生種種內部困難。把這種政策推廣到國際範圍的企



图，如同在頌揚战争是世界上社会主义进军的手段时所进行的那样，其結局可能是工人运动和各国人民极大的不幸。

中国党的领导要求党员发誓忠于“一分为二”的論点。“一分为二”就是分裂，因而就是損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于这种分裂政策，中国领导人丧失了观察主要任务的目的。他們不去为和平事业服务，采取一切办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对印度展开边界冲突，接着先后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展开边界冲突。而現在，他們又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东欧和巴尔干所形成的边界。这就意味着，他們直接为西德帝国主义者和复仇主义者帮忙。

这是正确的，在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个历史上，为了革命学說的純洁性而一直进行反对右傾机会主义和左傾宗派主义危险的斗争，早在第一国际的时候就是这样。但是現在，教条主义和左傾机会主义的危險已居于首位。中国领导人宣布了他們的特殊的宗派主义方針。我們懂得中国事态发展的特殊性。国家农业的落后，內战时期和战后经济时期的领导方法的继续起作用以及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沉重負担，构成滋养教条主义的深厚的土壤。中国领导人拒絕按照1957年的協議召开筹备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下一次联合會議的起草委员会，这就表明，他們的所作所为都是以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目的。

**第一国际和共产主义运动百年来的整个发展的经验教导我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是进行卓有成效的革命斗争的絕對条件。**

因此，現在也有必要通过筹备国际會議来确保这种团結。已经邀請1960年参加起草委员会的所有二十六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平等地不附先决条件地在12月参加拟定一项共

同声明。我們想，拟就的草案将交由各党表示意見。如果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于共同的會議以及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抱有哪怕是一点点的兴趣，他們就会参加按照1957年的委托和1960年时的組成召集的起草委员会的會議。然后，他們也会参加草拟一项联合声明。要是在这些或那些問題上有意見分歧，在起草委员会中不能解决，那末各个党有可能阐述他們的修改意見并在代表大会上說明理由。更民主的方法是沒有的。所必需的只是合作的良好願望。可見，譴責一些党或把它們从国际共同体中开除的意图是不存在的。

1960年共产党和工人党联合声明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有助于加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按照各国条件制定政策創造了基础。可是，在此期間，几年已经过去了，这几年中，一些需要回答的新問題成熟起来了。

我想指出几个新問題：一个重要的問題是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同其他政党以及同工会和其他社会組織的关系。在这里首先是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同在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占优势的基督教徒或穆斯林或者其他教会的关系的問題。在我們国家，在工人阶级統一在德国統一社会党之中后，采取了各党派联盟的形式，有五个党：德国統一社会党、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德国民主农民党、德国自由民主党、德国国家民主党以及工会、民主妇联、文化联合会的代表属于这个联盟。毫无疑问，工人阶级的政党在起领导作用。但是，它不是根据某种規章發揮影响，而是在民主的諒解和合作中發揮影响。我們认为：这种合作不仅在社会主义胜利以前的时期是必要的，而且在随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也是必要的。

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以后，人民民主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是以新的方式发展的。人民民主国家被

苏联解放以后，彼此之間形成了紧密友好的关系。但是，直到这些国家創造了社会主义的基础，直到这些国家的、由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联合而形成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在意识形态上有了发展，这些联合的党及其领导才通过同苏联的兄弟般团結逐渐地参与解决国际任务。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后果和教条主义的逐步克服导致了真正的合作和相互的经验交流。

苏共和苏联受对斯大林个人迷信和教条主义的后果之害特别严重。但是列宁的党和国家准则的破坏也影响到苏共和苏維埃国家同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斯大林不懂得运用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設时期的经济领导和发揚社会主义民主的指示。他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行政管理代替社会主义经济規律的运用。赫魯晓夫同志确定的并为二十二大通过的共产主义纲领才回答了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問題。

在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影响下，在人民民主国家无疑也曾一时存在許多狭隘性和教条主义的現象。但是人民民主的道路是正确的。在二十大以后，发生了轉折，在党的生活中，在国家、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开始克服教条主义。

1960年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联合声明表现出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这次會議上所作的創造性工作是在党的工作中列宁的准则业已开始恢复和党在意识形态上大大发展的結果。这个时期中国党的领导人开始使他們的第八次党代表大会的論点失效并准备“大跃进”，而在欧洲人民民主国家則有系統地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

(譯自1964年9月26日民主德国《新德意志报》)